



Education

西方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读本

- 丛书英文版主编\弗兰克·帕金
- 丛书中文版主编\周殿富 韩冬雷
- 丛书中文版执行主编\曹海军

文化

——再造社会科学

[英]马克·J.史密斯 著
张美川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Culture

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高等教育最权威的社会科学教材之一
中国10余所最高学府知名学者联合推荐

策划编辑：崔文辉

责任编辑：崔文辉、崔 凯

装帧设计：陈 东

Culture

作者简介：马克·J. 史密斯是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的社会科学讲师。他的授课和研究涉及社会科学、哲学、生态学、社会和政治理论、文化政治学、批判理论和社会学。他还是奥斯陆大学（University of Oslo）社会科学的哲学和方法论的客座教授。他的近作包括：《重新思考国家理论》（Rethinking State Theory 2000）、《环境思考》（Thinking Through the Environment 1999）、《质疑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 in Question 1998），以及《生态主义》（Ecologism 1998）。该书也已作为开放大学出版社（Open University Press）的“概念丛书”中的一种而出版。

ISBN 7-206-04593-6



9 787206 045936 >

ISBN 7-206-04593-6/D. 1403

定价：14.00元

文化 ——再造社会科学

[英]马克·J.史密斯 著
张美川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再造社会科学/(英)史密斯著;张美川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1

(西方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读本)

书名原文:Culture

ISBN 7-206-04593-6

I. 文… II. ①史… ②张… III. 文化学 IV. G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1866 号

Mark J. Smith

Culture: reinventing the Social Science

(Original ISBN: 0-335-20319-1)

Copyright© Mark J. Smith, 2000

Original language published by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jointly published by McGraw-Hill Education (Asia) Co. and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和美国麦格劳-希尔教育(亚洲)出版公司合作出版。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本书封面贴有 McGraw-Hill 公司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05-1367

文化

著 者:马克·J. 史密斯

责任编辑:崔文辉 崔 凯 封面设计:陈 东 责任校对:赵秋实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网址:www.jlpph.com 电话:0431-537801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431-5395845

印 刷:长春市永恒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6.625 字 数:13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206-04593-6/D·1403

版 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 000 册

定 价:14.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西方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读本》编委会名单

主 编：周殿富 韩冬雪

学术咨议(按姓氏笔画排序)：

万俊人	马德普	马敬仁	孙晓春	李 强
任剑涛	应 奇	何怀宏	林尚立	姚大志
胡维革	贺照田	高 建	袁柏顺	徐湘林
夏可君	顾 肃	梁治平	曹德本	葛 荃
谭君久	薄贵利			

编 委：孙荣飞 朱海英 刘训练 彭 斌

叶兴艺 赵多方

第一期执行编委：孙荣飞 朱海英

《西方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读本》

总序暨出版说明

自 19 世纪中后期西学东渐以来，在西方思想和相关书籍引入方面的成就可谓蔚为大观，但总的来说，大都强调系统理论的引进和评介。自 20 世纪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介绍和翻译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的著作成为了“文化热”的先导，其中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名著》、三联书店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华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文库》，以及《现代西方思想文库》等丛书曾经滋养和影响了数代学人的学术生命。

本套丛书立足于社会科学领域的基本概念，虽名曰基本知识，却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学术普及，每本小册子的著者皆是该研究领域的专业权威人士。以往这类书籍的引进通常表现为编纂学科史的教材形式，将知识的引介停留在教科书的层次上。故此，作为单纯的基本概念的追本探源式的梳理工作略显不足，这也就使得研究者对各家各派的观点难以获得系统的了解。而从可读性和理论的深入性上来说，本套丛书既适合于初次涉猎该领域的非专业人士、本科生，成为他们的领航性的参考文献，也能够满足于对此领域具有相当知识积累且有一定专深研究的研究者的专业化要求，因此能够将系统性理论的引入与基本概念的拓展齐头并进，可谓一举两得。

需要指出的是，该套丛书以社会科学自诩，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反映了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文化内涵和根本的价值取向，因此它并不具有自然科学本身拥有的客观性和普世性。毫无疑问，这套丛书是西方社会科学家以西方特有的文化视野和价值取向为基点，看待西方世界和社会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集中反映。对此，我们应该确立批判与扬弃、借鉴与建构并举的思想立场。毋庸置疑，在与西方世界的文化交流与相互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并吸收西方有益的社会科学文明的普遍性成果，借鉴和利用有益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理经验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的分析框架。与此同时，我们也坚决反对食洋不化的崇洋心态和西化倾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科学观，在坚持学术自主性的“洋为中用”的前提下，实现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规范化、科学化。

编者

出版导言

文化，一方面几乎吸引了现代社会科学所有领域的目光，好像已经成了大多数舞台一成不变的布景。而另一方面，在文化转向论者那里，对于文化的再认知成为一个全新的旅程，似乎我们压根就不懂得文化。

确实，在当代的语境下，恐怕没有什么社会科学概念比“文化”更流行、更多变、也更令人费解的了。如果单凭这本名曰《文化》100余页书的表述，我们对于文化的困惑便倏然而解，恐怕是困难的。虽然受限于篇幅，作者无法展开宏大的对于文化的解析，但他对于各种复杂繁复素材的驾驭和总括，对于观点的清晰论证，仍然使我们对于其学识功底叹服不已。作者的后学科方案是否能很好地解释文化转型或作者所说的“文化回潮”，暂且不论。他有效地使用福科、阿尔都赛等人的理论符号，对于正统的文化概念进行了颠覆。并对文化的平民化提出自己的见解，反驳精英对于现代文化大众化即是低水平同化的指控。并强调

了文化研究和社会科学实践之间关系的重要性。这些观点对于我们具有启示作用的。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作者站在西方学者的讨论立场来谈文化问题，其认识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同时，他的许多观点具有非常明显的后现代理论的痕迹，未免失于偏重。而且，作者在论及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延伸研究时，对于相关的问题把握也不够准确。这些显然是作者的认识局限性造成的。对于这一点，希望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坚持理性和批判的态度，取舍得当。

编者

献给哈罗德和乔治

序言：文化与后学科驱动

本书缘起于对这样一个问题的回应，这个问题是我在一个讨论小组听到的：“文化何以成为当今社会科学中如此具有挑战性的概念？”对于任何一种涉及社会探究的讨论来说，文化的极端重要性是如此明显，以至于起初我对提出这个问题感到吃惊。毫无疑问，整个社会学和人类学，绝大部分政治学，地理学，社会政策，社会科学方法论，部分经济学以及大部分历史学都关注文化。随着讨论的展开，我意识到那些谈论“文化转向”的重要性的参与者们把文化认知视为根本上全新的东西，似乎以前没有人点明过它的存在。反对这个观点的人们则试图聚焦于政治和经济因素，以它们为最终裁决来解释社会（the social）。文化转向论者的回复批评了那些把社会（the social）建构在社会（society）的物质组织上的努力所导致的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和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问题。我离开了这个讨论，有些疑惑这个争论是怎样产生的，文化论者和物质论者两个阵营又是怎样浮现出来的。

文 化

所有参与者们都把他们所认为的重要的东西正确突显了出来，不过，在他们的“战斗模式”中，谁都没有指出文化的真正涵义。不仅如此，我开始考虑至关重要的“文化的”“意义”意味着什么（而并非文化本身的重要与否）。文化转向论的支持者强调了某些重要事情——即社会科学应当重视文化——但事实上他们忽略了，社会科学早已重视文化。社会科学的大部分历史将文化及其后果置于优先考虑之中。例如，对礼貌（civility）和公民身份（citizenship）的探讨长期以来是各种政治研究的主要兴趣；自从地理学家们对人发生兴趣——就像他们对岩石和水的兴趣一样——以来，他们一直在探索文化问题。而一些类似经济学的社会科学，不过是借着“工具性”和“理性”的面具，更好地隐藏了他们的文化倾向而已。心理学家们近来才意识到，“精神”（the mind）一直就是一个文化空间；这点被科学研究追求隐秘真理（underlying truth）或一套可以解释社会行为的因果机制的事实所掩盖。所有上述情况下，文化意义都被悄无声息地卷入知识建构的过程中。

不仅仅只有一个文化的转向。某些更为显著的事情发生了——人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理解文化。我突然想到，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不是对近来出现的“文化”，而是为了提供某种地图，指示人们，社会科学过去和现在是如何看待文化的。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承认，通往文化之途是多元的。与其说这是文化转向，还不如说是文化回潮（a cultural swivel）。我立即意识到，单独一个学科无法提供一套用以解答这个问题的工具。即便类似社会学这样的学科，尽管它具备文化倾向，它

仍然与许多文化问题相隔离，这些问题创生于对国家、经济、精神、空间和地方等诸多领域的研究中。跨学科研究尽管善于提出新问题、突出不同知识领域的相似性，但仍然受制于学科倾向——认为这些问题只有通过严格限定于学科领域内的精确工作才能得到解决，这期间，每个学科贡献一块不同的解释性蛋糕。结果，对文化的思考确实提供了一些新东西——一个打破学科思维模式、熔铸一个后学科取向的新的机会；这个后学科取向冲破了学科藩篱，综合了各种优秀观念和有用的研究策略，而不管它们来自何处。这成为一个起点，由此出发，后学科方案探索在社会科学中，文化的既成涵义以及它可能具备的涵义。我在其他地方已经详细论证了在处理知识建构的问题时，采纳后学科策略的必要性（Smith 1998b）；但在这里我们有机会不仅进一步推进这项方案，而且开始使以下这点充实完善：即在再造社会科学的过程中，一种实质性的目标分析的后学科分析可以意味着什么。着手这项工作之前，还有一个附加条件。我希望在这本小书里对文化的意义提供一个宽泛的说明，但我不打算对文化联系和过程进行详尽无遗的描述。构成不断积累的文化研究总体中的部分研究不可避免地会被遗漏，对某些文化理论家不会进行详细探讨。因此，这项多少受限的干预工作其角色就在于勾画出文化研究和社会科学实践两种策略之间的相似性。

编辑启事

从我们角度看，出版业的目的可以简约为一句话：让更多的人分享有价值的思想。所以，我们不仅坚持一贯的主推严肃学术作品的出版宗旨，而且，在将来的岁月里，更会奉此为主臬，倾力推介品质优良的学术著作，以促动中国的学术繁荣和人文复兴。

不过，由于我们的学养和视野的局限，常常会犯遗珠于外、奉蔽为珍的错误，以致贻笑大方。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获得知识界的援手，也企盼得到真知灼见者的棒喝。如果各位读友有具价值的学术作品的选题，或者建议（当然更欢迎直言不讳的批评），甚至只是一些闪光的想法，请不要吝惜，提供出来与我们一起共享，（一经我们采用，提出者将获得我们赠送的数量不等的学术图书，书目见附录）一齐推动中国的学术出版事业的进步。

同时，我们经常接到一些读友的反映，说有些书难以买到。所以，我们开通了学术图书的直销渠道，各位读友可以任意购买附录中开列的图书。购买方法是：通过我们直销通道，请读友将需要的图书书目告诉我们，我们会立即回复告知是否有存余。如果有存余，请购买者将书款汇给我们并告知邮寄地址，我们接到书款后，立即安排邮寄和开具收据发票。凡购买我们图书者，均免除邮寄费用。一次性购买图书金额在 40 元人民币以上者（含 40 元），将享受 75 折优惠，同时免除邮寄费用。

建议通道：

联系人：崔文辉

电话：0431 - 5378029

e-mail: cui1209@sina.com

通信地址：中国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吉林人民出版社
学术著作出版公司

邮编：130022

直销通道：

联系人：崔凯

电话：0431 - 5378030

e-mail: cuikai1502@163.com

通信（汇款）地址：中国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吉林人民
出版社学术著作出版公司

邮编：130022

吉林人民出版社学术著作出版公司全体同仁 敬启

附录：吉林人民出版社学术著作出版公司学术图书书目

人文译丛

主编 何怀宏

- 名哲言行录(上、下) 第奥尼根·拉尔修/著 定价:56.50 元
- 希腊政治理论——柏拉图及其前人 厄奈斯特·巴克/著 定价:33.50 元
- 当代政治神学文选 刘小枫/编 定价:12.00 元
- 天国在你心中 列夫·托尔斯泰/著 定价:18.40 元
- 异端的权利 斯蒂芬·茨威格/著 定价:14.00 元
- 变动中的民主 约翰·基恩等/编 定价:18.50 元
- 民主的历程 约翰·邓恩/编 定价:18.50 元
- 思想自由史 J.B.伯里/著 定价:9.50 元
- 欧洲自由主义史 圭多·德·拉吉罗/著 定价:21.50 元
- 现代民治政体(上、下) 詹姆斯·布赖斯/著 定价:58.50 元
- 万民法 约翰·罗尔斯/著 定价:12.80 元
- 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 何怀宏/编 定价:18.60 元
- 西方政治传统 弗里德里克·沃特金斯/著 定价:17.00 元
-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 汉娜·阿伦特等/著 定价:17.40 元
- 自由的逻辑 迈克尔·博兰尼/著 定价:16.50 元
- 正义诸理论 布莱恩·巴里/著 定价:32.50 元
- 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 塔尔蒙/著 定价:19.50 元
- 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 安东尼·阿巴拉斯特/著 定价:32.00 元
- 自由主义思想文化史 皮埃尔·莫内/著 定价:11.50 元
- 和平的保卫者 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著 定价:12.50 元
- 革命心理学 古斯塔夫·勒庞/著 定价:22.50 元

大众的反叛 奥尔特加·加赛特/著 定价:16.00 元

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 F.A.哈耶克/编 定价:16.50 元

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 哈耶克、诺齐克等/著 定价:18.60 元

根除惯性——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形而上学 莉莎·克纳普/著
定价:27.50 元

陀思妥耶夫斯基论作为文化机制的俄国自杀问题 伊琳娜·帕佩尔诺/著
定价:15.20 元

巴赫金之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琼斯·马尔库姆/著 定价:16.50 元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女性问题 尼娜·珀利堪·斯特劳斯/著
定价:14.60 元

学术思想评论

主编 贺照田

第六辑 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 定价:33.50 元

第七辑 东亚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 定价:33.50 元

第八辑 后发展国家的现代性问题 定价:32.50 元

第九辑 并非自明的知识与思想 定价:29.00 元

第十辑 在历史的缠绕中解读知识与思想 定价:29.00 元

第十一辑 颠蹶的行走:20 世纪中国的知识与知识分子 定价:48.00 元

(注:《学术思想评论》各辑均 60 折,免邮费)

话语行动译丛

主编 汪民安

色情,耗费与普遍经济——乔治·巴塔耶文选 定价:23.50 元

哲学与政治——阿尔都赛读本 定价:31.50 元
游牧思想——吉尔·德勒兹,费德里克·瓜塔里读本 定价:25.60 元
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 德勒兹等/著 定价:28.50 元
论瓦尔特·本雅明——现代性,寓言和语言的种子 德里达等/著 定价:
28.50 元
日本近代国语批判 小森阳一/著 定价:18.00 元
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 子安宣邦/著 定价:22.00 元

西方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读本

主编 周殿富、韩冬雪

第一批:

自由主义 约翰·格雷/著 定价:14.00 元
资本主义 彼得·桑德斯/著 定价:14.00 元
官僚制 戴维·毕瑟姆/著 定价:14.00 元
后现代性 大卫·莱昂/著 定价:14.00 元
多元文化主义 C.W.沃特森/著 定价:14.00 元
福利 诺曼·巴里/著 定价:14.00 元
革命与反革命 彼得·卡尔佛特/著 定价:14.00 元
社会达尔文主义 彼得·狄肯斯/著 定价:14.00 元
文化 马克·史密斯/著 定价:14.00 元
社会科学 吉尔德·德兰/著 定价:14.00 元
主权 约翰·霍夫曼/著 定价 14.00 元

其他

开门——熊彼特传 洛林·艾伦 定价 35.00 元

目 录

序言：文化与后学科驱动	1
第一章 一个文化谱系学：从正统到分类	1
判断与价值	5
注意！本站点正在建设中：运作中的“自然符号”	9
文化传播的问题	14
对大众化的恐惧	17
文化，科学和权威的知识	21
第二章 文化与日常生活：平常即为非常	23
文化意义与选择性传统	25
文化与社会学分析	38
文化分析的焦点再定义	44
第三章 文化与结构：干预的逻辑	46
文化与唯物主义：马克思的遗产	46
干预的逻辑：文化与意识形态	49
文化产业	54
结构主义与文化	59

对主体的发明 71

迈向文化表征的复杂性 76

第四章 文化与霸权：迈向表达的逻辑 80

再现马克思主义的隐蔽过去：霸权和对话 82

文化走向政治：文化主义议程迎接新葛兰西主义方案 91

文化与政治变迁 97

迈向作为竞争性空间的文化 101

第五章 被争夺的文化空间：认同，话语和身体 105

通过文本重新思考认同 107

身体与权力 116

论事物的重要性 131

再造作为文化制品的客体：社会科学的新任务 136

第六章 文化与后学科的社会科学的前景 139

学科性质与复杂性 141

将被抹去的学科性质：认同，空间和地方 148

被质疑的学科性质：精神作为一个竞争的空间 153

学科性质基本完好：犯罪主体的（重新）建构 159

学科性质，学科间性与后学科性：文化分析作为一种催化
剂 167

参考书目 172

译者后记 189

第一章 一个文化谱系学： 从正统到分类

文化是一个重要、但又含糊甚至混乱的概念。当它的范围和相关性被清晰界定时，它的涵义相当丰富；然而它的涵义同样会很狭窄，尤其当它被用作为“社会交往”的同义词时。断言文化处于核心位置并不意味着其他任何事情都是次要的。当我们考虑“文化”一词可能的意义、内涵和用法时，我们面临的是大量的阐释和符号关联。我们怎么来弄明白这个概念？这同时是在标识出区别和一些假设，正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区别得以形成。对文化事物的研究经常会探寻一个特定社会的高雅文化中精英的实践和生活方式，不过，它同样也会研究生活经验以及日常生活的表达，比如，“阶层文化”，“种族文化”，“街头文化”，甚至“亚文化”和“俱乐部文化”（Thornton 1995）。通过各种行为规则，我们组织自己的思路，使我们经历的事情变得有意义。也正是通过这些行为规则，区别得以维

文 化

持。社会科学家和文化研究者们所作出的投身这个或那个文化层级研究的选择没有超出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主导性行为规则的范围。社会研究中的行为规则本身就是分类实践。这样一来，社会研究就包括了文化能动性（cultural agency）（不管它是有意还是无意），而这可以加强或动摇分析目标的存在条件。试想政治研究中的转变：起初人们把国家作为独一无二的目标来研究，后来转向了更大范围的研究：礼貌，横向和纵向网络，全球化和跨国关系，制度和运动。实际上，甚至有人认为国家已经被淘空了。

恰恰是这种人们借以研究另外一些人的方法必定导致这类问题。既然我们根本不能独立于我们所研究的事物（语言系统和特定文化价值，行为规则和既定的社会实践，知识生产的制度的和文本的环境，等等），我们所能采取的最佳立场就是承认这种状况，并努力明确我们使用的方法、阐明分类系统，以便投入分类实践（在范畴中确定事物的位置）。在对诸如高雅、低俗、大众、精英和通俗文化等各种分类的角色进行的讨论中，皮埃尔·布迪厄（1984）提出，“品味将分类者进行了分类”。在社会科学中，对一些权威性标记的迷恋也导致同样的问题，例如有效性，确实性，理性，真理，进步，等等。文化的等级使我们能够对一种艺术的好坏作出判断。同样，社会科学也有一个精心维护的、稳定的参照点，通过它我们标示出一部著作的“权威性”，这部著作能以恰当的声音说话。许多这类标示性的著作带有某些风格和术语，一种可以立即辨认出来的修辞规则——通过一些潜台词，它悄声说“我是真的，相信

我吧”。一切被视为有价值的作品，都被知识建构中所运行的区分规则加以衡量。

这意味着社会研究的生产和消费牵扯到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对话，还牵连到知识建构的文化政治，这个政治是基于相互对立的信任和质疑原则。此外，此一政治维度暗示了权力关系是怎样内在地构成为社会科学实践的运作方法的一部分的。通过对各种行为和认同的正常化和病理化（pathologizing），社会科学所产生的各类知识得以运作。如果权力要联系到它的后果来定义（即便我们仅只是集中考虑性别和种族），那么社会科学知识就需要对许多事情负责。在社会研究中，社会偏见的存在已经得到彻底的记录说明，但也许更意味深长的是，社会科学实践可以是男权中心或种族中心的（Harding 1986；Hewitt 和 Owusu – Bempah 1994；Guillaumin 1995；Richards 1997）。我们将从以下思考开始：文化意义是怎样成为分类过程中的一部分的。表达了公认的智慧和文化知识的社会科学实践模仿“权威的声音”；他们为特定的读者体现了特定的时代和场所的文化遗产。在这个意义上，交流过程——通过它，社会科学得以建立——包含了一种展示，这种展示向那些拥有若干起码的技巧对相关的信息、仪式和符号象征进行解码（decode）的特定读者传达了意义。

试考虑“文化”与“文明”（civilization）之间的紧密联系。这种联系在启蒙思想当中被建立起来，并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对完美答案进行追求的合理性。与他文化（other cultures）、尤

文 化

其与新大陆^①的土著居民的遭遇导致某些对照 (oppositions), 正是通过这些对照, 文化与西方社会的特定历史、社会逻辑之间的诸多关联得以产生。然而, 这一切数百年前就已经在欧洲作家建构的“东方”的文学肖像中加以排练。其结果是, 欧洲社会可以把他们对世界的征服理解为推进文明的进程 (cultivating process)。假如我们追溯诸如文化/自然、男权/女权、文明/野蛮、理性/情感、同/异这类对照的功能 (role), 就有可能发现它们是如何被相互连接起来以建构复杂的认同的。为了弄懂各种认同, 我们不是列出它们的特征, 而是列出局内人和局外人 (insiders and outsiders) 之间的联系, 并且提出问题: “我/他们是否其中成员?” 因此, 我们在考虑某些程序 (procedures)、用以判断这些分类的边界所处位置时, 尤其要小心谨慎。社会科学家们界定贫穷与 (或) 底层社会的各种方法并不仅仅是数据分析中技术上判断的结果。它们包含了对边缘群体和受排斥者的复杂表述, 而且明确表达了道德价值。社会科学家们设计出有关概念的事实 (或许得到一点来自营养学家、政府官员和政策导向的压力集团的帮助) 不应该误导我们; 关于首要和次要、绝对和相对贫穷的学术讨论, 和研究者们创造的任何方法一样, 都有强烈的政治效应, 并代表了某个特殊社会特定时间的文化价值。

^① 即美洲大陆。该词由意大利史学家彼得·马蒂尔 (Peter Martyr, 1457—1526) 第一次使用, 他在 1516 年的《海洋和轨道之谜》(*De Rebus Oceanicis et Novo Orbe*) 中记述了美洲的发现。——译者注

判断与价值

假如我们简略考察一番启蒙哲学家们的著作，我们能够发现有充分证据表明，活跃于欧洲社会中的文化意义和对探索真理的认可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在康德对判断和理性的探索中，我们可以看到某些过程，在这些过程中，与审美、道德和认识论有关的“教养”（cultivation）被视为文明化个体的标志。“文明人”是这样一个人物，他可以进行判断，但是严格限定在既有的权威知识生产的模式中——该模式有能力判断何为真、善、美。康德所进行的批判表面看来立足于坚实的基础上，因为，正如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所述，它们是通过“人种学”（raceologies）得以形成的，而那些人种学是欧洲文化的标志。康德认可奴隶制度为自然状态的产物，这点提供了一个便利的社会差异尺度，它赋予那些被他判断为有能力运用理性的人一种优越性（Gilroy 1993）。与此相似，卢梭有关人类实现其潜能的基础的论述本身建立在 18 世纪法国占主导地位的性别差异之文化意义的基础上。他论述道，对男子德行和女子德行的培养与一些特有义务的维持有关；因此，为了过一种与苏菲——她不能对真理作出判断——不同的有教养的生活，爱弥儿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教育。判断能力是主动参与到道德、审美和认识论共同体的产物，正是通过这些共同体，我们确定有关何为真、善、美（当然还有假、恶、丑）的分类标准。为了理解文化，我们必须知道一种方法，其中，它的意义与特定的

文 化

历史和社会情境相联系。这就牵涉到对那些有关人们的实践和生活方式以及人们如何弄明白他们自身状况的问题进行谨慎的分析。

许多文化研究设计了各种复杂方法，用以对不同文化的文本和实践进行分类；对他们的做法仔细加以考察，我们可以受益良多。文化与教养之间的关联（就像权威知识与特定教育形式之间的联系一样）仍是当前讨论的一个特征。当我们将我们的文本、文化制品（artefacts）和实践归入不同的范畴，赋予每个范畴不同的价值和地位时，我们就能发现这点。要点明我们处身于其中的分类实践是困难的，所以我们可以从一个历史范例开始，这个历史范例是任何一个曾在 19 世纪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分类陈列前流连过的人所熟知的。文化分类和权威知识建构之间存在紧密联系的一个有效例证可以在维多利亚时代各博物馆展示他文化的政治态度中找到。

我们还应该承认早期文化人类学在根据“进步的行军”（march of progress）所作的人种学分类中所起的作用。文化人类学家倾向于以一种进步等级（scale of advancement）的眼光来看待各种不同文化的实践——其中，西方的工具性社会体制处于文明化进程的终点。他们通过对各种工具的陈列表达了这一点，而那些工具是按照从简单、通用到更加具体、特殊的顺序排列的，以便于观众能追随从原始到复杂的运动轨迹。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观众将他们自身置于进步等级的顶端，其他人则位列他们之下。亨丽埃塔·利德奇（Henrietta Lidchi）认为，民族志（ethnographic artefacts）被视为“对他文化的社会—文化

第一章 一个文化谱系学：从正统到分类

复杂性的物质体现”（Lidchi 1997: 190）。文化被简化成了文化制品，反过来，这些文化制品依照其在人种学等级（raceological hierarchy）中的位置得到理解。它们的意义通过表征系统得以固定，该表征系统提供了有关人类发展的言之凿凿、看似合理的叙述。

种族中心主义人类学者的介入确保了这些表征被视为对以下情况的“真实”描述：西方社会是怎样形成的，以及它们是怎样被认为是先进社会的。这样的展示被认为是对他文化的认同以及他们在一个等级秩序（a pecking order）中的位置进行的精确描述，而不是某种文化对另一文化所做的复杂陈述。当然，他们是否经受这样的解读有赖于观众理解该展示的方式，也有赖于观众对人种学的熟悉程度——该人种学使文化差异得以成形。围绕人类物种起源的争论在时间上早于查尔斯·达尔文的观点的出现，同时也被后者进一步激发；这些争论为如下观念的普及提供了切实的机会，即文化差异是有关人类进化的现存的提示证据。这一点是学术上争论文化差异是否反映了人类物种不同的进化路径（多源发生论）这个问题时的重要特征。社会达尔文运动讽刺了这个有关人种进化的描述，如此他们就可以在他們自身的社会中将人们分类，得出“进化失误”或“退化”的例子；这很像早期人类学家对非西方文化的分类。其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制度上的绝育计划，例如美国林奇伯格殖民地的情形那样。到 20 世纪早期为止，人种学等级已成为流行的百科全书和学校教科书的共同特点。在那些表述中，欧洲文化被置于比其他文化更为优越的位置。

文 化

明确指出过去分类的独断性质是很容易的（尤其对那些将可以轻易识别的偏见转化为事实的分类），不过当我们考虑我们自己的分类实践时，我们也面临一个问题。我们据以建构差别的判断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理解社会世界的方式的一部分，以至于它们经常难以辨认。这就是“文化之谜”；文化研究所要辨认的差别，同时也正是我们首先据以界定和评价文化实践和文化制品的理所当然、常识意义上的假设。对于我们界定文化、评价各种不同的人类活动的方式，我们所处的分类体系扮演了一个塑形的角色（a shaping role）。例如，对品味的判断倾向于利用康德基于超然公正立场所做的审美判断（Kant 1790/1987）。这意味着，那种认知和评价只有通过一个普遍原则的运用才能获得，其中，美是因其自身的原因被指认的，而不是因为愉悦，不是服从于道德目标，亦非作为投入或因其负载了某位成名艺术家的手迹。在康德看来，个人的偏爱或兴趣永远不应成为审美判断的基础。倘若品味存在于所有人当中，那么它必须无论何时都要运用于所有人（在康德的著作中，他指的是所有人）。

乍一看，这暗示审美判断应该超越不同时间和场合的偶变性质（contingencies）。然而我们还应该承认康德的另一观点，即审美（品味批判）包括了只有通过对许多形式的探索才能得出的“反思判断”，在这多种形式当中，品味是在由历史和社会双重确定的位置上被理解的。此外，在我们考虑康德基于理论功用而将艺术视为实践技能时，我们也在把康德作为一位宏大理论家的通常画像引向问题化。他通过对交流的类比来界定

第一章 一个文化谱系学：从正统到分类

艺术——通过修辞与诗歌类比言语，通过建筑和雕塑类比姿势，通过音乐和色彩类比语调。因此，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一个负责对于美建立普遍性分析的人，同时也牵涉到作为文化实践的艺术中，这种文化实践位于特定的状况下（其中，技能是在文化制品的生产和接受中被实施的）。和任何他人一样，康德也被文化之谜所绊。因此，最终，正如科学家们从伦理和审美中得出其他类型的判断一样，审美判断也经常是在真假艺术之间得出的。

注意！本站点正在建设中：

运作中的“自然符号”

假如我们考虑文化意义和实践中更为集中的部分，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一些暗示。为此，我们不得不主要关注玛丽·米齐利（Mary Midgley 1996）所谓的“哲学探测”。对于“正当”的行动过程以及何为“好”结果这类问题我们建构了不同的假设，而我们的建构方式对于我们的决策和行动而言有重要的暗示作用。一切指向环境的途径都是合乎规范的，因为，他们对自然世界、环境问题进行描述和概念化的方式，以及他们所认为的“应该”对环境产生影响的事情，二者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例如，亚当·马卡姆（Adam Markham 1994）考虑了污染的涵义，历史上那是有关人类对环境造成影响的关键论题。正是在将污染作为一个问题的认知当中，我们看到正义概念（以及伴随而来的有关何为“美好生活”的观念）首次与生态学关切

文 化

紧密连接起来。人类对环境的影响一直具有某种马卡姆所称的“神人同一边界” (an anthropomorphic edge), 也就是说, 任何解释污染的尝试都充满了类比、隐喻和内涵 (connotations), 它们赋予自然事物和过程各种社会属性 (无论我们将自然视为一架机器、一个女性存在、一个系统还是某个神秘、神圣计划的一部分)。基本上, 自然是文化的!

有关世界的神学图景认为, 一切事物通过一条复杂的“存在之链”相互连接到一起。在这样一个对世界的想象方式中, 污染被视为“事物的错位” (matter out of place)。这种生命观将污染定义为存在链条中的反常存在, 或是对事物的正常秩序的越界。有关污染的如是理解通过以下方式得到了加强: 准备食物的仪式, 以及用来防止通过食物来传播疾病的传染病的规则。“污染”是一个符号构建, 我们是通过它在一个明确状况下的位置、以及它与诸如清洁/不洁这样的二元对立之间的关系来理解它的 (Douglas 1996; Meens 1995)。在科学情境中, 污染经常被视为朝向物质进步的驱动的副作用, 也被认为可以通过科学方法加以鉴定的技术方案予以解决。不利用文化上确定的词汇是难以传达意义的。

如尼克·菲德斯 (Nick Fiddes 1991) 所说, 肉也可以被视为“自然符号”。食肉的文化意义与我们看待环境的方式有关。菲德斯关注各种变动模式, 其中, 肉食消费被实践和认同的方式随时间、文化的不同变化显著。

食物本质上不具有象征性。它们被用作象征。例

第一章 一个文化谱系学：从正统到分类

如，当我们被告知煮熟的肉食和蔬菜象征了女人作为家庭主妇的义务以及她丈夫养家糊口的义务时……食物自身并不代表操持家务和维持家计。价值在于各自的性别角色，同时，食物则是这些价值得以传达的媒介……肉食当然可以被说成是象征……既然它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经常比它在纯粹营养价值方面被人期望的更加重要……今天，使得肉食广受欢迎的无声的象征价值主要涉及到我们与自然的关系，我们意识到这点。这样，正如被发现的变动不居的习惯一样，针对肉食的变动不居的态度也成为对重大的社会发展的雄辩注解……因此，肉食不仅仅是肉食；它还代表一种生活方式。

(Fiddes 1991: 41 - 5)

西欧社会中，作为一项进展良好的社会实践，为获取肉食的畜牧业已经存在了好几个世纪。在现代早期，肉食消费是和地位相联系的，不同等级和财产之间的差异通过根植于品味中的特性标示出来。某人在一个复杂社会秩序中的位置是依据他参与仪式的方式以及他在主导性的文化等级分类中被定位的方式而得以确立的（该地位与特定社会技能和知识形式相联系）。他们的饮食习惯越奢侈、食物越精致，他们的地位就越高（一些特殊群体的禁欲生活方式除外，如清教徒和僧侣）。这点对健康来说不幸具有副作用。例如，贵族们过度食肉造成严重的肠胃问题，与之相比，农夫“如厕时轻松通泰”（passed stools

文 化

like cow pats)。然而，肉食消费的增长与过去两个世纪来社会等级中新兴阶层或群体的逐渐出现相关联。晚近以来，肉食越来越与其在健康和 unhealthy 的生活方式中的位置相联系被分类。不过，红色肉类^①仍然与激情、浪漫以及攻击性的男性气质概念相联系。这样一来，文化意义经常包括了一些价值假设，不管它们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一个判断无论如何都要取决于我们自身的价值）。

我们对社会和自然世界之间的关系进行阐释的方式提供了一个方便的例证。在环境问题的讨论中，对于人类评价自然的方式存在两种主要方式：要么，溪流，江河，湖泊，树木，森林，山脉以及生态系统是“它们自己的目标”；要么，它们是“它者（人类）达到目标的手段”。前一种观点的支持者（他们认为自然之物有其固有价值，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人类的需求和利益）认为，保持了野生状态的地带应该留置，不让人们使用。对于约翰·缪尔^②（1904）这样的环境保护主义作家来说，具有自然之美的地方不仅正在迅速消失，他们更应被视为“圣殿”（temples），在那些神圣的地方，人们可以通过与自然之间的密切交流让他们的内在自我重新充满活力。美国联邦政府决定开辟国家公园，保护约塞米蒂地区（Yosemite）不被开发，用缪尔神人同性论的语言来说，“让群山欢喜”。

① 指在烹调前为红色的肉类，尤指牛、羊肉。——译者注

② John Muir, 1838 - 1914, 英裔美国博物学家，他建议建立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译者注

后一种自然“工具论”的支持者则更加关心自然场所怎样服务于人类的休闲娱乐，或者怎样为人类事业提供资源。对吉福德·平肖^①（1901）而言，野生地带仍然是某种以后可以通过科学控制来达到人类福利的最大化的“资源”（以确保用最小的花费获得最大的回报）。平肖的自然资源管理论关注的是找出有助于实现人类进步目标的最有效率的方式。他对自然世界的态度（自然资源的保护等同于发展）、以及其中的功利逻辑均成为既定的自然资源保护行动。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现实运作中两种截然不同的哲学，它们表明，针对人类理解和处理自然世界的方式，差异巨大的假设和价值会怎样导致各自独立的取向（Smith 1998a）。相比平肖的自然资源管理论所鼓吹的对自然的精心利用和管理，缪尔的环境保护主义取向更少具有政治诉求。发展既是切实可行，也是人所想往的。对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幸福的追求与平肖据边沁的格言改编的陈述相联系，即“在最长时间里，为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的利益”。根据这个观点，有限的资源应该被开发利用，只是应该通过明智、稳健的方式，而且将浪费控制在最低限度。缪尔以及后来的阿尔多·李奥帕德^②等人关注的是对“自然秩序”的“破坏”。在《沙郡年纪》（*A Sand County Almanac*, 1949）中，李奥帕德概述了“现代”城市生活将日常生活与自然环境阻隔开来的种种方式。

① Gifford Pinchot, 1865 – 1946, 美国保守派政治家，曾在1898年至1910年任美国林业部门领导——译者注

② Aldo Leopold, 1887 – 1948, 生于美国爱阿华州的伯灵顿（Berlington），被誉为野外生物生态学之父、威斯康辛州的英雄。——译者注

文 化

（与科学知识、伦理和审美相对照）对判断标准的鉴别是理解李奥帕德和平肖著作的关键。在平肖的自然资源管理理论取向中，关键的连接是建立在他的“善”（good）之概念与科学的“真”之概念的紧密联系中。李奥帕德，正如他之前的缪尔一样，将“善”与对“生物界的完整、稳定和美”的审美判断联系起来，而不是与单纯的经济便利相联系。这并不意味着李奥帕德相信美不具有价值，恰恰相反，他提醒人们价值评估过程应该认识到金钱之外的因素（即知道某物的价格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确立了价值）。当我们估价事物时，我们经常难以将真、善、美的判断分离出来。这类判断穿越时空的变动提示我们，它们是特定实践的产物，但尽管如此，它们之中仍然有相当多的连续性。这些被文化确定的判断是如何历经时间之流的冲刷而延续下来的？我们将在下一节讨论这个问题。

文化传播的问题

当我们考虑特定的假设和价值是如何代代相传时，通常都会强调某个学科伟大的奠基性著作，以此作为我们的判断参照点。当然不应该将正统著作（canonicity）视为理所当然，而是应该使它得到给养、复制，并与特定历史和社会中的读者相关联。正统著作是否获得权威并流传下来，有赖于它们提供参照点和适当的故事讲述标准的方式。在学术圈内，这些读者（学者，研究者，教师，学生等等）都经历了对公认的观念进行吸收的过程，如此他们才能理解现行的叙述结构。有关青少年犯

第一章 一个文化谱系学：从正统到分类

罪、福利供应或是精神的认知结构的某个具体记述是否可信，要取决于现行话语的有效性（它们是否能够操控意义生产，使得经过编码的意义被人们识别并接受）。建立正统著作的连续性的关键机制在于社会化过程的确立，其中，一个标准将由那些生活在该社会中的人复制出来并获得认可。文化传播理论——它们强调正统著作中的假设和价值被接受的重要性——是一个学科合法化框架中的核心部分。文化传播模型经常被从事背诵、测试相关的正式学校教育的教育实践所采纳（Illich 1971）。这些模型背后的假设是，观众是被动的接受者，他们没有机会去构造他们自身的意义，或至少创造出任何一种“价值”的意义。这一粗糙的感知模型甚至被卡尔·波普形容为精神上的木桶理论（bucket theory）。这些模型或多或少暗含了一些分类实践，它们假定，文化形式存在于一个等级制里，而且毫无疑问需要将事物置入固定的鸽笼式分类中（尽管在有关它们的归属问题上差异极大）。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正统著作成为语言的一部分的方式，因此，如果一个人不考察他自身的语言，就难以说话或写作了。假如我们聚焦作为一个知识领域的社会学，我们会发现一长串被否决的命题和观点，以及显示了批判反思的突变和断裂。然而，当我们考察社会学话语是如何被引导的时候，某些因素被重复表达了；因此，对阶级和权威这类概念进行界定的特定方式就是权威性表述形态当中的通常特征。或许在社会学词典中，最为显著而且不言而喻的经典人物就是马克斯·韦伯。无论在理论形态还是在经验研究中，韦伯方法取向的概念、观点

文 化

和假设都是显而易见的：运用人类想象去形塑经验；构造理想类型（ideal types）以对复杂数据进行赋形（give form）和形塑；因果关系以及试验标准被识别的方式；关键的概念区分的运用。从现象学到马克思主义，韦伯的观点在相当广阔的范围内得到应用。很少有人称自己是韦伯学派的，因为几乎没有必要这样做，社会学家或社会研究者的标签就可以起同样的作用了。

文化传播模型有许多缺陷。最重要的一点是在有关文化意义的讨论上，它把观众视为剩余范畴（residual category），将解释的重负施加于试图体现和模仿正统经典的行动者（agencies）之上。此外，它极少考虑文化意义得以从中产生的复杂环境，结果，它捕捉不到意义以及文化边界不断变动的方式。它还困惑于行动者是怎样通过再生产伟大著作对过去的实践进行重新阐释的。这个善于游说的模型渴望改进事物，渴望与过去的“成就”攀比，还渴望将这样的实践带入未来的时代。然而在做这些时可以说它一如既往地失败。该模型的支持者会以全然不同的方式用新的因素来重新表述过去的因素，而这一切又会被不同时空下的特定观众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加以解读。

遵循同样的方式，那些将他们的分类标准强加于他们的研究对象的生活之上、忽视其鲜活经验的社会科学家们也落入同样的陷阱。文化传播问题可以这样来看：我们是怎样使自己确信，我们可以用他们一度用过的方式来做事情。或许因此而出现的最有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我们感到有必要在正统著作上投入精力，对审美、科学和伦理作出“权威判断”的动机意味

着什么。对观众接受的过度简化的描述，同时也是这个模型的中心，它与评价人们的方式相联系。价值的源泉不是来自于那些投身于文化实践的人们的现实经验，而是从那些被假定为能作判断的人的判断中寻找的。分类等级体系的困难在于，在我们赋予某些事物价值的同时，我们贬低了其他事物的价值。

对大众化的恐惧

文化领域中最频繁地被贬损为粗鄙、低级和琐碎的莫过于“大众文化”。以“大众化”的标签界定一个知识领域或一套实践，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已经玩了一次分类游戏；而我们是在文化分类等级体系中玩这个游戏的。文化传播模型不考虑“大众化”这个词语的意义自身相关联的方式，不考虑它是通过与其他范畴相关联的位置才得到界定的。假如我们将大众化界定为平易近人（或者以贬低的方式将其界定为“迎合底层大多数人”），我们同时将它的对立面界定为深奥的实践（或者说是“高雅”文化实践的正面价值）。当然，这种分类极为武断，它建立在非常复杂的价值评估过程中，对于该过程，只有放在它们得以产生的时空背景下进行理解的时候它们才有意义。

我们可以在文艺评论中看到将文化分类视为等级体系的一些后果，具体来说，可以看看利维斯（F. R. Leavis）的文化评论，他发展了马修·阿诺德的文化和社会评论传统。利维斯认为，艺术、文学和哲学中的智识教养和高等文化能否流传下来，端赖于维持高雅和低俗（或大众）文化分类的有限机制。

文 化

在这些取向中，文化知识被认为是通过那些愿意、并且能够体现文化遗产的“权威声音”加以传播的。正是那些“评论家”执行了一个文化中一切优秀的、有价值之物的保管人（custodians）的角色。对利维斯学派（Leavisites）来说，“聪明的少数”应该替那些“无知的多数”作出明智的判断。保管人的角色只能给予这些人：他们受过训练，有能力“辨别文学艺术的优劣”，而且他们能够决定文化中的哪些部分是有价值的。利维斯尤其关注好莱坞电影对两次世界大战间的英国造成的影响，找出了一系列对“年轻的心灵”（young minds）造成损害的文化代言的例子（例如，埃德加·里斯·伯勒斯的小说《人猿泰山》）。这类观点甚至延伸至 20 世纪早期的社会科学论述当中。例如，西里尔·伯特（Cyril Burt 1925/1961）在他的青少年犯罪的报告中就得出了这类结论。只有保管人才能判定一个文本是否一部“伟大作品”，一位作者能否荣膺“经典作家”的身份。其他任何人当然不具备这个能力，而且应该接受这些保管人所带来的二手判断。依照这种方式，我们可以看到以下两类事物之间的分化：一类是有价值的文化，它应该被保存并且由后代传承；另一类是文化经验，它被这种取向视为肤浅和逃避现实的娱乐，而且会破坏对精神的积极利用。这样的介绍显示出，如此的知识模型是相当粗糙的，因为它采纳了“人们可以被轻易操纵”的观点。

对利维斯而言，20 世纪文化中的大众产品以及产品和意义的标准化是罪魁祸首。在他的《大众文明和少数文化》（*Mass Civilisation and Minority Culture* 1930）中，他提出了标准

第一章 一个文化谱系学：从正统到分类

化工业组织对于我们如今所称的“英国中层”（主要是中产阶级和中间阶层 [middle brow]）的社会和知识结构所造成的破坏性效果。

如今，倘若大众产品和标准化的最坏影响由伍尔沃斯^①的连锁店所代表，那就不用感到绝望了。但是，有比这更加严重地触及社会生活的影响。例如，当我们考虑出版形式中的大众产品和标准化的过程时，显而易见存在灾难性的后果，即伴随而来的是低水平同化（levelling down）的过程。

（Leavis 1930: 7）

当然，利维斯关注的不是下层社会；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受过教育的中间阶层，他们被那些受过最好训练、最为称职的人以从事伟大事业为由，从正道引入了迷途。利维斯的著作经常着重分析类似《每日邮报》（*Daily Mail*）上阿诺德·本尼特（Arnold Bennet）以及广告者（由心理学家声援和鼓动）等评论者造成的影响。这不仅使通货贬值，而且是普遍倦怠的征兆。利维斯相信，他正在见证如下事实：随着大工业生产和郊区化的“可怕后果”对地方生活的破坏，社会和道德结构在分崩离析。利维斯和汤普森（Denys Thompson）在他们的《文化与环境》

^① F. W. Woolworth, 1852—1919, 美国商人，从1879年开始，他成功地建立了全国5分和10分钱连锁店。——译者注

文 化

(1933) ——一部针对培养品味和鉴赏力的教师的手册——中，试图从这类破坏中重建有机的共同体 (organic community)。

变迁——就我们的观点来说，是破坏——的重大原因当然是机器，一种外加的权力。机器带给我们许多便利，但是，它也摧毁了旧的生活方式和旧的结构，又因为持续快速的变化，它牵连、阻止了新的生活方式及结构的成长。此外，大工业生产中它带给我们的便利已经导致纯物质产品领域以外的标准化和低水平同化。那些在学校里被灌输（或许如此）了有关品味的最初教育的人们，出了学校即受到最廉价的情绪反应式的竞争宣传的影响；电影，报纸，各种形式的广告宣传，迎合商业需要的小说——都提供了最低水平的满足，而且谆谆教导要以最少的精力去选择最直接的快感。

(Leavis and Thompson 1933: 3)

这种相当简化的广告者模型和低劣的评论家破坏了标准，将重要的评论还原至底层共同点；它们还可以在法兰克福学派——他们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得到灵感——的文化评论中找到。这种文化态度类似于另外一些科学家的态度，他们希望自己对事情的见解最具权威性。在一个大众传媒和大众教育广为接受的时代，很难支持这种取向的文化政治学成为知识。事实上，这种取向在突显有关文化的这一精英阐释和道德规范之间的联系方

面是有助益的。

文化，科学和权威的知识

科学文本和科学家无论在自然科学还是在社会科学中都能被经典化 (canonized)，而且可以成为衡量何为有价值、有作用的理论和方法的尺度。当社会科学文本及其作者取得广泛认可的权威性时，就值得用这些术语来思考他们了。在社会科学中，大多数学科有自己的经典，无论这经典是经济学中的亚当·斯密、约翰·梅纳尔·凯恩斯或米尔顿·弗里德曼，心理学中的约翰·B. 华生 (John B. Watson) 和爱德华·C. 托尔曼 (Edward C. Tolman)，抑或社会学中的卡尔·马克思、埃米尔·涂尔干、马克斯·韦伯或塔尔科特·帕森斯 (也许还有安东尼·吉登斯)。当这些作者及其著作被视为某个特定学科的基础时，经典化过程就开始运行了。他们成为备受尊崇的参照点，被用来判定某个具体研究、方法或陈述类型是否值得信任。我们当然都需要遵循一些工作原则，但在我们更应该具备批判性的时候，我们却经常在我们的知识起源处落入盲目崇拜的陷阱。用以判断科学、艺术、文学和文化中的研究是否有价值的标准都非常相似。或许，我们是如此习惯性地认为横跨艺术和科学的社会科学具有各个分离、独特的领域，以至于我们经常忽略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将它们全都统一起来的是人类的判断，以及使那些判断似真的推论条件 (discursive conditions)。

想一想那些作为知识保管人的科学家们 (比如文艺评论家

文 化

们)，他们最熟悉知识，而他们削弱了批判和质疑的取向——这正是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用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资格的东西。这种情况部分是启蒙运动中教义（dogma）与精神气质（ethos）之间的冲突所导致的结果。这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它寻找关于普遍法则（laws of universe）的完备、可靠的阐述；其二，它同时声称这一目标只有通过系统化的怀疑和批判性的探查才能获得。对真理的鼓吹屡屡误导社会科学家，以至于假如我们还将这种固执倾向运用于最新的情况中的话，那将是不可思议的。然而，我们仍然渴望确定性和客观知识。甚至小心谨慎的科学哲学家，——从卡尔·波普（1959, 1963）、伊米鲁·拉卡托斯（Imre Lakatos 1970）到罗伊·巴斯卡尔（Roy Bhaskar 1989），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发现了知识的“可疑”（fallible）——对于这一寻找圣杯的宏伟任务仍然是口惠而实不至。他们仅仅是搁置了问题。说我们的知识可以为真，直到它被证伪、或出现对关系和结构的更好的解释，这仍然是将现存理论同时看作为真实的。因此，知识可疑论（fallibilism）牵涉到对一种修辞意义上的策略的运用，该策略填补了下一次宏图大业施行之前的空白；这很像美沙酮^①作为一种缓解策略，减缓了对海洛因的欲望一样。大多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仍在玩真理游戏，因此，如同目前针对基础和本质的争论所显示的那样，或许学术界有为数更多的密室真理（closet truth）的瘾君子。

^① 美沙酮是一种有效的合成麻醉药，不像吗啡或海洛因那样容易让人上瘾，在戒毒治疗中被用作这些毒品的替代品。——译者注

第二章 文化与日常生活： 平常即为非常

一旦我们认识到文化意义并非简简单单地从一代传到另一代、从导师传到弟子、或者从精英传向大众，我们的注意力即可改变方向，放到这个问题上来：“理解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如何是可能的？”意义的生产于是可以被视为持续的再创造过程，而不是对信息的认知与认可——这种信息记载在权威的文本当中（这既是文化精英论、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耀眼理论的特征）。在第一章我们已经看到，对文化意义的准确说明远比我们经常设想的要更加困难。这意味着，存在一些超出人们的明显倾向以外的东西，它与术语上的意义不一致。文化是一个“缝合”概念：它显示了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内，有关人类生存的各种相互竞争的描述已经陈旧过时（be played out），而所有这些描述都试图将文化意义固定。它还意味着，任何试图以一种描述来解释所有事物的做法都有失败的可能。不过，某

文 化

些文化概念和特定的文化分类模式出现时显得不容置疑，在很大程度上这跟知识体系一样（有关诸多“真理”及相关划分标准之兴衰的更广泛的讨论，参看 Smith 1998b）。总之，文化概念是一扇敞开的窗户，通过它，我们可以在某个特定场合辨识出正在起作用的假设、价值和分类系统。此外，文化的界定方式可以告诉大量东西，这些东西和本章及以下几章里我们所考虑的取向是有关的。

文化研究应该包括对诸多表征形式（representations）及日常生活的现实经验进行探索，这样一个观念的出现至少部分要归因于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实践——它们包含了介入（involvement）以及受到挑战的超然立场（detachment）。特别是人类学，它强迫我们直面显而易见的东西。通过观察异文化的现实经验（西方和非西方），他们的仪式，家庭结构，求爱模式，礼物关系，从童年到成年乃至老年的转变等等，我们可以开始辨识我们自身的文化独特性何在。总之，当我们意识到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其实很不寻常时，这个意识将立即突显出隐含的知识，同时将支配有关我们自身体验的行为。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通过对我们自身的社会生存试图加以理解、从而对我们构成挑战，文化研究方案正在继续社会人类学的未竟事业。人类学引导我们将文化研究贯注到社团、群体或社会的日常生活当中。

不过，这并没有清楚说明文化观念的发展。按照雷蒙德·威廉斯（1983）的说法，文化通常是人类知识、也是社会科学中的核心“关键词”之一。这不仅仅是说，我们借以理解世界

的最核心的观点和概念是定位于被社会和历史所确定的文化当中的，而且“文化”观念本身也是这样定位的。因此，将文化意义限定在一种单一观点的表达中，或甚至将限定放在所谓的文化知识当中（例如，“伟大的小说家”，“严肃作曲家”，或者“科学天才的著作”）都忽视了大量值得一位社会科学家去探究的东西。通俗文化被认为无足轻重，有时还遭到诋毁。我们知道，当人们以嘲弄和奚落来护卫“既定的知识群体”时，某些事情就会受到挑战，公认的观念也会遭质疑。文化仅仅以喃喃自语的方式传递——这样一个观念忽视了涉及参与者相互对话的交流方式。然而，人类社会的文化维度是当代社会研究中最显著的领域。你很快会发现，对社会科学中的文化进行思考和理解存在一些困难。因此，为了理解这些复杂的界定和分类的问题，我们将首先考虑，由人类学发展出来的文化概念是怎样转变为文化研究的、又从文化研究转入社会科学的。

文化意义与选择性传统

或许，我们所应对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就是社会科学知识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关系、他们的制度以及他们理解世界的方式之间的关系。社会科学知识的历史应该被视为一系列对社会秩序及其组成部分的超然（detached）描述。社会科学家们争论“社会”（the social）的特征和构成，但同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过去两个世纪里，大多数对社会的描述当中，分析客体很大程度上与分析者保持了一定距离。社会科学家们

文 化

持有一个虚假理由，即在某种程度上认识主体与社会关系和制度是相互脱离的——而正是通过那些社会关系和制度，他们才学到了语言，获得了身份，也取得了由历史和社会所确定的、对他们在这个世界的位置的理解。因此，认为社会科学研究者可以（事实上，过去一直如此）融入他们的分析客体当中，这个观念与过去实践的本性是背道而驰的。这并不是说，对超然立场的挑战在社会研究中不存在，正如本章将指出的，这些挑战如今仅仅是不再遭受冷落了。

社会研究领域，朝向**超然立场之终结**（*death of detachment*）的最重要的努力之一就是文化研究。为了说明这点，我们先从文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界面事实（*interface*）开始。如果我们将雷蒙德·威廉斯（1961：41-71）作为出发点，我们可以看到考虑文化的三种重要方式。

- 作为理想典范（*ideal*）的文化，它是完美、普遍价值的体现（人们思考以及写下的最好的东西），因而分析要做的工作就是探寻、发现那些艺术家和作家的生活或者他们的作品中的永恒价值。

- 作为“文献记录”的文化，其中记录了人类的思想、语言、制度、习俗和经验，部分是作为描述行为，同时也是一种分类，其中，通过把它们与理想典范进行比较，通过对受质疑的文本品质的参照或是通过对文化出现其中的特定传统和社会的参照（因而价值评估要与某些标准相联系，以确立其权威性），人们对文化作出评价。

第二章 文化与日常生活：平常即为非常

• 作为社会、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文化，由此它表达了社会群体的情感结构，因此，应该依照（有时候是隐藏的）日常行为和社会制度的意义与价值、同时也依照它们在艺术和知识中的位置，对它加以分析、澄清和评价。

这三种文化陈述紧密相关。“理想典范”是中心角色，尽管对它在文化分类形式中的功能有相当不同的思考方式。在把文化作为社会的概念化过程中，依照它的语境，威廉斯（1961）仍然强调精细的学术分析的作用。

学术性和想象性著作被人们联系到特定传统和社会加以分析，但其中还包括对生活方式中的要素——对其他定义的追随者来说，这些根本就不是“文化”——进行分析；生产组织，家庭结构，制度结构等表达或控制了社会关系的因素，社会成员特有的相互交流的形式。

(Williams 1961: 41 - 2)

对威廉斯而言，由文本或实践所体现的所谓“绝对价值”和由历史与社会所确定的习俗产物一样，只有在一个传统或社会的现行“情感结构”中才有意义。因此，在维系意义和价值方面，社会遗产扮演了一个特别角色。这并不意味着价值和意义可以被传播，而是意味着，艺术表述的位置和价值问题必须承认社会存在的复杂性。我们能够取得的最大成就即辨识出一种文

化模式 (*pattern of culture*)。它被定义为“各种兴趣和行动的选择及构型, 对它们的一种详细评价, 一个独特组织的产生, 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几乎不需要表达的经验集合”(Williams 1961: 47 - 8)。任何既定时期的文化文本、文化制品和实践都提出了无数需要重新建构的问题。事实上, 这个“情感结构”仅仅存在于那些作出过认同、并且延续下来的人之中。在很大程度上, 我们传承了剩余物 (*remnants*), 然而, 那些内容是通过文化生产和传播的非正式机制以不可预测的方式延续下来的。任何试图重建过去文化记录的努力 (没有活生生的证据) 仍然止步于近似, 一种“某个时期的文化” (*culture of a period*) 而不是“活生生的文化”。

如果我们考虑对日常生活的文献记录式描述, 例如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那些民意调查的研究者们所做的工作, 我们即可开始简单描述对日常生活的关注。这样一些研究可以成为重要的“神话引爆者” (*myth - exploders*), 它们对有关过去的公认观念构成了挑战。比如, 对二战时期处于闪电战中的英国的民意调查研究发现, 存在显著的痛苦、不和、阶级划分及怨恨, 这质疑了战后盛行的有关战争描绘的团结一致的印象。以活生生的证据去见证过去的文化, 例如由史蒂夫·哈弗里斯 (Steve Humphries) 那样的文化历史学家搜集、编辑的口述实录, 起到了类似的作用。通过运用个人经验、追溯生命史, 哈弗里斯和戈登 (Humphries and Gordon 1993) 证明, 对于自我性节制的无差别的一般化, 以及 20 世纪早期的对人物和谐一致的描述, 这些对日常生活都作了简化和误导性的描绘。20 世纪 30 年代

第二章 文化与日常生活：平常即为非常

至 50 年代，对曾经的“青少年罪犯”进行的访谈表明了未被记录在犯罪统计学当中的轻罪的分布程度。与此类似，对政治活动家和警局官员的访谈记录表明，两次大战期间存在大量公众骚乱，而这在标准的历史叙述当中是没有的。然而，这样的研究更容易对某个特定时间和场合中的情感、事物进行清晰的重构。以下摘录的是 Hull 有关二战时期的空袭的回忆，它提供了进入文化史的一个例证。

防空洞就在庭院下面。我们和三个孩子一块动身，你知道，两个紧紧抓住我的衣裙，我还背着约翰。你必须用臀部背他，因为他太大了。我们慢慢走着，抬头看看天空，你会发现那些闪闪发光的东西。你总会觉得它几乎就在你头顶上……它让你筋疲力尽，你知道，所以你没有精力做任何事情。我们绝望透了。然后，等第二天早上你出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切令人震惊，人们走过那些巨大的橡胶软管和着火的老建筑，家宅还在烧着。

(Humphries and Gordon 1993: 222 – 3)

类似这些描述使我们能够构造出一幅鲜明有力的图景，借此，我们可以通过移情来领会（empathize）过去的经历。这类研究的另一特点是，它以生动的方式表述了经验，那些经验一度是平淡无奇的，如今却显得令人震惊，就像致命的疾病所引发的意外后果一样。

第二天早上我很早醒来，我听到十分奇怪的声音，是一个男人在哭。我从没听过这样的声音，我下了床，打开门走了出去，站在那个地方；我可以听到我爸爸在哭。就在我站在那里的时候，我姑妈走过来说，“小家伙，罗西病得厉害，回床上去吧。”我照她说的做了，我们在那里躺了一小会儿，然后我又下床，这次我打开门，看见我可怜的妈妈穿着睡衣站在那里，穿着她那件全褐色的旧睡衣，她没有穿好衣服……我妈妈说，“她死了。”就是那样说的。她说，“你该准备上学了。”然后我们动身去学校，当我经过幼儿园的门前时，我停留了一分钟，因为罗西就是在那里上学的，我经常带她进去，但我想我最好别这样做，因为，如果我进去告诉他们这些的话我会哭的，我姐姐经常叫我洒水车，所以我不想在老师面前哭……过了一会儿，幼儿园的女校长进来了，她和老师说了话，然后他们叫我到外面，我的老师说，“罗西今天不来学校了，桃瑞丝。”我说，“不，她永远不会再来了，她死了。”于是老师说，“哦，天哪。”然后我走开，坐了下来。当我从学校回到家，里面非常安静，于是我意识到，从前我妈妈准备晚饭的时候经常唱歌，但她不唱了，爸爸回家时也没有吹口哨。

(Humphries and Gordon 1993: 134 – 5)

第二章 文化与日常生活：平常即为非常

在阅读了这类段落之后，一旦我们拥有了机会，从这样一些对艰难可怕的经历的坦率描述中、从其中传达的明显的伤痛里重新体验，那么，我们就会确认口述实录在如下方面的有效性：它为某个时间和场合——大多数读者对此并不熟悉——提供了鲜明有力的精神素描。在这个摘录中，当我们透过字里行间细读的时候，可以看出大量信息。一种潜在的斯多葛哲学，以及对儿童死亡事件的高度承受力，这些作为某种拒绝破坏生命步履——学校生活，工作，晚餐的准备——的事物。然而，我们的解读决不能天真单纯。我们通过建构形象的形象——这些形象提供了附在性别角色上的有关行为规则的强烈感受——来理解这些经验。作为读者，我们继续以复杂、并且经常是不可预期的方式制造意义。它还帮助我们指明有关我们自己的有关过去经验的假设。我们还应该记住这种方式，这些陈述包括了选择性的判断，正是通过这些判断，回答者加工了他们久远的回忆，同样，其中还包括哈弗里斯和 Gordon 精心的选择编辑。在所有这些陈述当中，存在各种发挥作用的讲故事的层次。不过，对现实经历的回忆可以向我们提供一幅非常有用的图景，这幅图景与对 20 世纪早期婴儿死亡率的统计信息（那时每六个孩子中就有一个不满周岁即夭折）的研究很不相同。日常生活的文化史至少帮助我们开始试着理解隐藏在特定文化及其共享价值之后的“情感结构”。

尽管有一些我将简略提及的限制，由雷蒙德·威廉斯和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共同推进的文化主义（culturalist）方法至少把大众文化作为真正的分析对象进行严肃的考

文 化

察，因为他们承认文化形式中存在丰富的多样性。在考虑一个作者的开创性和多样性贡献方面，威廉斯和 Paul Willis (1990) 成功地领会了日常文化的重要性（尽管在这一点上，他附加了 Michel de Certeau 的一些词汇）。

这是平常中的非常，非常之处在于，它使两者都进入了文化，普通文化。我们在考虑符号创造的大量非同寻常的方式，通过这些方式，年轻人对以下那些他们当前、通常的生命空间和社会实践加以使用、人性化、润饰并赋予意义——个人风格和服饰选择；对音乐、电视、杂志的挑选和积极应用，卧室的装饰，浪漫仪式和亚文化风格；朋友圈子中的时髦、逗乐和刺激；玩音乐和跳舞。这些嗜好和活动并非微不足道或不合逻辑……对于创造和维持个人、群体的认同来说，它们可以是至关重要的。

(Willis 1990: 2)

在任何历史和社会所确定的场合中，现行的普遍选择过程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对威廉斯而言，某个活生生的文化中的成分其存留与否取决于选择性传统，该传统提供了各个行为规则，用以判断什么是一项工作当中优秀的、实质性的、有用的和最好的范例。这个选择性传统可被描述为多元孕生 (multigenerational) 的过程，通过该过程，某个时期的价值和重点的组织系统被转化为一套代码 (codes)。这些代码在传统——它在被

第二章 文化与日常生活：平常即为非常

质疑的时期之前——演化范围中才有意义，而且，它们可以在后来的发展中得到清楚表达。因此，威廉斯不仅承认文化研究当中分析客体的**复杂性**，而且还承认与规则——通过它，人们作出文化判断（尽管这些判断完全是建立在特定时间场所的基础上）——有关的**不确定性**。

这样，选择性传统首先创立了一个普遍的人类价值；其次，它创立了一个特殊社会的历史记录；再次，这也是最难以接受和评定的一点，它还创立了对大量的、一度是活生生的文化领域的排斥。

(Williams 1961: 51)

对威廉斯来说，这种选择性与社会结构及支撑该结构的特定阶层差异系统相联系。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见到的，这也是其他作出判断的知识领域的特点（例如科学、伦理学和美学，其中，划分标准是随着学术圈子的更替而变化的）。此外，它还帮助我们理解威廉斯与利维斯学派在文化取向上的联系。在威廉斯的著作以及 1950 年代的其他文化评论（尤其是霍加特的评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首次将利维斯学派的选择性传统中的观点与阐释技术连接起来的努力。在他们与众不同的方式中，威廉斯和霍加特用的是利维斯学派的语言。

文化主义遗产混合了多种成分。理查德·霍加特撰写的对大众文化的陈述，与他的《文化教养的作用》（*The Uses of Literacy* 1957）和《我们当前的生活方式》（*The Way We Live Now*

文 化

1995) 如出一辙, 与雷蒙德·威廉斯所做的贡献有重大差别。虽然这两人都探讨了文化与日常生活的关系, 但威廉斯仍然关注对文化传统进行传统意义上的目标分析, 尽管他的处理方式与不同于文化和社会传统中的精英主义者。而霍加特则对大部分大众文化中的粗俗和“无意义”持有利维斯式的蔑视, 但他至少会把大众文化的文本、文化制品和实践作为值得细究的东西来考察和分析。然而, 这点是显然可见的, 即霍加特的关注是为了对损害作出回应, 他认为, 对英语的有机生命群体的损害是由美国大工业生产的文化产品——例如匪盗小说和黄色杂志——导致的。他的大部分蔑视性评论针对的是色情小说和杂志, 那些东西吸引了“处在一般智力以下的青少年, 以及其他因为某种原因没有成熟、或感到自己不够成熟的人”(Hoggart 1957: 252)。通过指出具有自卑情绪的广告——它们允诺读者更好的身体、更敏锐的思想, 霍加特提出了与环境有关的(circumstantial)证据。有时, 霍加特似乎更关注类似“血腥胆气”(blood - and - guts)那样令人不快的小说越来越强的效果, 而不是关注它们的实际内容。

性冒险小说已经存在了数个世纪; 有人会想到纳什(Nashe)的《不幸的旅行者》(Unfortunate Traveller), 在某方面或者会想到笛福(Defoe)的《摩尔·弗兰德斯》(Moll Flanders)。曾有过一种暴力文学: 在隐秘细小的角落, 有过一种虐待和受虐的文学。但这种新形式很不一样。它不是由一个细小、反常的机

第二章 文化与日常生活：平常即为非常

制制造出来的——就像对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的作品所应用的那样。它在自身水平上有更为广泛的号召力。在其内在品质方面，它不同于纳什和笛福的性和暴力；它是关于性和暴力的，但所有这些是以导致幽闭恐惧（claustrophobic）并且离群索居的方式进行的。

（Hoggart 1957: 260）

显然，霍加特建立大众与反常之间的联系是一种病理学追溯（pathologizing）的策略。大众文化被贬值，是由于其毁灭性后果导致工人阶级丧失了欣赏他所赞同的文化文本的能力。他所树立的就是这种左翼—利维斯学派取向的残余精英主义，他以此来判断这类文本，以及那些“低俗小说”材料所表现的“普遍趋势”。依照与利维斯同样的方式，制造了“罐装娱乐产品”和“包装整齐的供应”（packeted provision）的标准化大工业生产仍然是导致文化堕落和青年人懒惰的罪魁祸首。

我记得……这种奶品吧——几乎每个居住人数超过一万五的北方小镇都有一个——那里成为一些年轻人晚上经常聚会的地方。有些女孩去那里，不过大多数顾客是年龄从十五到二十岁的男孩，穿着带装饰的外衣，打花领带，戴美国软帽（American slouch）。他们大多数买不起连续数杯的奶昔，时常以几杯茶消磨一两个小时——这也是他们来的主要原因——他们往

文 化

游戏机里扔进一个又一个硬币……即便与街上拐角处的酒馆比，这种消遣方式也是特别空洞乏味的，是沉浸在牛奶气味中的精神枯竭。许多顾客——他们的衣服，他们的发式，他们的面部表情都暗示了——生活在一个混合了少数简单内容的荒诞世界，他们把那些内容看作美国式生活所具有的。

(Hoggart 1957: 203 - 4)

隐藏的文化沙文主义几乎没有被揭示出来，而这种文化实践和文化制品明显冒犯了他的传统工人阶级价值观。通过详细阐述大众文化中道德判断的清晰标记带来的损失，霍加特（1957）提出一种对日常生活的丰富特征所作的极度浪漫的描绘，它是对日常生活进行侵入的新的文化力量——其中，侦探与恶棍再也也不可能分离了。这种浪漫保守主义和道德化论调也在他论述对大众文化加以抵制的力量时出现；例如，有关园艺和分配的自助手册，社区中心，劳工教育协会（WEA），地方体育协会，业余戏剧社，铜管乐队，漫步者协会，以及致力于其他简单快乐的群体。对霍加特来说，工人阶级生活的文化实践代表了独立思考 and 自发行动的艰难胜利，而如今，那些胜利被“精神枯竭”所驱散。例如，劳工教育协会提供了一种鼓励批判思考和民主精神——借此人们可以决定哪种社会和文化秩序是他们希望见到的——的方式。

为保持“文化与社会”传统，霍加特概述了教育实践、文化实践与日常生活、家庭及群体的社会结构之间的紧密联系。

第二章 文化与日常生活：平常即为非常

为此，他把利维斯学派的文艺评论技术和文化标准运用到大众文化当中，而威廉斯（1961）则从社会人类学中汲取资源，主张我们应该研究在文化制度当中表达的“感受和思考方式”，例如大众传媒和高雅文化。较之于简单地记录普通人的生活，这种分析类型可以更加深入，因为它还考虑了价值评估以及重建文化如何是可能的；它还认识到它的共享价值，以及这些价值被表达的方式（Williams 1961）。通过这种方式就有可能思考共享的经验，例如工人阶级或来自某个特殊地方的人们的经验。这种文化研究取向的后来的支持者们把这个原则扩展到“情感结构”的研究上，后者包括一些共同经历，通过这些经历，我们建立和重建种族和性别，同时还有阶级差异。利维斯的文化政治学试图捍卫现状，捍卫知识、价值的保管人的角色，而威廉斯的文化政治学则分析普通人的生活，从正面评价大众文化，将其作为替所有人设计的“美好生活”方案的一部分。

霍加特对利维斯学派的批判技术关注，威廉斯对文化和社会传统中文学经典的全力关注，这都意味着他们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起研究指导作用的、文化主义取向的实用工作模型。更好的范例是由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和帕迪·沃纳尔（Paddy Whannel）所著的《大众艺术》（*The Popular Arts* 1964），以及文化史研究中汤普森（E. P. Thompson）所著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1963）。在《大众艺术》中，来自电影、电视节目和爵士乐的各种文化文本和实践都作为正规的分析目标被触及到了，尽管霍尔和

文 化

Whannel (1964) 仍然试图通过区分好的和坏的大众文化来玩利维斯式的等级分类游戏。他们尤其强调音乐表演和传媒产品作为自我表达工具的功能，还强调类似西部片和惊悚片这类特定电影类型的程式化特征如何制造“乏味、陈腐的内容”。更有希望为变动的文化关系提供一幅图景的是，汤普森 (1963) 为阐明工人阶级借以进入工业社会生存的复杂文化抗争从而对人类行动的角色所作的探索。这一对过去的大众文化（一段来自底层的历史、而非伟大领导人和精英的历史）的修复探索了社会意识出现于其中的偶变 (contingent) 行为。这一对阶级认同形态的陈述与那些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相反，后者将阶级认同的产生视为经济力量和关系的机械产物。汤普森还强调了雷蒙德·威廉斯有关文化、社会的著作中最初的理论焦点，突显了对特定时间场合的阶级、人、制度和观念中的文化和社会传统的超然立场 (Thompson 1961a, 1961b)。自 1960 年代以来的文化研究更多地注意了这些事情，其结果，这些研究与社会科学相接触了。

文化与社会学分析

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探讨了文化研究应该包括以一种特殊方式去解读人们的生活，以便于辨识和阐释人们的社会生存、考虑并阐明他们的价值和故事如何获得意义。这种取向秉持了对日常生活的尊重，而这些日常生活并未见之于之前大多数文化研究中。为了辨识以这种方式投入研究的实用程序，文化研

第二章 文化与日常生活：平常即为非常

究的代表者从社会学特殊分支里发展良好的定性研究传统当中汲取资源，这一研究传统已经以显著的方式在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中逐渐成形。社会学当中的互动论、现象学和常人方法学取向也极为重视进入并直接贴近被研究者的生活；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努力取得对他们的生活的有效洞察。这些取向也向先前的人类学借取研究策略，正是这些策略使西方研究者在没有值得信赖的历史记录的情况下，开始理解文化仪式中的实践和意义。他们尤其创造出民族志技术，通过它，研究者深入、直接地卷入到相关群体或社区的现实经验当中。

互动论社会学家最初运用民族志研究策略去发现社会中不容易被调查方法和统计证据探讨的面向。类似犯罪行为、合法化之前的“同性恋”以及宗教教派活动这些敏感、困难的课题，对它们的研究有时只有通过直接、谨慎地投入（有时是悄然隐蔽的）被研究者的日常生活当中才能取得。对此可以用一个经典的社会学研究来说明，劳德·哈姆弗瑞斯（Laud Humphreys）在他对同性恋者的偶发性行为进行研究时，他充当了一个替色情活动望风的角色；而其他研究者发现自己要进入和参与到被研究者——例如帮伙——中困难重重（Patrick 1973；H. Parker 1974）。尽管要对这些研究方案投入时间以及大量的精力，这类研究仍然通过特殊科学知识的生产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来推进工作。参与观察、深度访谈以及生活史研究（例如 Shaw 1930 对“jack-roller”的研究）因为公开承认阐释在社会科学知识当中的积极作用，受到客观立场捍卫者（defenders of detachment）的严厉批评。有时候，主要因为这些

文 化

研究方法被应用于重建边缘人的生活，这些研究就被辱骂为“傻子、妓女社会学”（sociology of nuts and sluts）。嘲讽修辞成为客观立场的有效壁垒。然而，当我们在问题界定、研究方法的操作化两方面对这类客观研究的运作方式加以仔细考察时，我们可以发现一系列试图将模型、概念和理论强加于分析客体的努力。其结果这些研究经常是单面化、带偏见、主观并且受情境束缚的，它们负载了各种文化价值。客观立场成为说服读者相信某个研究的权威性和真实性的婉辞；然而，它仍然是一种组织和理解复杂情况的方法。

这些解释社会学在研究过程中全力涵括了社会生活的主观维度，将分析客体的存在视为我们解释的产物，而不是真实的事物。这并不是说这些客观事物没有影响，因为，如果我们相信某个事物为真实，它的真实充分体现在它造成的结果中（也就是说，我们似乎认为它的确存在）。此外，他们重点分析共享的文化实践——通过这些实践，认同得以建构，并且投入到对自我、互动和意义的探索中。为此他们主张，我们必须将自身定位于需要加以考察的社会行动者（social actor）的位置上。从实用主义哲学中汲取资源（在某些方面霍加特即是如此）的互动论特别强调开创批判性思考的重要性，以创立和维系一个有成效的民主社会。实用主义者关心意义和解释是如何成为实际问题的“实用内容”的产物以及社会生活的目标的。精神被认为是解决问题的工具，是一个总在发展中的“思考过程”，而不是一个固定的事物。

互动论将社会行动者和他们面对面的微观互动作为一切社

会生活的基础。它主张，任何（个人的，政治的，哲学的或科学的）概念或观点的意义只能被定位于产生了意义的经验性环境中。因此会有对定性研究方法的偏爱。实际上，恰当的知识源自为寻找明智的行动过程或行为模式而在日常生活当中进行的试错过程。自我不是一架理性算计机器，而是人们之间的持续互动过程以及对不可预期的关系进行意向性解释的变动产物；总之，日常生活涵盖了饱含知识的猜想过程。乔治·赫伯特·米德的《心灵、自我与社会》（1934）认为，对他人常规习惯实践的预期，以及我们以类似可预期的方式进行的回应，这些使人类得以加入互动交流过程而避免冲突。通过**镜中自我**（*looking glass self*）的比喻——即他人的行为对于个体想象而言就像镜子，我们可以发现个体如何设想自己怎样看待他人、他人如何判断个体、他们怎样对想象的判断进行回应，因此，我们不断调整自身的行为，并且预测我们的行动对他人产生的影响（Cooley 1902）。

然而，这仍然将我们的分析限制在可观察的社会互动方面，它没有考虑不可观察的、人们之所以投入互动的动机。它还忽略了作为结果我们所发展出的有意义的关系。现象学社会学的出现提供了另一种思考方式，它考虑了通常被互动论文化研究所忽略的理所当然的假设。意识以及意义生产被描述为进行相互发现的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主体（intersubjective）关系的结果。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ütz）在他的《社会世界的现象学》（1932/1967）中认为，正是通过主体间性的条件，个体行动者才能够领会各自的思想意识，并建立他们的生活世

文 化

界。通过时间与空间的共享，个体行动者投入到理解过程中，这个过程涉及了对他人之所思的发现（Schütz 1932/1967：112 - 13）

舒茨方法的核心是“烹调书”（cookery - book）或“窍门”（recipe）知识；简言之，在选择配料、烘烤蛋糕并且“享用它”时，我们不需要理解这一套特殊实践的起源（Schütz 1943：137）。这种方法试图在社会科学和文化分析的次级建构与日常生活的初级建构之间建立紧密联系（Schütz 1953）。通过对社会科学中的知识生产的民主化，这个方法与文化研究经常对以文学标准保管人自居的评论家进行挑战的方式有密切的亲关系。在日常文化实践中，我们应该预见，人们的行为方式不能通过科学模式或文学标准的“虚构意识”来预测。毕竟，评论者和科学家作为日常生活的行动者也采用同样的类型化过程，尽管精确的“类型”与情境、以及他们使用的专用词汇相关联。现象学方法质疑社会科学的权威知识的生产，而且以同样方式使文化研究中的等级分类体系成为问题。然而，单是理解了这些研究领域中的问题实质上还不够。为了进一步考虑，必须出现一个替代性的研究方案。

在社会学分析中，在把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发展为可行性的研究计划方面，最引人注目的努力之一是哈罗德·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 1967）开创的常人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研究。它把舒茨对日常生活中“理所当然”的常识性假设（不言而喻的知识）的强调与人类学家和符号互动论者的经验研究策略相结合。互动论取向运用民族志研究技术（例如参与观

察)，以尽可能贴近生活真实的方式对社会生活加以重构。然而，他们把自己限制在可以进行经验观察的关系证据上。常人方法学则试图发现互动之所由来的、社会实践中理所当然的常识性假设被定位和重构的方式。加芬克尔想更深入地钻研他所研究的人们的生活，旨在重构他们甚至不能表达的不言而喻的或窍门知识。在常人方法学取向中，人类行动者通过利用他们的库存故事和有意义的解释，来持续不断地理解他们所经历的情感集合（the mass of sensations）。一旦材料似乎适合于某个特殊故事的讲述，它会立即被安置于一个现有的叙述中，被转化为对故事的支持证据。这个技术，这种**文献记录式方法**（documentary method）涉及了故事情节与材料之间持续、互惠的互动过程。其结果，作为被再创造的认同，库存故事自身经历了重新谈判和转变的过程（Garfinkel 1967）。

文献记录式方法还突显了这点，即我们是如何将客观超然的科学故事作为权威加以接受和信任的。我们负载了一系列不言而喻的知识，通过这些知识，某些特殊形式的知识生产被作为权威接受下来。对词汇的使用，所选择的分析客体，结论的偏爱（无论是理论的、统计的还是实验的），对普遍化和解释的强调，事实/价值的区分，对进步和物质改善的许诺，所有这些都提供了线索。要挑战这些理所当然的假设是一项困难的工作，但并不是毫无希望。正如以上所述，各种叙述在发展和变化，它们甚至是有争议的。像库恩、法伊尔阿本德（Feyerabend）、福柯这些作者每个人都打碎了普遍、确定的价值观念的既定基础，而且，作为结果，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动摇了我

文 化

们对科学判断的信任。他们每个人都考察了在科学实践的组织中起作用的不言而喻的知识。加芬克尔自身的一些研究策略也有意打乱“正常”关系。这些策略包括中断对话、以发现回答者适应和容纳这种变化的规则。对社会关系当中的不言而喻知识的多种探究在一系列制度性情境中得到推进，从宗教运动（Bellah 1976）和急诊室（Jeffery 1979）到界定和处理“青少年罪犯”的警察和法庭的角色（Cicourel 1976）。每个研究范例中，分析焦点都是社会、历史环境，其中，一套特定的观念或行动得到定位。这就克服了那种朝向超然立场——它与将自然科学方法运用于社会客体的做法相关联——的倾向。为了防止社会科学家在社会研究中把他们自己的典型代表（typification）强加于客体，一种更为恰当的方法应该确保所使用的概念在日常生活中也能被理解。由科学社会学者所创造的这些用来重建科学研究群体的“情感结构”的方法，它们把科学看作一个文化实践和文本的集合，一个在其内部产生争论的异质性领域，而不是一个使知识从传送带末端自动跳出的机械化过程（Latour and Woolgar 1979; Mulkay 1991）。

文化分析的焦点再定义

到目前为止，这个讨论能得出怎样的结论？任何文化研究都必须打破类似利维斯那样蔑视“大众”的精英主义倾向。本章所探讨的文化分析也远远不只是简单记录日常生活，而是试图发现一个社会群体或共同体的平常经验之中的非常之处。这

种方法的后来支持者又进一步将分析焦点放在“情感结构”上，以考虑不仅仅依赖于阶级差异的共享经验。利维斯的文化政治学试图捍卫现状，也捍卫知识、价值保管人的角色，而战后文化主义的文化政治学则使其分析情境包容和评价了大众文化，将其看作为所有人设计的“美好生活”方案的一部分。

因此人们发现，文化分析是一种以特殊方式来解读人们生活的活动。它还包括对于被研究者的社会存在加以辨识和解释，阐明他们的价值和故事的意义所在。作为一种方法，它尊重平常生活，这种平常生活在之前许多文化分析中付之阙如。如果我们将文化视为一个对话过程——通过该过程，意义得以建立和转化，我们即可发现言词有多重涵义，而且言词和观念的表达从来就不专属于说话者或写作者，而是向多种解释敞开的。文化主义者、人类学家和解释社会学家为这种再评价开创了道路。然而，就理解意义的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内在联系而言，他们缺少理论工具。为了构造一个恰当的概念框架，我们转入以下两章的分析。

第三章 文化与结构：干预的逻辑

社会科学家一直关注文化在一般社会系统中的位置，或者更确切地说，关注文化关系与经济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而更少注意政治和文化之间的）。这并不意味着先前提出的文化分类问题不重要，这些问题将在本章以及后续几章的论述中一再出现。事实上，文化分类系统被认为是有助于再生产社会一经济差异的核心机制。这是社会研究其中的一个显著领域，尤其是有关教育在社会隔离（social exclusion）中的角色这方面。我们将首先探讨那些已经为经济——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维持了一个优先位置的取向，以解释文化文本、实践和文化制品的运作。有关文化在社会秩序中的位置的理论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兴衰的深刻影响，特别是受与它有关的围绕人类解放方案出现的问题影响。因此，本章我们将考察文化上的唯物主义取向及其与意识形态相关的角色。

文化与唯物主义：马克思的遗产

出发点是卡尔·马克思关于文化与社会的唯物主义论述。

我们应该谨慎解读马克思，因为他的著作已经被人们以各种方式解释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论述故事是，历史有其开端、追寻和解决方案（resolution）。在“原始”生活之中的某处出现了社会组织，通过这些组织，阶级分化逐渐形成。阶级结构通过生产关系得以界定；一个非生产性的阶级榨取从事生产的阶级的剩余价值。在任何一种生产模式中，这样的剥削关系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对抗状态，尽管它在历史叙述的不同阶段中以各种形式出现。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中（从古代到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变革的原因都定位于经济领域（**基础或下层建筑**）。政治、社会或文化的变革经常被刻画为一个过程，通过该过程，根本的经济矛盾和冲突将（在上层建筑内）以更加显著的阶级斗争表现公开爆发。资本主义当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运作导致了分裂的（polarized）社会格局，在这一格局中，处于中间的社会阶层（小商人和农民）被垄断过程强迫进入劳工群体，而如果该群体有凝聚力和自我意识的话，它就转为无产阶级，并且将把资本主义转变成共产主义的生产模式。正是在这个历史发展阶段，马克思相信所有那些矛盾和冲突将得到解决。就其定义而言，共产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否定，那里面也没有阶级剥削（一种没有异化的存在）。为了进一步讨论，需要指出马克思思想的三个概要特征。要记住，以下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关键假设受到当代许多新马克思主义者的挑战，他们认为马克思的著作被许多早期追随者曲解和简化。

文 化

• **基础和上层建筑。**因为这是一种唯物主义取向，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经济基础形塑了社会秩序的剩余组织（上层建筑），例如政治、艺术、文学和宗教。在马克思的航船类比中，船体隐喻了经济，桅杆和支索象征政治结构，贸易风喻示意识形态，而端坐于守望台的哲学家则指示了不同的方向。

• **阶级斗争和冲突。**所有生产模式的动力都来自阶级斗争。虽然在某个特定时间和某个特殊社会中存在各种阶级和阶级成分，非生产性的剥削阶级和从事生产的被剥削阶级之间的根本冲突只能通过经济变革加以解决。在古代，奴隶主剥削奴隶；封建制度中地主剥削农奴；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

• **资本主义和革命。**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与之前的生产模式有显著区别。例如，前资本主义的剥削是通过超经济的制度——如国家税收——取得的，而劳工体制的产生意味着剥削仅仅在经济领域内出现。国家的作用是为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提供条件。此外，资本主义提供了使非剥削关系能够建立的环境和代理人，那就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资本主义经济的运作过程周期性地动摇社会秩序，在经济危机期间，无产阶级处在发动变革的位置。

在这个无产阶级取向中，人类被视为具有创造性的生物，他们对完满的追求只有通过把他们的劳动力从剥削控制下解放出来才能实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种社会关系之间的显著区别：一种社会关系中人们从事有用的工作，另一种剥削性的社

会关系中劳动只是无用的苦工。对马克思主义来说，非经济关系和剥削性的经济关系之间制度上的分离才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与众不同的特点。为了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论述中文化的角色，我们必须指出之前的历史时期中文化的角色。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中，文化关系直接涉及从生产性阶级那里榨取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当中，剥削之所发生的生产领域与文化领域有制度上的分离，正如它与其他的上层建筑的分离那样。在这个对历史变迁的叙事中，资本主义对文化生活与经济生活之间的隔离是独一无二的。马克思的使命在于阐明经济剥削与所有被界定为上层建筑的存在领域之间的紧密关联。不幸的是，在《资本论》（*Das Kapital*）的结尾，马克思允诺将对这些关联充实完善的地方，手稿在某种程度上不可挽救地中断了。从此以后，他的追随者一直试图填补这个宏大叙述中的空白。

干预的逻辑：文化与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概念及其在上层建筑中的角色就跟文化一样富于争论。有时，文化与意识形态被认为是同一个意思。类似家庭、亲属、教育、宗教和群体组织这样的制度曾经被视为文化传播机制以及意识形态价值的来源。在这里，意识形态既可以被看作有关一系列假设的描述性标签，也可以被看作对社会世界是如何运作、以及对应该所是的情况如何作出规定的信念。不难看出，文化和意识形态术语是可以相互交换使用的。如果

文 化

扼要重述本书开头的章节，文化指涉更多的是我们于其中从事日常实践的活生生的关系。和意识形态一样，文化实践由各种价值所激发，而且在这一有限的意义上它们可以被称为意识形态实践。然而，意识形态更多的是围绕一个指导性的政治方案来组织的，它们被假定具有更多的一致性（与基础性原则相关），而且它们经常与特定利益的辩护和维持相关联。文化实践的组织则具有更多的偶变性质，它们有潜在的不一致以及主体间性。它们提供了一个场所，其中，我们的自我概念的诸多内容能够在有意义的对话中与其他认同成分相容，而且使相互的发现成为可能。文化知识在整个社会格局中广泛散布，而且处于不均衡的分别状态；而意识形态试图把社会和政治秩序朝向一定的目标组织起来（包括将事物保持在既有状态）。

只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宽泛意义上的大众文化才进入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安东尼奥·葛兰西和米哈伊尔·巴赫金除外，不过他们的影响是晚近以来的事情，因此本书将在第四章探讨他们）。因此，作为出发点，我们必须考察通常被认为比文化分类表格（例如文学）更高级的、对那些领域和那类文化所作的探讨。此外，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大多数关于文化与意识形态的讨论集中于对阶级关系与文化实践之间的联系的理论化描述。如果我们考察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乔治·卢卡奇（1957/1963）的著作，在有关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意识形态角色是如何运作的。

对现实主义流派而言……人是政治动物（*zoon*

politikon)，是社会动物。亚里士多德的格言对一切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都适用。阿基里斯和维特，俄狄浦斯和汤姆·琼斯，安提戈涅和安娜·卡列尼娜：他们的个体生存——他们的**自为存在** (*Sein an sich*)，用黑格尔的术语表达，即他们的“本体论的存在”，这是更加时髦的表达术语——不能从他们的社会和历史环境中识别出来。他们作为人的存在，他们的特殊个体性不能脱离他们产生于其中的社会情境。现代主义主要作家的作品中，支配人物形象的本体论观点与这个观点恰恰相反。对这些作家而言，人天生是孤独的、反社会的，他无法建立与他人的关系……人是这样被描绘的，他或许会建立与他人的联系，但仅仅是以肤浅、偶然的方式；从本体论方面而言，仅仅是通过回溯性的记忆 (*retrospective reflection*) 来建立的。对“他者”而言，基本上也是孤独的，是远离了重要的人类关系的。

(Lukács 1957/1963: 18 – 19)

在这段简短引文中，卢卡奇汲取了马丁·海德格尔有关人类生存的非历史的概念化内容，将人类“被抛入存在的状况” (*thrownness – into – being*) 作为现代主义文学默认的参照点；他还表明，在现代主义取向中，无论是建立与事物或他人的关系、还是详细说明人类存在的起源或目的，二者都是不可能的。文学研究中有一个著名的范例，《尤利西斯》的都柏林背

景对于维持叙述来说，已经变得毫不相干了。在这个例子中，詹姆斯·乔伊斯的取向涉及一个不断审察的主体探索一个固定的现实时所作的建构。他认为，结果是这些文学形式不能被用来探索人类潜能，因为它们只能在具体场景中——那些场景则构成了现代主义故事叙述的背景——被恰当地概念化。总之，现代主义文学拒绝外在物质现实，将“人”描绘成在本体论意义上是孤独的、因而是迷恋病态的（他们构成了邪恶、反常的噩梦般的形象）。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策略，通过它，现代主义导出精神病理学，以其作为逃离人之处境（*condition humaine*）（资本主义的残酷现实的经历）的方式。

对卢卡奇——他颇有些赞同现代主义对人之状况的描述——来说，以精神病理学来解救“人”的做法本身就是扭曲的。这种解决只有通过社会——经济的改革才能实现。其结果，以卡夫卡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文学取向经常被看作现行资产阶级利益的文化宣言。现代主义阻止某种视角的出现，这种视角的建立基础是对社会情境和物质变迁过程的广泛理解。与此对比，现实主义取向的作家如果要充分展现他们所描绘的对象的“真实性”，他们就必须明确提出人物形象的真实的（也包括抽象的）潜能。和现代主义不一样——它假定人类行动是虚弱无力的，这里的人类活动被认为能够提供改变现实的可能性。正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叙事一样，即每一时期（或生产模式）都被一套不同的物质关系所标记，现实主义文学也创造了适用于各个演化阶段的类型学（*typologies*）。卢卡奇所探讨的各种相互竞争的文学流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效的例证，它可以说

明，卢卡奇怎样把历史过程一方面描述成动态的、矛盾的、为实现人类潜能提供了机会，一方面又压制了人的潜能（putting the cork back in）。和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不一样，他把各种文化介入视为对人之经验的代言，也看成是对异化的真正原因的隐蔽，但至关重要是的，它们在社会关系的“总体性”当中，还执行了潜在的革新角色。

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问题，至少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中，它经常与另外一个问题相联系而提出，即文化是否统治阶级支配其他阶级的工具（那些控制了物质生产手段的人也控制了精神生产手段）。文化表征可以被解释为潜在阶级利益的附带宣言。与此相应，在苏联的斯大林体制下，在对这一粗糙的代言模型的主动解释中，文化的文本、文化制品和实践经过了精心审查，以确保英雄的无产阶级情操是至高无上的。此外，文学、诗歌、建筑和音乐的典范被禁止，以免受到“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污染。可以与希特勒进行对比——他反对所谓“堕落的”犹太艺术、文学和哲学，几乎没有提供解释的方式，但同时至少指向了另一种方式，即文化表征既被视为政治运动的工具，也被视为政治运动的战场。不过，在把文化实践和表征看作无法观察的阶级利益的简单、附带宣言时，存在一些强烈的不满。从一开始，它就依赖于简化的意识形态概念，将文化归入“人民的鸦片”一类事物，同时视文化为虚假意识的负载物，这种虚假意识只有通过采纳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才能得到克服。

卢卡奇开始提出一种克服这类论述的缺陷的方式，但他受

文 化

受制于马克思主义的语汇 (lexicon), 就跟他受制于保存苏联的政治审查的需要一样。对卢卡奇而言, 文学形式涉及的是思想与存在的真实、辩证的过程, 而不是与阶级利益同形 (isomorphic) 一致的反思。那些为无产阶级的优越性提供社会格局的全面图景 (或总体性) 的表述, 以一种起解放作用的方式运作。那些打碎和扰乱我们经验 (它阻止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剥削的大图景) 的东西被看作一些具体化方式, 借助这些方式, 我们使作为人类创造性的产物的关系外在化, 并把它们看作对我们组织人类事物的方式所施加的固定、明确的约束。此外, 对文化表征的商品化 (commodification) 的强调暗示, 以这种对文学文本的处理方式、以及卢卡奇将讨论联系到资本主义关系中一切事物的机械化和量化的方式 (这点是从韦伯的理性化概念那里得来的), 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主题, 该主题是后来有关文化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共同特征。

文化产业

卢卡奇试图突显文化干预的复杂性, 还试图强调将文化作为确保无产阶级消极服从的操纵机制的做法; 这些努力部分受到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认可。这个以社会研究所为基础的知识圈子建立于 1923 年, 但是清晰地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分析是在马克斯·霍克海默的领导下从 1930 年开始的。这项学术方案的合作者历经纳粹主义的兴起、在美国的整个流亡过程, 直至后来他们返回战后的德国, 他们提出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社会

分析和新康德学派唯心论观念的引人入胜的综合，以探讨文化在不断增长的机械化和理性化社会关系——它们刻画了 20 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中的角色。在马克斯·霍克海默和西奥多·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1947）中，他们认为，无论在法西斯主义德国还是在自由民主的美国中，社会暴力（social forces）的发展都一直受到“工具理性”的形塑；在这种工具理性那里，创造性、有表现力的情感被手段一目的决策的冷酷逻辑以及技术上复杂的劳动分工中的任务执行所纯化（sublimated）。

法兰克福学派所采用的“文化产业”概念吸收了马克思动摇自由主义假设的方式——该假设认为经济、政治和文化在制度上是相互分离的。这就立即指明了经济和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也指明文化的文本和文化制品在一个工业化过程中是如何生产出来的。法兰克福学派和利维斯一样，试图理解大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的出现。他们还把流水线作业中劳动者的异化和技能退化（deskilling）与这个过程所制造的文化产品的价值联系起来。在他们看来，文化产品和其他消费物品——从肥皂到香烟——以同样的方式被生产出来。这和先前的文化生产形式不一样，在那些形式中，艺术家、表演者或手艺人仍然持有一些控制权，其产品可以说含有一些原创形式；而大工业生产则确保艺术的、创造性的投入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运作才具有价值。为了制造同质的、公式化的和易满足的小说、电影、歌曲和文献记录，建立在片断和常规任务基础上的标准化生产体系被描绘为被动消费的原因。

流行音乐被认为是在制造“退化的听觉”（regressive listening），它阻碍了与高雅文化有关的富于鉴赏力的判断。在流行音乐的欣赏问题上，阿多诺（1941）认为：

听众会自动提供“框架”，既然它本身是一个纯粹的音乐自动化的过程。合唱的开始可以被无数其他的合唱代替。各个部分的内在联系，或部分与整体的联系不会受影响。在贝多芬的音乐中，位置（position）的重要性仅仅体现在一个具体的整体与其具体的部分之间的活生生的关系当中。而在流行音乐中，位置是绝对的。任何细节都是可替换的；它仅仅起到一架机器中的齿轮的作用……在严肃音乐中，每一个音乐要素，甚至最简单的要素都是它“自身”，而且，作品组织地越严密，替换细节的可能性就越小。然而，在打击乐（hit music）中，隐藏在作品之下的结构是抽象的，其存在与音乐的特定过程无关。一个基本的错觉是认为流行音乐中朴素的复合和声较之严肃音乐中同样的和声更好理解。因为流行音乐中的复杂性从来不会以其“自身”来运作，而仅仅作为掩饰或装饰——在它背后人们总是能够察觉出设计——来运作。在爵士乐中，业余听众能够以简略方式——无论看起来多冒险，他们都会提出这些方式，而且他们仍主张——代替复杂的节奏与和声规则。在处理打击乐时听觉会遇到一些困难，它会借助来自模型知

识的草率的替代来处理它们。面对复杂的音乐时，听众实际上只是听它表现出的简单的东西，而且认为那些复杂的东西只不过是简单东西的不着边际（paradistic）的扭曲。

（Adorno 1941, in Easthope and McGowan 1992: 213
- 15）

阿多诺拒绝高雅/低俗—中间的区分，也拒绝简单和复杂的区分，他认为这些区分均不足以把严肃音乐和流行音乐分别勾画出来。在严肃音乐中，各种要素不能被听众习惯性的对于所考虑的要素前后部分的期望所代替或适应。流行音乐是经过“预先消化”的，最重要的是，它是标准化的，然而它也必须以原创的外表出现，以吸引听众的兴趣；必须在其中加入一些变化。音乐创作者偏离既定的格式而又不破坏音乐形式，这个过程体现出一种伪个性（pseudo-individuality）。流行音乐歌曲表面上是原创的，但它们各个可以替换的部分仅仅是以不同的方式编排的。把音乐与各部分可替换的机器相类比是否合理，我们以后会讨论到。可以举例来说明。有关音乐技术，阿多诺强调了一些精细的规则——通过这些规则，爵士乐得以即兴发挥；他还强调，令人兴奋的变奏以及不和谐音或脏音（dirty notes）是怎样被听众通过调整听觉以适应自己的期望而加以常规化的。类似 Oasis 和 Jamiraquai 这些乐队，他们可以从之前的音乐类型中对民谣摇滚再加工，并在 1990 年代的听众对解释保留曲目所作的限制范围内，把它们以一种似是而非的方式融

文 化

合——这是当代伪个性的一个范例。由于流行音乐的历史已经跨越了半个世纪，回顾性的音乐变奏，或在 hip - hop 重建中对即兴乐句或某个特殊旋律的再利用——其中之前的歌曲片断被结合在一起，这些都已成为常规而不是例外。在与之对等的消费方面，听众也会在不同的音乐类型中选择策略、进行分类，以使自己的偏爱系统化、保持一致性，而且——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稳住自己漫不经心、心烦意乱的心绪。

在阿多诺（1941）看来，这个生产和消费的协作系统背后的动机主要是商业性的，但它也有政治上的后果。在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参考框架中，听众被描绘为简单规则的被动接受者，因此他们容易受权威信息的影响。此外，正如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成员赫伯特·马尔库塞后来提出的，与大众消费相关的广告策略是制造虚假需求的原因，这样做是为了确保资本积累能够持续进行。马尔库塞推论，文化产业所造成的消极被动和心烦意乱实际上终结了历史性的无产阶级社会—经济改革使命，这种终结的有效性正如希特勒在 1930 年代对工人运动的粉碎一样（Marcuse 1972）。正是这种把他们对纳粹宣传机器的经验推断到美国商业文化、以及相应地将听众视为同质群体的做法，导致了大多数批评。

此外，如本书第二章介绍的文化主义取向一样，法兰克福学派通过将大众文化视为正当的分析客体从而拓宽了文化分析的视野。而法兰克福学派如何看待文化的问题正是我们以下要讨论的。在考虑何为有价值之物时，阿多诺这类学者公正评述了传统的文化区分。文化分类在等级方面将大众文化产品列于

低等位置。因此，这种取向最后不得不依赖劳动者的创造力这样一个浪漫化的概念，将其作为文化产物中的原创性和独创性的源泉。伯纳德·让德隆（Bernard Gendron 1986）对阿多诺的理论架构、尤其对他的要素可置换性和伪个性的概念进行了批判性的再评估。通过这个再评估，他阐明了其基础性的框架和类比的一些局限。让德隆质疑了文化生产与流水线作业的类比。他认为，在功能性的文化制品（包括特殊的技术产品）与音乐文本的可置换性之间存在大量差异。例如，在乙烯唱片的情况中，只有在录音室的制作完成之后，这些唱片才会受制于工厂复制技术，以确保它们有足够的数量来满足大众市场。因此，音乐生产过程通常并不受技术的理性化（或者甚至是技术固有的过时）支配，它不像我们在譬如汽车配件的生产中见到的情形那样。在消费方面，对听众而言，流行音乐的标准化可以被看作快乐的来源，而不是遮掩代表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潜在意识形态功能的努力。应该把阿多诺提出的视角看作受特定情境形塑的产物，这同时既要看到阿多诺对大众采取的贬低方式，也要看到他隐含的、对西方文化所持有的种族中心式的赞美。法兰克福学派仍然沉迷于干预逻辑，认为对文化表征、文本和文化制品的生产和消费之中的潜在利益的角色进行追溯是可能的。他们还阐明，利维斯学派的主张和保守主义传统一样，在马克思主义中都是同等有效的。

结构主义与文化

在考察文化研究是如何发展的之前，我们必须绕上一小段

文 化

路，检视结构主义的影响。这不仅是理解文化研究的发展这一问题领域的重要步骤，而且是研究后结构主义分析的影响之前的实质性工作。在可允许的篇幅内，我将把这一概述工作限制在结构主义思想如何改变了我们对语言的理解这个问题上。然后我将考虑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路易斯·阿尔都塞的概念和论点，以便于为文化认同和“主体”（the subject）的当代论述铺平道路。本章还将强调“多元决定”（overdetermination）概念的用法，以扭转方向，将文化分析从有关社会秩序的抽象的理论化论述转到更具体的文化关系分析上来。相比高等教育中的任何其他概念，辅导手册中的结构主义当然更加令人昏昏欲睡（rolling eyeballs）；然而，它仍然是 20 世纪概念创新的最重要的源泉之一。

结构主义语言分析是由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在 1907 年到 1911 年间的一系列讲课中提出的，仅两年后他就去世了。由于他经常毁掉自己的讲课笔记，《普通语言学教程》是由查尔斯·巴利（Charles Bally）和阿尔伯特·薛施蔼（Albert Séchehaye）从他的几个学生的听课笔记中编辑而成的。恰当地说，即便索绪尔本人试图通过隐含的语言系统去理解意义的生产，我们也只是通过他的听众的解释才知道这些具有开创性的观点。作为一个语言学理论家，他沉迷于科学知识的发展以及涂尔干有关每一学科导向特定分析目标的观点，因此，索绪尔（1916/1959）试图把语言研究建设成一门“符号科学”（science of signs）。他想把语言学放在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立足点上，尽管他的工作间接提供了一个基础，这一基础正好挑战了由实证主

义者开展的社会和语言研究与经验主义者的知识建构取向之间的科学特征的关系。认为语言是事物单纯的反映，是描述真理的明显的媒介，这种观点过于简化了人们对语言所做的事情。不运用一个语言系统，我们就不能理解说过或写下的话。在对语言的建构中，人类选定一个词语来指涉明确的观念。这甚至在不言说的情况下也是可能的，聋哑人通过手势建立符号语言就是一个例子。因此，语言是言说以及其他交流行为的产物，同时，它又构成言说和写作的前提条件。语言系统提供经常是未言明、未记载的规则，使人们能够有效地交流。索绪尔通过对以下问题的探索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语言系统的方式：语词（words）是如何借助对一套隐含的语言规则体系——该体系使所有参与交流的人能够彼此理解——的使用从而变得有意义的？

索绪尔区分了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前者是使我们能理解言说的潜在的规则体系，后者是言说所包括的表征活动。他认为，这个运作过程很像象棋规则帮助我们理解棋手的行动。这些规则支配了象棋游戏中行动的可能范围，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棋手的意图和策略的一系列线索。不过，在语言系统中并没有清楚记载的、阐明语言结构的具体存在的规则，我们不得不从言说活动中重建这些规则。正是这个对结构化关系的强调导向了被称之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取向（Saussure 1916/1959）。尤其重要的是静态语言学和演化语言学（statics and dynamics）的区分。在索绪尔创造他的方法之前，语言学主要关注语言系统的演化，以及语词的发展和渐变。索

文 化

绪尔通过对变化的研究（历时分析）、以及就此提出的对语言各个构成部分之间的“形式”和“关系”的精细、系统的研究（共时分析），向上述单面化的研究方式提出了挑战。为理解这些关系和形式，索绪尔把语言视为一个“总体的系统”（Hawkes 1977: 19 - 28）。任何词语或言说是通过它们与语言系统的结构相联系才有意义的。这使索绪尔质疑了那种语言研究，它似乎是由可被观察和分类的、分散的客观事物（例如名词、动词、形容词等等）所构成的。

索绪尔从我们用以辨识事物的图像、语词和声音着手分析，他把这些都称为符号。我们往往认为符号是交流意义的简单方式。实际上，它们看起来简单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已经理解了它们的含义。比如，如果我们考虑交通信号，我们不会把我们看到的图像（例如危险标记）和符号的意义（在这个例子是“小心，你面临危险！”）区分开来。然而，索绪尔感兴趣的是我们如何通过符号制造出意义。一个符号（sign）是由两种要素构成的，即能指和所指（图 1）。

$$\text{符号 (sign)} = \frac{\text{Sr}}{\text{Sd}} \quad \begin{array}{l} \text{能指 (媒介)} \\ \text{所指 (信息)} \end{array}$$

图 1 符号的构成要素

在符号中，**能指**（*signifier*）是作为媒介，即作为吸引我们注意并且传达了特殊信息的可识别的词语、声音或图像来活动的。**所指**（*signified*）就是信息或概念自身。交流过程包括

了确定含义（signification）的过程。当我们习惯性地选定一个词语—声音—图像去表示一个物体时，我们是在通过有意义的对比和联想这些熟悉的模式来理解它们。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个相互依赖的词语系统，其中，每个词语的涵义完全是随着其他词语的出现同时产生的。”（Saussure 1916/1959: 114）正是语言的相关性使我们得以理解词语、声音和图像。在组合关系（syntagmatic relation）中，我们通过将词语一起放在链条中来产生意义；而在联想关系中，词语可以被另外的词语替换，这在任何组合链条中都带来不同的联系，使不同的意义得以产生。这些联想关系可以以同义词（相同的意义）和反义词（相反的意义，例如好/坏）的形式出现。一般说来，一旦我们接受这点，即词语不是像镜子一样反映它们所指涉的事物，那么，我们也会被引向重新思考构成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理论关系。正是一个符号中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任意关系的存在，不仅使语言有了临时的固定涵义——这样一来在任何时点语言似乎都有一个明确的结构，而且使语言具备随时间推移而变化的可能性。一方面，语言系统仍被那些使用它们的人视为理所当然，另一方面，它们也在通过同样的使用过程被复制、修改和转化。

确定含义同时也是评价过程。当我们描述、归类我们所观察之物时，文化价值一直在发挥作用；当我们对事物分类时，我们也在对它们下判断。在我们为事物命名时，我们也在以一种等级秩序和道德价值的评估来赋予它们一个名分和位置。通过我们所使用的同样的词语，我们赋予所谈论的事物以价值。

文 化

反过来，这些词语仅仅在社会群体里我们所共享的价值系统中才有意义。因此，结构主义告诉了我们什么？这个取向暗示，不存在简单或中立的认知行为，而且，意义是通过关系被建立的。我们用以理解周围世界的每一个词语都充满了意义，而这些意义是通过建立在现行的隐藏结构的基础上、以模式化的方式被组织的。因此，索绪尔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社会科学中的文化研究的一些关键要件。然而，进一步的研究所需的理论框架要在语言学领域之外寻找。

在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观念是如何被用以理解跨文化现象的。列维-斯特劳斯试图发现无意识结构的深层语法，这些无意识结构支撑着我们借以有意识地交流并组织我们的事务的表征系统。像索绪尔那样，他强调一个系统里的关系，也强调孕育了变化机会的相反的关系。系统当中的每个要素是通过它与其他要素的关系被界定的，尽管总的联合数目被全部的总体结构所限制（这很像在一整副扑克牌中玩牌的方式）。此外，他相信这样做是可能的：准确说明一般法则，以解释人类行为在语言、求偶、亲属关系、交换和食物消费中的模式化特征。他吸收了埃米尔·涂尔干和马塞尔·莫斯进行的文化分析——他们论述了作为手段的仪式角色如何使团结出现，使共同的忠诚义务内在化（参见 Durkheim [1912] 1976; Durkheim and Mauss 1963; Mauss 1990）。然而，列维-斯特劳斯不认为仪式所具有的特定意义是完全定位于所考察的地方中的，他主张隐藏的动机具有普遍性。依照这种方式，在他的《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The Elementary*

Structures of Kinship 1949/1969) 里，他认为，虽然存在数量巨大的各种支配婚姻的规范，支撑婚姻的一直是乱伦禁忌。在许多文化情境中，他认为隐藏的俄狄浦斯神话 (Oedipal myth) 结构在对性行为的调节中起了重要作用。究竟什么是神话？

神话学使学生面临一个最初显得矛盾的状况。一方面，似乎在神话的过程中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没有逻辑，没有连贯性。任何风格特征都可以加诸于任何主体；任何想得到的关系都可以被发现。在神话中一切事情都是可能的。但在另一方面，这个明显的独断特性又被大量不同地区搜集而来的、令人震惊的相似性所掩盖……一个神话总是声称它所涉及的事情发生在很久以前。但赋予神话一个可用的价值的是，这个被描述的特殊模式是永恒的；它解释了现在、过去和将来。

(Lévi - Strauss 1963: 208 - 9)

索绪尔主要投入对语言的共时性维度而不是历时性维度的阐述，而列维-斯特劳斯则把神话描述为共时性与历时性相遇的时刻。此外，神话将日常生活中可见的现象与潜藏的结构整合了起来。结构主义分析在处理社会存在的矛盾时，需要一些统一的机制，以便为理解事件提供一个看似真实的解释。神话正是这样做的。因此，这一共时和历时、语言和言语的区分被神话整合了。正如读者以后将看到的，这一封闭的总体结构、或

文 化

加在可能的要素组合上的一套限制的观念招致了怀疑。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神话不仅在所有社会中起作用，而且它们和科学知识一样被严格、良好地组织起来的。结果，这个取向在动摇文明/原始的分基础、以及促进对西方知识的优越地位的动摇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最后，列维-斯特劳斯将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神话叙述的结构化成分方面。确切说，他阐明了看似真实的故事怎样被无意识地建立在二元或对抗结构的基础上，这个结构与叙述结构——通过它，一个故事以线性方式展开——一起发挥作用。叙述结构的研究不是新出现的，它可以在弗拉基米尔·普洛普（Vladimir Propp）精心的经验研究中找到。在《民间故事的形态学》（*Morphology of the Folktale* 1928/1958）中，普洛普有效地论述了文学研究里俄国形式主义传统中的叙述学。他的研究起因于他注意到民间故事研究的不足，尤其在对主题、动机和名字的分类方法方面。为此，他寻找一套可以在所有故事叙述中被辨识的隐含的原则，而且发现，依据经验在许多故事中发现相似的情节（plots）是可能的。他还发现，这些故事遵循一定规则，它们使我们能够理解各种相关的内容。这样的分析对结构主义者很有吸引力，因为它把一个复杂的叙述网络简化成少数规则或定则（这是结构主义者后来辨识为深层结构或原理的东西，它们难以在浅层的表象层次上找到）。这部著作的翻译丢失了一些重要的方法要素（题名应类似《奇异故事的形态学》[*Morphology of the Wondertale*]，也就是说形容词“神奇的”[magic]给丢失了）。他将经验观察与历史解释相结合，把他

的取向建立在对奇异故事一丝不苟的考察基础上。用阿多诺(1941)的术语来说，故事被标准化了，尽管决不能就此认为它与生产组织相联系。

奇异故事经常是可预测的，但这种方式被认为能带来更多乐趣。确切说，普洛普识别了构成人物类型的角色，以及这些人物在故事中借以付诸行动的任务。任务或步骤的数目限制在31以内，不过，这些任务的出现或缺席被用作为情节分类的基础。对任务的选择建立了情节顺序，这是一个基本结构，在所有民间故事中，变化都是从这一基本结构中生发而出的。这些任务或人物类型列在表1中。叙述范围可以用四种方式分组：

- 1. 叙述在圆满完成一项艰难任务的高潮中结束
- 2. 在对长期斗争的克服中逐步发展的叙述
- 3. 与上述二者均有关的叙述

表 1:普洛普的奇异故事分析中的功能和人物类型		
α	初始状况	家庭成员或英雄的引入
β	缺席	家庭成员之一不在家里。
γ	禁令	向英雄公布了一项禁令。
δ	违反	禁令被违反。
ϵ	搜索	坏人试图搜索。
η	传送	坏人试图欺骗他的受害人。
ζ	欺骗	坏人试图欺骗他的受害人。
θ	同谋	受害人顺从了欺骗，不知情中帮助了他的敌人。
A	恶行	坏人伤害了家庭的一个成员。
a	缺乏	家庭某个成员缺少某物或需要某物。
B	干预	灾祸被发现，英雄受到派遣。

文 化

C	反抗	探索者(seekers)同意采取反抗行动。
	启程	英雄离开家。
D	赠与者首次作用	英雄受检验,接受了神秘的力量或助手。
E	英雄的回答	英雄对未来的赠与者的行动作出回应。
F	接受神秘力量	英雄需要使用神秘力量。
G	空间的转换	英雄转向所寻找的目标。
H	斗争	英雄和坏人直接交战。
J	侮辱	英雄被侮辱。
I	胜利	坏人被打败。
K	清算	最初的不幸或匮乏被清算。
	返回	英雄返回。
Pr	追击	追捕:英雄被追击。
Rs	营救	把英雄从追击中解救出。
O	未被认出的到达	英雄未被认出,到达家里或其他国家。
L	没有理由的声称	一个伪英雄提出没有理由的声称。
M	艰难任务	一项艰难任务被推荐给英雄。
N	解决	任务完成了。
Q	识别	英雄被认出来。
Ex	暴露	伪英雄或坏人被揭露。
T	变容	英雄被赋予新的外观。
U	惩罚	坏人遭到惩罚。
W	婚礼	英雄成婚或上升为王。
普洛普的模式中有七种剧中人物类型:		
1	坏人	与英雄战斗。
2	赠与者	为英雄提供神秘的力量
3	助手	帮助英雄完成艰难的任务等等。
4	公主	找人。
	她父亲	分派艰难的任务。
5	使者	派遣英雄执行他的任务。
6	英雄	寻找某事物或与坏人战斗。
7	伪英雄	自称英雄不过被揭穿了。

来源: Berger 1998: 18 - 19

转载经 Sage Publications Inc. 许可。

4. 与上述二者均无关的叙述

例如：从前有一个沙皇和他三个女儿；女儿们在皇家花园里散步（年轻人的离开）；她们在那里流连不去，即便她们的父亲不准她们这么做〔违背命令〕；龙绑架了她们〔邪恶〕；她们求救〔干预〕；三个英雄听到她们的求救声，开始救难〔对立行动〕；三次与龙的战斗〔斗争和胜利〕；英雄们解救了三个女儿〔清算〕；她们回家了；英雄们与沙皇的女儿们结婚〔婚礼〕。这种叙述结构取向被应用于好莱坞梦工厂的俗套情节电影中，如詹姆斯·邦德系列电影、侦探片、恐怖片和神秘电影，也应用于电视节目中，如《囚徒》（Berger 1998: 19 - 20），结果令人印象深刻。在对完善建立的类型进行审查时，该结构尤其有效，而且它通过考察电影如何表达和解决特定时间、地点的矛盾和困境，提供了识别文本与情境之间的关系的机会。

在说明结构主义人类学如何帮助我们理解电影中的故事叙述方面，威尔·赖特（Will Wright）在他的 *Sixguns and Society*（1975）里有过颇受欢迎的研究。他把列维-斯特劳斯和普洛普的方法结合起来，探讨西部片二元结构和叙述结构。在赖特的研究里，他从经典西部电影中识别出 16 种叙述功能的特征。这些功能如下所示：英雄进入群体或社群；英雄是未知的陌生人；英雄有非同寻常的才能；英雄的非凡才能被发现；社群仍然不接受英雄；坏人与社群发生冲突；坏人证明了他们比社群更强大；坏人和英雄之间存在一种特殊关系或纽带；社群受坏人威胁；英雄试图避免与坏人冲突；英雄的一个朋友受到坏人威胁；英雄和坏人战斗；英雄胜了坏人；社群安全了；社群接

文 化

受或赞颂英雄；（最后）英雄的特殊地位丢失或放弃了。赖特把这个叙述结构的功能概述与深层结构的分析——它与列维-斯特劳斯辨识的东西相应——整合到一起。经典西部片的标准化情节对于为观众建立熟悉感来说是必要的。按照赖特的说法，对立的或二元的结构是心照不宣的组织原则，通过它这些原则，观众理解并享受这些电影。

任何文本都可以被作为一种语言来分析，也就是说，这个文本受一些规则支配，规则的连续性则建立在隐含的语法上。在这个经典西部片类型的例子中，二元结构包括好/坏、强/弱、社会之内/外以及文明/野蛮。最常见的叙述是一个陌生人介入，随后在夕阳中策马而行，战胜坏人的邪恶以及当地的原始荒蛮并解救了社群；这样的叙述提供的是对美国文化中个人风格的“拓荒者”（frontiersmanship）记忆的确认，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精确的描述了。日益扩大的工业化、城市化、非个人的集体存在与推崇个人主义美德的市民社会之间的冲突变得非常明显。在最小的意义上，“自由农场主”的小社群——它们被认为培养了美国的市民文化和政治文化——所具有的独特风俗和价值不再与现实生活相符。此外，大萧条的后果以及企业资本主义中的信心危机是如此严重，以致观众会从电影里那些市场环境的变幻莫测和大规模失业的内容中寻找安慰。对赖特（1975）而言，西部片的神话是在想象中调解对抗，解除紧张。他进一步论述，西部类型片的演化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在其内部形成认同的社会环境的重大线索。后来，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流行的“职业化西部片”里，英雄被送到荒蛮之地，是为

了抵抗来自文明化社群的罪恶和腐败力量，因此，叙述结构也相应地随着二元对立关系的变化而发生改变。

显然，相比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产业的看法，这种取向提供了对文化产品的复杂性更充分的理解，然而它有两个明显的弱点。其一，对文化产品的标准化的强调（这里的例子中是电影风格）会导致研究者忽视多种创新风格的文本、文化制品和实践，它们并不符合既定的正统标准。阿多诺对特定场所中的多种文化消费形式作出了很不公正的论述。其二，它还以一种粗浅决定的方式来处理观众和他们的消费特征。即便这种取向部分承认观众是积极投入对标准化文化产品的欣赏、而且从对流行类型（包括类型化倾向的创新，例如烹调术比赛和参与性的“自己动手”DIY节目）的扭转和适应中获得一些乐趣，它整个观点还是把观众视为文化上的傻瓜（dopes）。总之，消费被认为是对产品的屈从，意义则被假定已经贯注到文本中、而不是由观众构造的。

对主体的发明

尽管有这些弱点，而且我们下一个要探讨的思想家也经常与它们相联系，结构主义的大量概念性词汇还是保存了下来，进入近来的文化分析。路易斯·阿尔都塞不太受欢迎（gets a bad press），这既是因为他个人生活的不幸，也是因为自1970年代以来存在于他的大量文本中的讽刺性理论风格。因此，在此处细致周密、带有同情的论述中，我们集中分析他的著作中

对社会科学作出贡献的那些方面。让我们先从讽刺风格开始考虑。和列维-斯特劳斯一样，阿尔都塞试图详细阐明整套的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格局的各个地区之间的互惠关系（文化与政治、经济一样被包含在意识形态当中）。阿尔都塞的结构化表述或转喻因果关系（*metonymic causality*）假定，我们所分析的关系只有参考系统中的其他关系才能得到解释（Althusser and Balibar 1968）。在马克思主义当中，这是迈向视文化关系为一个独立整体领域的重要的一步。阿尔都塞一直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的失败中着手分析，以恰当地解释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文化环境。因此，结构主义提供了一种避免之前许多马克思主义分析的简化毛病的方式。

阿尔都塞（1968）相信，当马克思开创生产模式的一般理论时，还存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特殊理论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的地区性理论。马克思的方案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完成。阿尔都塞认为，在一般理论层面，阶级分化的社会形态、国家和政治，还有意识形态和文化，这些仍然有待于理论上的阐释。在资本主义的地区性层面，也仍然需要阐明一种国家和意识形态的理论。阿尔都塞和巴里巴尔（Etienne Balibar）在《阅读〈资本论〉》（1968）中，已经详细提出了一种社会形态的一般理论，同时他们还试图阐明马克思对这一宏大理论方案的贡献。论文《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Althusser 1971: 127 - 86）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中意识形态的地区性理论的出发点。在这篇论文里，阿尔都塞在一个抽象层面上将意识形态识别为一种表述，这种表述针对的是个体与他们的物质生存环境

之间的想象性关系。在考虑具体社会形态的组织时，他主张我们必须重点分析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SAs）的影响，例如教育系统、家庭、政党、商业联合会、宗教组织、民法、交流机构（大众传媒）和文化行动（被狭义地界定为文学、艺术和体育）。这使我们能够具体探究 ISAs 如何与压制性国家配置的强迫型机构协作，在执行资本主义再生产方面的发挥作用的。然而，这一抽象层面使该取向显得独断，随之而来的应用也显得过于简化，比如其中有这个观点：加入足球比赛使得工人阶级在输赢中获得颇有价值的教益，同时也使他们在市场竞争中软化。

或许正是对抽象和具体层面的区分招致了最大的误解。（和马克思的理论取向一样）阿尔都塞在抽象层面对简单关系的理论阐释中，对社会关系作了总体论述，而这个论述不能被视为以经验术语所作的精确描述。具体状况是由许多抽象趋势的复杂联合所组成的，其中一些会彼此取消，而其他的则会相互联合，以取得特定结果。因此，在具体状况中，上层建筑可以而且曾经违反个人资本的已发现的利益。抽象层面的外在运用使他能够辨别经济的决定性，经济支配的转换，政治和意识形态（在每一种生产模式及其发展阶段上），以及具体历史时刻中的多元决定的（*overdetermined*）矛盾运作（Althusser 1965: 87 – 128; Althusser and Balibar 1968 *passim*; Althusser 1971: 127 – 86）。然而，涉及作为一个系统的资本主义再生产（用高度抽象的术语来说），国家和意识形态最终在单独的时刻（in the lonely hour of the last instance）被经济决定了。不过，正如经常

有人注意到的，最后时刻永远不会到来。但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历史已经表明，在特定的多元决定的条件下，社会—经济变革就会发生。

阿尔都塞吸收了毛泽东（1937）的《矛盾论》一文观点，通过对俄国革命的分析提出了对多元决定的非常有力的描述。在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经济变革的标准解释中，首要的重点放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两大阶级的冲突上，二者都是以一种简单抽象的方式被理论化说明的。然而，在对具体状况的分析中，阿尔都塞认为，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造成后果的是首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之间、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矛盾与这些矛盾不均衡的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就俄国革命所发生于其中的具体社会形态分析而言（要记住，马克思主义者基本上没有预料到俄国或中国革命的发生，因为其经济发展不完全），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异常情形以及纠缠不清的矛盾。在俄国，其中就包括对农民进行封建剥削的残余矛盾，许多中心城市、矿区和油田中大范围资本垄断的出现。所有这些状况造就了资本主义城镇与落后的乡村之间一系列矛盾关系。封建贵族与军方权贵作为“统治阶级”的滞留，有组织的资产阶级的缺失（缘于沙皇俄国许多资本主义企业的跨国占有），这些是导致后来形势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一些单个事件——例如制度改革的失败，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极端后果——的社会情境中，一种独特状况已经出现，它导致了 1917 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

举这个例子是要表明，阿尔都塞非常清楚被盲目崇拜的阶级斗争这一粗略图景不足以用来分析在其内部能发生变化的社

会环境。他提出的结构主义分析就是试图对阶级关系和社会矛盾加以理论阐述，以解释历史的特定节点上具体社会形态的复杂性。为了这个原因，诸如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那样的文化制度分析被用来容纳上层建筑角色的变化，尤其是马克思的生活年代以来的国家干预的增长。这也可以被用来解释战后欧洲和北美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之中广泛分歧。阿尔都塞没有这样做，这使我们确信，他的不完全的论述仍然将人类行动曲解为受社会力量所控制。

在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取向那里，我们经常被引向这样的假定，即主体是消极被动的（作为没有因果重要性的剩余范畴）。当然，认同的构成受制于社会秩序的结构关系，但阿尔都塞的论述至少指出了我们寻找主体位置的动机。主体位置是对我们期望成为所是的理想化表述。举例来说，主体位置可以包括有效率的经理、好母亲、人道的医生、忠诚的职员、孝顺的孩子、受尊敬的老人、好客的主人、成功的企业家，还有或许不那么正面的顽固不变的怠惰者、调情者和酒鬼。阿尔都塞吸收精神分析理论家雅克·拉康的观点，认为位于无意识当中、被拦截和压抑的强大欲望可以被视为驱动我们寻找主体位置的主要原因，而那些主体位置并不在我们的利益考虑中。拉康从语言学上改写了弗洛伊德的观点，以解释我们如何通过对童年时期他者的期望进行内在化默认从而形成认同。

这个理论的根源在于分裂的主体观念，这一主体分裂来自母亲—孩子纽带的断裂和镜中自我的认知（孩子看到他们镜子中的具体自我，并承认了他们自己的主体性）。对拉康而言，

文 化

我们在生活中辨识运行于表述符号系统中的主体位置，是为了维持自我的缝合特性（sutured character）。阿尔都塞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表述符号系统包含了呼唤我们的主体位置。在这个他描述为质询（interpellation）的过程中，欲望驱使我们统一自我的碎片，我们回复以“是的那就是我”，对这些自我的识别反过来又帮助确保了社会结构的文化再生产。他感兴趣于无产阶级寻找认同——这有助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原因，但近来对该取向的使用强调了这个过程是如何可以被用来解释与性别、性意识和文化差异相关的对顺从的主体位置的采纳（参看第五章和第六章）。这种从对阶级差异的关注到更广泛的认同问题的关注的转变，是更加广泛的社会科学中再定位的一部分，也仍然是阿尔都塞最重要的——如果是无意识的话——遗产。

迈向文化表征的复杂性

索绪尔所希望建立的是符号学（即符号科学），而我们是通过罗兰·巴特对符号分析的解读才发现，这种语言分析取向有助于我们的文化研究。通过这个过程，它帮助重新界定了社会科学中可以被视为合法研究的论题。巴特对神话学的探讨带来一个结果，即如今社会科学中的分析目标包括了构成我们日常生活一部分的图像和文化制品。巴特在 1950 年代提出的文化评论当中，探讨了一个词语、声音或图像是如何对那些在特定文化场合中阅读它们的人产生意义的（在很大程度上和后来

Wright 1975 提出的相一致)。在巴特的早期著作中，他采取了对神话学的意图某种不加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取向。

巴特发展了索绪尔的原理，以便对以下两者作出区分：符号如何在“命名”（denotation）层面运作，以及它们如何从“内涵”（connotation）被转化进入意识形态机制。一个指代（denotative）行为包括对所考虑的、在语言层面（首级符号学系统）运作的事物所作的实际描述，而命名则是在元语言、在神话层面（次级符号学系统）运作的。在指代层面，桌子仅仅是一个带有四条腿或一个中心支柱的木制平面（或构成平面的木板联合）。然而，很少有这样对桌子明确界定的。当我们看到一张桌子，我们想到的是可以工作、吃饭、交谈、开会的地方，它解决各种不同的和可能的问题。按照巴特的说法，这些新的“寄生的”所指（具体哪一个取决于社会情境）把原始的符号转为空洞的能指，以便于负载其他的信息并转化它们的意义。通过举例，他探讨了酒和牛奶在法国文化生活中的角色。

在一切具有活力（resilient）的图腾中，酒维系了各种神话，这些神话并不因其矛盾激发困扰……它首先是一种转化物，能够将环境与状态转化，并且能够从与它们相反的目标中提炼出东西——例如，让弱者变强壮，让沉默的人喋喋不休……酒是社会的一部分，因为它不仅提供了道德的基础，而且提供了环境的基础；它点缀了法国日常生活中最微不足道的那些仪式，从快餐（廉价酒和卡门贝干酪）到宴会，从地

文 化

方咖啡馆的聊天到正式晚宴中的演讲。它赞美一切类型的天气：在严冬，它和带来温暖的所有神话有关；在盛夏，它和阴凉的形象、和一切凉爽、冒气泡的事物有关……酒有破坏和致病的特性，它转化并释放；牛奶则是装点门面的（cosmetic），它把表面联结并修复。此外，它的纯洁——与孩子的天真相联系——是力量的象征，这种力量不是诱导的、充血的，而是平和、白色、清澈的，适合现实……源自美洲的牛奶与石榴的奇异混合目前为止有时在巴黎有人喝，是一些强盗和流氓。但牛奶仍然是一种外来物；只有酒才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

（Barthes 1973：58 - 61）

语言学工具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化表征和文化制品。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法国日常生活的特征的某种事物是如何以一种识别其内涵的复杂性的方式而得到重建的。酒和肉一样是同一神话的一部分。如果作为日常生活普通部分的某物负载了丰富的意义，对这些意义我们很少发现，那么，广泛的文本、实践和文化制品就容易受到符号学分析了。符号学因此引导我们考虑社会科学中对新的目标类型的考察。我们经常当作家常便饭忽略的事物——比如食物消费或广告信息——对理解社会生活来说非常重要。它还使社会科学家对问题和表述的复杂性变得敏感，无论在他们进行研究的方式中，还是在他们交流各自发现的方式中。我们将在第五章再次讨论巴特的著作。

第三章 文化与结构：干预的逻辑

社会科学家并未赋予这些交流的方面以应该有的严肃关注，他们假定需要更具有可测量性的物质证据。总之，我们倾向于想当然地考虑语言学 and 符号系统，但这些表征系统却是社会实践的条件，也是通过我们使用的方式而被再生产、修改和转化的事物。之前我曾阐明文化主义者、人类学家和解释社会学家缺乏理解意义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内在联系的理论工具。同样的论断也可以用在所有取向当中，尽管它们开始针对文化生产的某些形式提出一种更充分的论述。在下一章，我们将考虑另外一些取向，它们能使我们超越对标准化的固置，也使我们超越对经济优越性的倾向的质疑。

第四章 文化与霸权： 迈向表达的逻辑

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学科性的文化研究方案兴起的期间，出现另一种试图容纳大众研究、解决之前讨论的诸多困难的文化思考方式。尽管存在一些促进文化和传媒的多学科合作研究的浮夸虚辞，来自现有学科规划的代表、由学术嘲讽所导致的压力，以及不断增加的对研究作为一种成功手段的强调，这些促使许多文化研究者选择类似于既存社会科学知识团体的学科性的框架。将既存的研究群体视为一套正统的参照点，将回顾性的集体再创造的研究视为这个或那个思想学派的宣言，这些倾向都说明正统化仍在运行。20 世纪早期至中期的芝加哥的社会学系中，极少有人会如我们在当代教科书里所见的那样，把“芝加哥学派”看作一个统一的研究团体。

我们可以在以下例子中看到同样的拔高过程：把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CS）所作的多种研究归拢到“伯明翰学派”名

下；奉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为正统经典。毫无疑问，不久以后就会有人对霍尔的早期和晚期著作采取公式化的简略概括，或甚至出现更可疑的文化主义的、葛兰西学派的和福柯学派式的霍尔。以这种发展类型，我们也将看到越来越多的把观念固化为基础原则的努力；简而言之，生产权威知识。

通过与主导性的学术倾向的斗争来形成一个新的探究领域，这种做法的副作用是诉诸学科性质的倾向。生发于新左派和其他激进流派、朝向文化研究的运动试图挑战精英主义和类似利维斯的文化等级分类。其结果，自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以来的激进政治运动的语言可以被认为是贯穿整个文化研究的、对权力和变革问题的全力关注。认识到这点很重要：文化研究本身受制于环境，而且它可以用作为一面窗口，通过它我们可以追踪思想流派的变动。当文化分析已经预先被社会阶级差异固化时，到 1970 年代年龄、性别、种族以及后来的性意识开始被认为是举足轻重的。如同对阶级文化的研究一样，焦点倾向于放在对社会改革和每一套特定利益的变革机制的辨识上。各种新的（或更旧的）社会运动持有一个普遍观点，即文化是被用来形塑欲望、隐藏我们有待释放的“真实兴趣”的。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这都是一种用来使分析有效的受压迫的立场。文化开始成为替边缘群体斗争的地带，同样也成为过度政治化的领域。简言之，（支配的）文化是成功的政治的产物。剩下的问题就是，哪种压迫提供了理解社会和政治秩序的最有效的基础。例如，女权主义立场取向尤其强调把家庭角色看作压迫的基础和其他一切主—奴关系的源泉。然而黑人女权主义

文 化

和对性别差异的关注一样，也关注种族压迫。家庭也被用作为针对法西斯主义的安全庇护所和抵抗场所。此外，黑人女权主义更加强烈地强调与男人的建立联合，以挑战压迫结构。

没有一个准则可以解释所有人的复杂多样的经验，这个重要而简单的认识意味着，可在其基础上构造解放性方案的、对社会秩序假定的客观说明不再能够建立了。当每一个运动把他们的策略建立在这样的声称——他们的压迫经验成为其他人的根本原因——上时，这是一种根本性的粉碎。对本质主义作为一种便利的虚构（convenient fiction）的承诺和认知的缺失完全改变了文化研究。我们所留下的是概念化词汇的使用，这些词汇是听起来很微弱的新左派的声音，不过是一套很不相同的、承认文化生活的复杂性的假设。为了理解这个过程，随后追踪这些词汇是如何影响社会科学的，我们需要更一般地考虑文化研究的发展。正如之前指出的，我不想延续不断增长的伯明翰学派的神话，好像这是伦敦的文化分析中惟一可玩的游戏似的。然而，我们的确不得不承认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作为催化剂的贡献，不仅在文化分类问题的研究中，而且在探索前面章节辨识过的文化文本和文化制品的生产和消费的问题中。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有助于开拓一个空间，使得后续的研究合法化。

再现马克思主义的隐蔽过去：霸权和对话

1970年代，在文化研究中出现两大突出的主题。首先是

“大众文化”的地位问题，以及更重要的对意义生产的关系特性的关注。其次，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物质生产组织与文化在再生产中的角色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那时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中最重要的突破出现于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的再发现以及后来的转化当中，其中包括安东尼奥·葛兰西论政治文化的著作，还有紧随其后的米哈伊尔·巴赫金和 V. N. Voloshinov 论对话交流的著作。当葛兰西通过一种对基础—上层建筑关系的再思考、将文化视为竞争性空间的方式提供了一种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巴赫金的对话交流论述则打开了对意义生产在支持或改变社会秩序中的角色进行思考的可能性。结果，对不断兴起传媒、文化研究——它对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变化甚至改革没有兴趣——的论点和证据的吸收成为可能了。

当前文化研究（还有相当分量的社会学）的概念语言是在 1970 年代形成表达的，尽管它们的用法与现在不同。在这方面葛兰西（1971）的文本作出了重要贡献。那些文本写于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之下的监狱里，为了不危及他的合法写作权力，他发明了一些新词汇来隐藏自己著作中的马克思主义特征。最重要的是，他对经济、政治与文化在意大利的具体环境中的复杂关系进行了理论阐述（他伪装他在花时间写民间故事）。他想理解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法西斯主义是怎样在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压倒工人运动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想从葛兰西的狱中著作那里汲取资源，在马克思主义的许多被公认为基础的假设上取得了突破（尽管他们还在使用马克思本人的政治著作来支持这点）：上层建筑并不必然与基础一致；阶级会联

文 化

合或反对其他社会范畴，例如官僚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阶级会因内在冲突而分裂；资本主义不会为它自己的灭亡创造条件。葛兰西把马克思主义重建为“实践哲学”，他认为，复杂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变革只有通过谨慎延长的群众运动的斗争才能取得。这些夺取霸权（政治的、知识的和道德的领导权）的斗争开展于政治、文化、教育、大众传媒领域，当然也开展于工厂里。这个取向假定历史是通过大量斗争形式被创造的，而不是经济规律或职业政党的密谋先锋活动的作用结果。

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因而是一种“没有承诺的马克思主义”；它承认革命并非不可避免，工人阶级并不必然是推动变革的行动者。它认为，社会秩序的复杂性，资本主义国家对生产过程的直接、自发的干预，以及资本主义调控危机、改善无产阶级的状况的能力，所有这些都要求，若要推动变革，就必须制订一个更灵活的策略。文化关系不再被视为欺骗无产阶级或以日常庸俗（mundaneity）来安抚他们的意识形态面具。相反，它们被描述为富于争议的领域，其中，社会力量在一场“争夺位置的战争”（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壕沟战争经验中得出的类比）中展开斗争。不同的阶级、联盟和社会力量试图取得“政治的、知识的和道德的领导权”，以赢得葛兰西所称的霸权这一积极的认可（Gramsci 1971）。这样一来它就有了双重涵义。霸权意味着试图确保统治，而且它还突出了这层涵义：任何阶级或联盟的完全统治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就没有任何变革可言了）。但这样一种斗争怎样开展？这是巴赫金的

著作入手的地方。

文化可被概念化为一种对话活动，一种其中能发生变化的主体间的关系，这个观念来自巴赫金圈子（对俄国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和米哈伊尔·巴赫金的命名）。Voloshinov 把交流有效地类比为一个电话交谈，他是这样论述的：

一个词语是架在我自己和另外一人之间的桥梁。
如果一个人结束了属于我的桥梁，那么其他人就依赖于我的倾听（addressee）。一个词语是由谈话和倾听、说话者和他的对话者共享的领地。

（Voloshinov 1929/1973：86）

这个取向还认为词语有多重涵义，它们永远不会绝对属于说话者或写作者，因为它们面临大量解释。对巴赫金而言，意义是通过对话建构的。和威廉斯试图概述一种文化的人类学界定一样，巴赫金圈子以一种更加正面的方式看待大众文化，虽然他们仍然采纳等级上的区分。在巴赫金对狂欢节化（*carnivalesque*）观念的论述中，大众文化活动被刻画为过度、粗俗和放纵，它们有着中世纪民间诙谐的根源。节日及其遗产在我们的文化中创造了一扇窗口，它可以使那些通常是无权者的人表达心声，让自己被人听见。

在节日期间，一切等级优越性的悬置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官方庆典中等级是尤其明显的……这是对不

文 化

平等的神圣化 (consecration)。相反,节日期间所有人都被认为是平等的。在城镇广场这里,人们盛行一种特别的自由形式和熟悉的约定,而那些人往常是被等级、财产、职业和年龄所划分的。

(Bakhtin 1984: 10)

这些非同寻常的节日提供了一个情境,其中,观点和意见、委屈和烦心都可以通过直率无畏的方式表达出来。没有仪式性的礼节规范,也没有通常的差别关系,节日是仅有的可以在其中体验真诚人际关系的时间。对当权者的恶言谩骂和滑稽模仿等技术的使用,也创造了改变事物过去的组织方式的机会。巴赫金把节日狂欢的口述传统视为当代小说的发展特征,正是他这一辨识方式吸引了我们的注意。正如巴赫金对拉伯雷、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狄更斯所创造的诸如邦布尔先生 (Mr Bumble,《雾都孤儿》中的教区干事) 这些人物形象的探讨所表明的,我们遭遇了多重声音,这些声音展示了那些用权力来把自己矫饰为道德正直的人的虚伪和卑劣的自私。他认为,在小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节日狂欢式戏谑和欢笑线索,这条线索嘲弄权威人物 (他效仿市场上的渔妇们粗鄙、嘲讽的咒骂,把那些权威人物描写为“下流粗俗”)。这和那些单一风格的史诗类型取向形成鲜明对比,后者试图封闭其他一切解释和意义,压迫除权威之外的所有声音,而且以一种道德说教来强调传统美德。与独角戏不一样,小说在一种捕获并表达了某种持续进行的复杂性和现实经验的语言中,包括了异质性 (heteroglossia)、

第四章 文化与霸权：迈向表达的逻辑

多元化的语体或言语类型（Bakhtin 1981）。因此小说是复调的，它容纳了大量类型和声音，每一种都向不同的观众表达自己。

任何单一民族语言内在分层，转为社会方言、独特的群体行为、职业行话、普通语言、同代和同年龄群体的语言、偏见语言、权威语言、各个圈子和即逝时髦的语言、适应当时特定社会政治目的需要的语言、甚至即时语言（每一天都有它自己的口号、自己的词汇、自己的重点）——这样一种在任何语言、任何既定历史存在时刻中出现的内在分层是小说体裁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Bakhtin 1981: 262 – 3）

巴赫金提出了一段有关意义生产的论述，这个论述假定语言的偶变性和语调的使用是交流中至关重要的部分。如我们在 Voloshinov 的著作（但现在人们认为那些著作是巴赫金写的）中所看到的，这个对话取向挑战了指示性命名与评价性内涵之间的严格区分——它支撑了“科学模式”。

这类指示性意义和评价之间的分离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它源于没有注意到语言当中更深刻的评价作用。指示性意义是由评价塑造的；它归根到底就是评价过程，这个评价决定了特定的指示性意义可以进入

文 化

说话者的视野……恰恰是评价充当了创造性的角色。意义的变化本质上经常是再评价：把一个评价语境与另一个语境中的一些特定词语互换。词语意义从评价中的分离不可避免地剥夺了意义在现实社会过程（其中意义经常被价值判断渗透）中的位置，使它被本体化和转化进入的理想存在（Being）与历史上的生成（Becoming）过程脱离。

（Voloshinov 1929/1973: 105）

这个取向认识到知识是被历史和社会定位的，语言可以被用来裁剪信息，以适合一定的物质条件中的特定观众。作为一个交流模型，它还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框架，以理解社会科学知识是怎样从独白走向对话取向的。更重要的是它承认了这一点，即公认的观点和道德高调总是与强硬的抗议和抵抗的声音相互斗争。文本被刻画为斗争领域，而不是以卢卡奇那样根据它们能否促进人类解放的方式被分类。

交流和意义生产可以被识别为主体之间相互发现的经验，同样，它也是易于变化的。在尤其重视权威声音的社会科学领域——例如经济学，维维恩·布朗（Vivienne Brown 1994）在她对亚当·斯密的学说的探讨中，认为这是一种创造经典的手段。从“对话主义”和“独白主义”的对比中，我们被引向考虑它们风格的、比喻的和修辞的形式。布朗认为，亚当·斯密的著作比当代社会科学所认定的更具有复调性。斯密经济方面的著作并没有提供“理性经济人”形象的基础，而是充满文化上特

定的伦理假设和价值（其中有许多使那些新自由主义对亚当·斯密的独白式解读成为问题）。通过质疑独白式文本的地位——在那些文本中，单一的声音总是试图拥有“定论”（last word）——我们可以开始考虑卷入到理论工作中的复杂的意义游戏。这些技术提供了一种识别隐喻支流的手段，这种手段可以突出所考察著作中的故事情节的发展。保罗·法伊尔阿本德（1978）引发争议的比较——他把1950年代的一部科学教材与一部寻找女巫的手册《女巫之锤》（*Malleus Maleficarum* 1484）进行对比——就是这种差异的一个鲜明例子。这个风传为迷信、可怕的手册的各个部分以多元主义的方式探讨巫术的现象、起因、合法内容以及神学内容。尽管它有效地论证了一个例子，但它仍然以一种平衡、评价的方式讨论了多种选择。另一方面，那部科学教材则试图取得封闭性结论、拒绝批判性的讨论，因为它害怕自己传播权威知识的作用受到破坏（Feyerabend 1978: 92）。布朗为经济学上可以容纳社会科学文本的复杂性的异端声辩。这里我们关注的是巴赫金的著作如何解开了既定的文化分析模型的束缚，不过，以后在探讨文化上的后结构主义取向时，我们将考虑这些观点是怎样以不同的方式被解读的。

文化研究已经朝这个方向发展，而且这些研究也被广泛引用。在《电视话语中的编码和解码》中，斯图尔特·霍尔（1973）试图对大众交流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的交流模式进行理论上的再思考。行为主义假定交流是一个线性过程，是发送者、信息和接受者之间的单向关系（有时还有进一步的中间阶

文 化

段)；为了对此假设进行批判，霍尔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循环隐喻。按照这种方式，他设计了一个文化循环，其中包括价值的生产——其方式与资本主义特有的劳动力商品化过程相似。制度性的结构、网络、技术基础都是一个散漫模式中的劳动过程，而观众的接受就等同于文化的实现。与马克思的循环一致，如果循环要继续的话，话语生产必须转化为实践。文化生产包括编码信息的形成——那些信息来自文化情境中观众的事件、处理和形象，而且被塑造成有意义的话语（由此一些信息占据了特权位置）。在接受的时刻，编码信息被观众操作进入了社会实践的结构，反过来又反作用于生产过程。

这个编码/解码取向受巴特早期著作中符号学的强烈影响。霍尔认为，任何解码和编码之间的不对称（没有建立交流中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平衡关系）都是导致误解的可能来源。不同的观众依赖他们想当然的常识知识（一个现象学上的观点），也以不同的方式解读信息。三种类型的解码策略得到了确认。对大多数被社会化推入“统治—霸权性位置”的观众而言，他们很有可能以预期的方式对诸多统治性文化秩序的首选意义进行解码。当然，特定社会群体的地方状况可能会使观众觉得，首选意义与他们的经验无关——位于赞成和反对之间的“协商位置”扭曲了文本的意义。举例来说，工人赞同新闻中的政治信息，即地方的要求不能破坏国家的利益，而这并不需要阻止他们投入联合行动。当观众作出与预期相反的反应，他们是在对可选择的参照框架内的表述——一种“对立代码”——进行再解释。发展了这个框架的是大卫·莫利（David Morley）的

第四章 文化与霸权：迈向表达的逻辑

《全国性的观众》（*The Nationwide Audience* 1980），他在该书中探索了不同的人群是如何运用他们的经验去接受、弯折（refract）或拒绝一个晚间时事节目的编码信息。银行经理、学生和学徒的解码策略赞同预期信息，而商业联合会官员、摄影术学生和大学艺术系学生则会与信息协商。这些回应显然不同于工会商店服务员和黑人教育促进组织（black further education）的学生对立的解码行为，他们认为那个节目与他们的经验几乎不相关。这一对观众回应的研究如今被视为一项符号学研究，它把文化研究和传媒研究集合了起来。此外，科林·斯帕克斯（Colin Sparks 1996）认为它最先推动了使用民族志方法对观众进行研究。

文化走向政治：

文化主义议程迎接新葛兰西主义方案

当代文化研究是在自 1960 年代至 1980 年代早期在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集体工作中形成的。起初，在理查德·霍加特的领导下，文化研究中心开展了一系列对工人阶级文化、教育和青春期进行的文化主义研究议程。霍加特离开中心去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后，斯图尔特·霍尔接替了他成为中心的领导角色，这个研究议程在由新左派（一个知识分子运动，霍尔也是其中一员；该运动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观点应用到对西欧社会的研究中）倡导对霸权进行论述的情境中被发展了。到 1960 年代末，战后的一致舆论实际上已经结束，社

文 化

会冲突成为英国社会越来越明显的特征。在这个社会情境下，随着工党和保守派政府站在一条线上反对有组织的联合行动以及新的社会运动，有关阶级分化和斗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又重新振作起来了。

为了理解文化研究中心的工作，我们需要把它置于战后资本主义危机以及有组织的劳动和资本对国家政策的支持的分裂当中。此外，在 1970 年代出现了一个政治危机，由于这个危机英国被认为无法控制了。同时，由于经济上通货滞胀、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公共部门开销受到严格限制，这对文化领域产生显著影响。复兴的右派相应出现了，它吸收新自由主义的假设，试图修复自由市场竞争，缩小国家对经济干预的范围。中心的研究代表了这些变化的文化和政治影响——它们体现在贯穿全书的文化理论的标题（rubric）中。结构主义观提供了一个框架，以详细记录资本主义体系的影响并强调文化与教育共同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再生产中的角色。他们公开承认之前几代受马克思主义激发的理论家的错误，并拒绝了经济决定论。相反，他们全力关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策略——通过这些策略，霸权的方案得以建立。这相当于更加强调策略性行动或力量在具体的多元决定状况中的角色，而不是强调以更抽象的术语加以理论阐述的社会结构。

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环境特别突出多学科交叉和密切的合作，这塑造了文化研究和理论阐述的形式。他们采取的方法是折衷式和综合式的，并且关注富于争议性的论题，比如青年亚文化和不满的出现，大众传媒中文化的刻板化，对种族少数群

第四章 文化与霸权：迈向表达的逻辑

体的治安管理。在这个简短的论述中，三个与文化研究中心有关的研究将被重点强调。在《通过仪式来抵抗》（Hall and Jefferson 1975）中，作者的目标是消解一个统一的“青年文化”的观念，探索青年亚文化是如何与阶级文化及战后英国文化霸权的产生相关联的。文化的定义很大程度上来自雷蒙德·威廉斯的“生活方式”概念。对霍尔和杰斐逊（1975：10-11）来说，文化包括意义指示图（maps），通过它，社会经验获得可理解性。他们探讨越轨活动和不守常规的主体位置怎样经常表达了工人阶级的价值。许多阿飞（Teds）、时髦分子、摇滚乐迷、光头党和叛逆青年（Punks）不仅拒绝受他们父母的约束，而且铺陈风格，以抵制那些强迫他们以更能接受的方式行事的人。对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者而言，青年文化中展示认同的风格化的即兴作品是一种政治行动，它拒绝中产阶级的期望，而且无可否认，这种期望在青年们的高失业率这一经济环境中尤其不切实际。

这些论说很大程度上借鉴了第二章讨论的互动论的社会学概念和有关犯罪和越轨的常人方法学研究。这些民族志研究中，重要的是他们对过程的论述——通过该过程，那些占据了权威的作决定的位置的人们得以贴标签和分类，将个体归属到特定群体类型当中。这些类型到处散布，从类似“青少年罪犯”和“惯犯”等官方批准的标签到不经意和非正式的分类实践——其中，某些群体被命名为（而且实际上成为一种名声）“麻烦制造者”、“问题儿童”。斯坦利·科恩（Stanley Cohen 1972/1987）在他对时髦分子和摇滚乐迷的研究中，对于把青

文 化

年亚文化视为民间恶魔、由于传媒对越轨的夸大其词而导致的道德恐慌等现象都进行了概述，文化研究中心从这一研究中受益匪浅。认识到新闻界歇斯底里的角色以及把青年亚文化夸张为对社会结构的威胁之后，社会学的关注点开始转移到传媒表述上。对符号维度的强调还表明，他们接受了罗兰·巴特(1973)将符号学视为观念混合物的一部分这一看法。对服装形式的研究也使他们探讨阿飞青年服装的内涵——通过鲜艳的颜色、使用缎子及其他歪改爱德华式服装代码的装饰，那种来自伦敦二手市场的服装逆转了爱德华式的服装样式，并且以此嘲弄了对身份的认可。

起初，爱德华式服装是在 1950 年由萨维勒街 (Savile Row) 一群立意开创一种新风格的裁缝引进的。它主要面向城市中的青年贵族……1953 年某个时候这种服装开始在工人阶级青年当中流行开来……阿飞们对这一风格的改动是在鞋带结上；厚绉绸的鞋子（伊顿俱乐部高帮皮靴类型）；紧身、直筒 (drain-pipe) 的裤子（没有翻卷）；不加装饰的、束腰的夹克；斜纹厚绒布或缎料的夹克衣领；以及明艳的颜色。早期阴暗的服装颜色有时让位于鲜明的绿色、红色或粉红和其他“原初的”颜色。

(Jefferson 1975: 85)

这种即兴作品，以及在油亮、后梳的头发、摇滚乐和满不在

第四章 文化与霸权：迈向表达的逻辑

乎、被认为易造成伤害的态度之间建立的联系，都促进了一种强烈的集体认同的形成。迪克·赫布迪齐（Dick Hebdige 1975）对附加于时髦分子的认同之上的意义的研究也表明了对地位的渴望，尽管这里引人注目的物质消费与舞蹈文化及对类似“安非他命”的药物使用紧密联系。与此类似，从 1930 年代到 1950 年代，传统工人阶级服装受到夸张的想象处理，其形象是 T 恤衫、背带、紧身牛仔和多克·马顿牌（Doc Marten）厚底靴子的混合，外加与此形象相统一的精心修剪的“山羊皮头”（suede head）发式——这种发式运用了有关集中营的记忆，以树立一个不满的另类形象。这有些好斗意味，不过它主要是针对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对市中心贫民区的再安置导致的强行拆迁（forced dislocation）所作出的回应。光头党亚文化导致已被遗忘的共同体意识（sense of community）的不可思议的恢复。根据乔恩·克拉克（Jon Clarke 1975）的研究，光头党体现了对归属感和根基意识的强烈渴望，而这种渴望是用法西斯主义和整齐划一的（homophonic）语言和暴力表现的。这些充满活力的行动和有动机的回应改变了社会—经济环境。正如赫布迪齐简洁概括的：

工人阶级 + 时髦分子 + 安非他命 = 战斗（action）

中产阶级 + 嬉皮士 + 大麻 = 服从（passivity）

（Hebdige 1975: 96）

然而这种遵从一个刻板形象的共同体的渴望也在性、种族态度

文 化

方面导致重要的结果。事实上，这些都是对男性亚文化的研究，其中女孩都被边缘化或是适应流行的刻板形象。安吉拉·麦克罗比（Angela McRobbie）和詹妮·加博（Jenny Garber）的结论是，对女性青年文化、经验和抵抗的比较研究是在极为不同的社会空间里开展的（McRobbie and Garber 1975）。可直接阐明这种男性中心的固化的研究来自文化研究中心的另一个重要的文化研究案例，它是由“通过仪式抵抗”小组成员之一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所作的。

在《学习劳动：工人阶级子弟是如何得到工人阶级工作的》（1977）中，威利斯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与 12 个少年男孩进行了深度访谈，重建了他们对彼此，对女孩、文化差异、教育以及他们未来在“锤镇”（Hammer town，即 Wolverhampton 伍尔弗汉普顿，靠近伯明翰的一个英国中西部工业地区的城镇）的工作生活的态度。被访谈的男孩嘲笑了那些如“earoles”一样刻苦学习的男孩，与他们的教师开展了一场消耗战以“找乐子”，并且对他们自己在学业上的失败进行了庆祝。他们展示了（非常明确地）法西斯主义和男性至上主义的态度，相信存在这样一个前景，即在他们离开学校的那一天，他们会得到一个有“男子气概”、能带来收入的体力工作。在之前对教育和青年的社会学研究中，即刻满足和当前倾向被视为文化剥夺的结果，甚至是教育上的低能状态。在这个对教育过程和主体认同的新葛兰西主义的讨论中，这些工人阶级的孩子不仅仅是被教育成适合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的（作为工厂的后备力量）：他们心甘情愿进入该秩序。在这个研究中，威利斯（1977）明

确地指出了—个层次，在该层次上，作为—场争取人们的情感和精神的战斗的霸权式斗争必须开展。

文化与政治变迁

把这些内容以—种连贯的、政治的方式组织到—起的研究方案是文化研究中心对抢劫（mugging）进行探讨的研究小组。他们在研究成果《治理危机》（*Policing the Crisis*, Hall et al. 1978）中探索了变动的经济环境及其对政治文化的影响这些特定序列。1970年代的国家财政危机，以及自1960年代中期以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力长期的衰落，这些联合起来导致了雇主与工会——特别是具有战略重要性的矿业工会——之间的谈判关系的破裂。结果是更大的工业冲突和别处相关的争论。在阿尔都塞学派的运动中，霍尔等人（1978）认为，既然确保—致的意识形态机制已经失败，那么国家就必须采取—种更具强迫性的取向，以维持社会和政治秩序。如果要获得资本主义的重建，那么，就需要—种治理以及犯罪司法体系中的转变，以便于控制变革的副作用。要使压制性的国家机器运转，需要某种程度的积极赞同。抢劫研究小组主张，大众传媒针对犯罪和抢劫激起的道德恐慌导致了这种结果：种族少数派（与工会商店服务员和激进活动家—道）被指认为要对道德和社会的堕落、混乱负责的“民间恶魔”。这为1970年代中期“法律与秩序”议程的发展提供了意识形态的辩护理由。年轻的黑人成为为社会病负责的传媒的替罪羊，这个不断增强的意味提供了—个环

文 化

境，在这个环境下，右翼政治家可以打出种族的牌，以此作为代表资本主义利益的霸权方案的一部分。传媒和文化应该被视为其间可以进行霸权式斗争的地带。霍尔等人（1978）认为，如果任何人可以将英国人民潜在的恐惧装进瓶子并作为政治信息售出，他们就会改变英国政治的面貌。这恰恰是发生过的事情；撒切尔政府利用了潜伏在英国文化底层的恐惧，以使得自1940年代以来主要被社会民主党统治的价值和假设相互脱离（*disarticulate*）。在原来的位置上，撒切尔方案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连接（*rearticulate*）了它们，这种方式即：集体主义只能被视为一种对私人生活的侵扰，它是“保姆国家”（*nanny state*）的表达，而不是保护人们从摇篮直至坟墓的“慈善家长”。在这个过程中，失业者、无家可归者和穷人被重新界定为私人的困扰而不是社会问题。

在《治理危机》中，我们看到把撒切尔主义刻画为“独裁的民粹主义”的构成材料（Hall 1980, 1983a, 1983b）。新葛兰西主义对1970年代晚期和1980年代早期的社会变革的论述受两个重要立场的影响。其一，对新兴的权威式中央集权制（*authoritarian statism*）的指认，源自尼科斯·波朗查斯（Nicos Poulantzas）的《国家，权力，社会主义》（1978）。其二，葛兰西学派的消极革命和霸权概念，它们被恩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 1977）用作为民粹主义概念化的基础。霍尔最关注的是，左派过多地论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这损害了他们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中的斗争的理解。这点在政治右派设法垄断大众—民主领域时变得尤其重要，因为“民主

问题成为斗争的主要战场” (Hall 1980: 158)。霍尔的论述实际上是在呼吁左派更严肃地对待民主问题，当政治右派围绕在一个复杂的立场战争中捍卫法律和社会秩序的主题，成功地结合了大众支持以反对社会民主权力集团（从底层生发的消极革命）的时候。

由于大众民主话语是通过人民与权力集团之间的矛盾建构的，对个体的选择、自由以及撒切尔式民粹主义话语的个人责任来说，把社会民主权力集团视为国家主义、官僚主义以及渐进集体主义的做法就成为一个不费力的对照 (an easy contrast)。实际上，1980 年代撒切尔主义的确占据了道德高地。然而，当保守党于 1979 年掌权时，民粹主义从大众需求和服务的积极动员完全转到了确保主动赞同、防止政党系统和国家中的对立这方面。霍尔把这点描述为民粹主义的腹语术 (ventriloquism)，它在损害议会代议制的情况下加速了国家中的权力集中。依照这种方式，危机被描绘成为争取民众对不断强化的独裁体制的赞同而进行斗争和论战的至关重要的地带，而不是反映既定经济状况的“政治之镜”。目前关于政治谈得足够多了，但它对文化研究的影响又怎样呢。

一个充满活力的消费者驱动的市场秩序的出现的的确改变了英美两国的文化景观，随即也改变了 1980 年代的文化研究；最显著的是，这种改变是通过将文化研究的视线从生产转到消费以及日常生活中对文化的运用上达到的。1970 年代的政治经济取向缺乏概念术语以充分探讨这个转向、以及各种出现在它们位置、被散漫地命名为后现代的取向。这些取向聚焦于风

文 化

格、表述和文化消费，以便对我们时代的一些主要变化——如信息社会和全球化的出现——提出描述性的概括。这个研究把后现代从后结构主义取向中分离了出来，以强调后者对社会科学实践的重要性。后现代取向对 1980 年代的社会研究中实质性的考察焦点进行了非常生动的再塑造，尤其是对各个领域的本质和基础进行了质疑。然而，除了后结构主义理论创立了一些概念之外，几乎没有出现什么概念传统了。因此，我有意在这个叙述中将后现代主义边缘化（参见 Lyon 1994）。（关于后现代主义和科学知识讨论的更多细节，尤其参见利奥塔对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概念的再论述，见 Smith 1998b: ch. 7.）

为了在一个迅速变化和复杂的文化情境中通过实际问题展开马克思主义的框架，文化研究中心的许多成员被引向重新思考干预的逻辑以及他们对政治经济的潜在首位的强调。显然，对政治文化中的这些转变的仔细分析，以及文化研究不断变化的关注点（因而阶级分析也可以找到一种容纳性别和种族的方式），这些都要求一种更灵活和充分的解释意义生产的方式。新葛兰西主义的松散论述——即经济形塑了文化——没有承诺，它只提供了一个单向出口（one way out）。同样显著的是文化要素的表达和重新表达的风格化，这些文化要素包括了不断争取统治的斗争以及抵抗的产生，而没有假定它们具有自己阶级利益的根源（Laclau and Mouffe 1985）。关注点转向了争取霸权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斗争，及确立对可选择的霸权式常识的长期重建。然而，斗争、社会对抗和冲突的隐喻仍然存在。

迈向作为竞争性空间的文化

因此，社会认同是通过斗争实现的；它们是流动的，面临持续不断的转变；它们永远不会结束，而是未完成的事件。文化研究中心的斯图尔特·霍尔等人挑战了这个观念，即文化表征应该被解读为某个阶级利益的简单宣言。他们以一种关联的方式，把交流和文化解释看作为意义协商和被界定的大众文化提供的竞技场。确切说，这种取向认识到文化范畴的界定是随社会关系的不同而变化的。文化研究中心不是把大众文化看作低等文化，他们认为其意义取决于它与其他范畴的关系。总之，既然“大众”的意义只有通过它与其他诸如高等、精英和少数文化等范畴相联系才能得到理解，我们就必须承认这些东西是在持续不断的运作中。以这种方式界定文化，和以下这种方式相比是截然不同的突变：客体在社会科学中被当作一件个别的事物来界定，这件事物的存在就研究目的而言，是与研究者相分离的。

随着研究在各个领域——早前它们被霍加特和威廉斯辨识过，尤其是关于阶级、青年、教育和区域的文化——的开展和积累，这点变得更加显而易见了，即认为文化不过是某种环境的隐藏机制的表达这种观点不再有意义。在文化研究中，对于新葛兰西主义霸权分析的运用聚焦于社会力量投入不断的争取政治、知识和道德领导权的斗争的方式。在霍尔及他的同事的著作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效的关于文化如何被重新界定的

文 化

例子。干预的逻辑假定，文化是某种潜藏基础的宣言。当然，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主要关注的是阶级力量以及其他范畴，如知识分子。霍尔和文化研究中心的其他参与者发现了与阶级并行的其他形式的社会对抗（确切说，即性意识、性别、种族和年龄中的差异）。这意味着，必须以一个比之前马克思主义者所采纳的文化取向——他们把该取向建立在干预逻辑的基础上——更加松散的过程来理解文化的竞争。马克思主义者以为，辨识一个文化表征的范本是可能的，比方说超现实主义诗歌，就可以追溯它的“起源”直到作为固定参照点的某些阶级利益上，在这个例子中这个参照点就是小资产阶级（小店主）的表达。甚至布迪厄也把品味的差别联系到建基于社会阶级差异的等级制的维持上。另一方面，结合（articulation）的逻辑则不认为阶级与文化之间存在必然联系。按照这种方式，文化表征被认为不断面临挑战（其要素可以相互脱离并再结合），而不是被一个潜在结构决定了。

运用霸权的观念来处理文化，文化可以作为一个各种社会力量在其间斗争的空间加以概念化。和许多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出现的人（不仅是不知名的后现代主义者）一样，霍尔质疑了文化表征是某种阶级利益的宣言这一观念。他以一种关联的方式，把交流和文化解释看作向意义协商和被界定的大众文化提供的竞技场。就像以前讨论过的符号学者一样，霍尔要求我们认识到，文化范畴的界定随文化领域中关系的变动而改变。他不是把大众文化看作低等文化，而是认为其意义取决于它与其他范畴的关系，也就是说，大众的意义只有通过它与其他诸如

高等、精英和少数文化等范畴相联系才能得到理解。

随着时间的变化，每个范畴的内容也在变。大众形式在文化价值中得到提高，踏上了文化滚梯（escalator）——而且发现自己站在相反的一边。其他事物不再具有高级的文化价值，而且被划入大众领域，在这个过程中被逐渐改变。结构性的原则并不由任何一个范畴的内容组成——我坚持认为，这些范畴会随时间而变化。毋宁说，这个原则是由力量和关系组成，它们维系了特性和差异——粗略地说是这二者之间的差异：在任何时候都举足轻重的精英文化活动或形式，以及不那么重要的文化活动或形式。

（Hall 1981：234）

霍尔提出了一系列方法作为总结；我们将重点分析其中的两种，以突显意义连接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确根据斗争和竞争提供了一种社会分析。然而，将文化形式看作对潜在经济利益的意识形态的表达，这远远不能令人满意。这在文化研究自身中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对消费问题、而不是对生产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多（参见 Miller 1995）。对霸权——也就是社会力量投入不断的争取政治、知识和道德（如果你情愿，也可以是文化的）领导权的斗争的方式——进行分析也是尤其重要的。仍然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界定一种社会力量的方式。不像葛兰西那样，我们不必如此受制于阶级、成分（fraction）和有限的社会

文 化

范畴，因为社会对抗的诸多其他形式都是相关的。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关注投入到复杂的连接（articulatory）实践（其中只有一些可能偶尔以社会阶级的建构为基础）的各种社会和政治运动中的认同形态。这意味着文化竞争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松散的过程，而不是如有些人假定的那样，他们认为文化建立在干预逻辑的基础上。对一个文化的文本、文化制品或实践加以辨识，追溯它的“起源”一直到某个固定的参照点为止，这个观点看来好像尤其不适当，它过于简化而且容易造成误导。在下一章里，我们将更详细地探讨连接逻辑的应用。

第五章 被争夺的文化空间： 认同，话语和身体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确信文化包括了现实的主体之间的符号关系，通过这种关系我们得以理解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环境。实际上，迄今为止我们探索文化观念（以及它是如何被分类的）的任何一种方式都受制于环境。它们是调控意义生产的表征系统的主要部分。简言之，这些理论是理解我们是谁、我们生活在何种社会关系中等问题的独特尝试。它们还界定了哪些是我们能够、哪些不能够认真对待的。文化同时是一种脆弱的联系的产物，这种联系建立在语言的各种要素之间，它还受到制度——它们本身即文化实践的产物——的限制。如果文化是一套语言学、符号学和对话式的关系，那么它也是偶变的（contingent），而且它的要素可以被分离和重新结合。这直接挑战了之前讨论的结构主义对语言的论述，而且打破了如下看法，即明显可见的语言表达是被隐藏的总体结构决定的。不能

文 化

把有意义的交流看作对一套固定的语言系统的转瞬即逝的表达，意义的建构涉及流动的（floating）要素转变为短暂固定的瞬间（Laclau and Mouffe 1985: 93 – 148; Laclau 1990: 3 – 85）。

如果交流和文化的解释包括意义的协商，而且被认为具有富于争议的特征，那么，这与社会科学中对分析客体传统的定义方式是截然不同的。但是，不仅仅文化以及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是以这种方式被重新评价的。各种不同的知识领域中的分析客体受到同一个开罐器（can – opener）的作用，这个开罐器撬开它们想象的形象，将它们的基础作为合宜的虚构展现出来。甚至医科研究——尤其是在医学实践历史的领域（Porter 1987），也已经开始质疑有关人类身体的特征及其与精神的关系方面的想当然的假设。实际上，近来一些取向主张，精神/身体二分的保留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特纳（Turner 1995）认为，这两个范畴的构成都散漫无际，它们应该在制度实践的范围内得以定位——那些制度实践是为了职业组织的利益而投入到对身体的调控中。

将疾病看作面临各种视角阐释的文本，这是探讨疾病的一个激进的取向，因为它指出了医学模型中的一些问题——而那种医学模型是制度化的、科技导向的医学的基础……把身体看作一种机器的当代医学认为，疾病是身体这台机械机器出了故障。所有“真实的”疾病都有特定的因果机制，该机制可以最终被发现和处理。这样一种取向排除了经验、感情、情绪和

第五章 被争夺的文化空间：认同，话语和身体

解释在现象学意义的疾病中的中心地位和重要性。

(Turner 1995: 205 - 6)

按照这种方式，特纳（1995）试图发现一种对具体表达的自我及其与这类调控实践的关联加以理论阐述的方式。以后我们会重点分析围绕近来社会科学实践中“身体”的角色所做的阐述。这种视文化（或在那个问题上即身体）为被争夺的空间或地带的观点尤其适合后结构主义的理解，这种理解把话语看作一个没有起源、没有终结的持续进行的意义游戏。我们现在即开始转向探讨后结构主义对认同的理解。

通过文本重新思考认同

整个 20 世纪，认为我们的认同既界定良好而且清楚可见的观点一直受到抨击。认为自我概念始终处于过程和建构中，这是类似互动论那些社会学取向的特点（见第二章）。与此类似，自我是碎片式的、而且受矛盾的困扰（通过神话和质询过程得到暂时统一）——这一认知也构成了结构主义文化取向的特色。不过，始终存在把自我建立在某些固定现实——比如经验或潜在社会结构——上的努力。然而，后结构主义始于这样一个假定，即所有那些根基和基础都是语言学上的建构，而且这些建构是通过符号系统组织起来的，借助这个过程，世界获得了坚固的表象。社会科学的历史被随意塞进了这样的主张，即认为被生产出的知识是权威可信的，而且可以被用作为一个

固定的参照点。这个批判性的再评价使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真理”的制造者，即设计程序和标准，以接受特定的对“可靠、权威的现实”的论述的学术界。

在第四章，我们已经介绍了罗兰·巴特的早期著作，以及他把索绪尔的观点（语言为一个关系系统）发展为语言有助于我们理解神话的出现这样一个观点。巴特主张，符号可以成为空洞的、能够负载寄生信息的能指。这里我们重点分析的是，对语言和文化的符号学研究取向是如何在他的著作里展开的。声称我们见证了“作者”之死的观点就跟说服我们重新评价我们信任作者的声音（对作者的意图的一种表达）的方式一样，是在挑战文艺评论的假设。其要点是突出读者和作者之间相互关系的复杂性，并把这种关系作为一个生产意义的场所。因此，他的著作体现了与结构主义假设的问题进行的斗争，这种斗争最后导致他把那些问题都拆解了。重要的是巴特通过指出所有描述性的词语或陈述所隐含的意义，对命名与内涵之间的区别加以问题化的方式。

较为有效的是从他的文艺评论研究中举例说明。在《S/Z》（1970）一书中，巴特分析了巴尔扎克的《萨拉辛》（*Sarrasine*，代表了法国19世纪早期的一个现实主义风格的例子），他认为现实的参照不过是对以往著作的重新表达。巴特精心拆解了《萨拉辛》的构成要素，并辨识了巴尔扎克是如何运用在特定的时间和场所中（经常通过使用粗糙的刻板模式）通常表达的关于道德、心理学、美学和历史方面的观点（*sentiments*）。为了做到这些，巴特在这个文本中辨识了起作用的五种代码。阐

释代码 (*hermeneutic code*) 在叙述中 (例如 “谁或者什么是萨拉辛?”) 引进、界定和解决困惑 (潜在的神秘)。**意素代码** (*proairetic code*) 牵涉到叙述的发展；它展示了故事得以运行的阶段或行动 (巴特辨识了《萨拉辛》的情节中 561 个阅读单位)。这些代码还控制了故事情节，推动读者向前。**象征代码** (*symbolic code*) 包括了叙述所保持的对立面，例如好/坏、生/死、男性/女性、内部/外部等等。**布局代码** (*semic code*) (或能指代码) 包括附着于词语或句子上的暗示意义，例如时态的使用 (暗示了女性气质的 Sarrasine) 或特定表达中所包含的可能道德假设。这些代码组织了地点、事件和人物的意义。**参照 (或文化) 代码** (*referential or cultural code*) 组织了超越文本的现实的参照。它包括暗示了作者和读者所持有的日常库存知识的惯用语和术语，因此，被使用的词汇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描述 (Barthes 1970; Eco 1984)。总之，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联被阅读活动自身制造出来，它并不预先存在，而且改变了理解文本的方式。巴特总结道，“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之死为代价” (Barthes 1977: 148)。

文本复杂性的分析利用了一个区分，该区分与社会科学知识的建构紧密关联。巴特辨别了著作和文本的区别。“著作”是 *lisible* (引人阅读地)，它们不能被读者改写的权威的论述。它们独特的历程是线性的，从开始向预先决定的终点做单向的移动。然而，“文本”是 *scriptible* (引人写作地)，因为它们的形式使读者在阅读时能够对它们进行改写和征用。此外，他认为一个文本和一个读者之间的关系是性质十分不同的东西。读

文 化

者的回应更加隐秘、充满乐趣 (*jouissance*)，因为它使我们的假设和价值成为问题，破坏了我们事物的秩序感。

快感的文本：使人满足、带来、充满精神愉快的文本；来自文化、不与之脱离的文本，它与令人舒适的阅读实践相连。至福的文本：强加了一种失落感的文本，令人不快（或许到了某种厌倦的程度）的文本，打乱了读者的历史、文化、心理上的假设，也扰乱了他的品味、价值、记忆的一致性，给他与语言的关系带来一个危机。

(Barthes 1976: 14)

我们对引人阅读 (*lisible*) 的文本的回应涉及快感 (*plaisir*)，但这是安慰人的类型，它是通过获得我们所期望的东西而产生的；它实现了我们的期望，也加强了我们的偏见。因为一再听到世界是其应该所是的那样而满足，这是一种愚钝的满足。它确保了我们的顺从，因为我们感到不能质疑或打断作者的声音。当然，正如巴特自己的例子所证明的，著作和文本之间的艰难区分更多的是一种理念类型（一种过于简化的夸张），而不是一种精确的描述（无疑它反对当前对词语、文本的包容一切的使用）。对《萨拉辛》的编码是以试图终止读者改写意义的可能性这一方式进行的，但这永远不可能彻底实现。读者可能发现违反本性的阅读令人不舒服，但他们仍然有机会动摇和颠覆编码信息。实际上，文艺评论的分类实践可以使得对既定

取向进行挑战的努力异常艰难。不过，在任何可阅读的方案中都始终存在可写作性（scriptibility），或者换种说法，所有引人入胜的著作都包含一个引人写作的文本等着被挖掘出来。到最后，对世界的引人入胜的论述仅仅在读者被社会化为顺从（acquiescence）——这种顺从到了这种程度，即这个作品告诉了他们所期望听到的，涉及的假设也被认为理所当然——时才起作用。

我们此处的任务是探讨这种取向怎样有助于我们改变近来社会科学实践的运作（创造一个社会情境，其中，社会科学家作为冷漠、超然的专家形象受到质疑）。社会科学的历史就是一系列的权威文本，其中每一个都展示了许多被“著作”概念辨识的特色。编码信息被更加根深蒂固地记住，而且，相比文学读者，社会科学方面的读者基本上被更加精心的、系统化的社会化过程教化，从而进入他们所尊敬的研究领域的程序。此外，社会科学中的学习模型经常认为，教育是一个维持学术传统的传播机制。作品可以以不同的方式阅读，读者是“有主动权的”（proactive）的行动者，他可以参与到意义生产中，建立他们自己的联系，构造他们自己的故事，改写叙述。这意味着我们不是把社会科学研究的产物看作“现实世界”的反映，而是应该改变我们的注意力，转到社会科学的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上来。我们将在第六章探讨“改写”社会科学著作意味着什么。

与此相似，当我们探讨其他后结构主义的介入时，我们也能够发现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科学知识的取向。在哲学、历史

文 化

和文学的连接界面进行研究的雅克·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声称,许多重要概念会耍诡计,假装问题并不存在(用一个类似存在、真理或客观性的名字来掩盖它们)。德里达吸取海德格尔式的现象学,指出那些概念是“将被抹去”(under erasure)的,以此暗示它们暧昧不明的状况并不充分;不过,在没有更好的替代的情况下,它们仍然是很有必要的。他特别主张“主体”这一概念应该以同样的方式置于将被抹去的位置。运用这些批判技术,德里达的话语分析动摇了西方知识建立其上的重要观念;也就是逻格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这个取向不是寻找某个潜在的基础或本质,而是主张,我们应该勘测概念的地形,以寻找提供了秩序感的隐喻和转喻关系。

为此目的,我们必须仔细检视文本,以建立它们围绕某些对立范畴的构造;例如真/假,理性/非理性,客观/主观,男性/女性以及同/异(Derrida 1973, 1976, 1978)。对立的一边被正面评价,而且被置于优越位置,也就是说处于支配位置。这个取向对于文化差异的研究——其中同/异的特色很鲜明——十分有用。通过仔细探测均等(同)与差别(异)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辨识文化差异围绕以下内容被建构的方式:局内人/局外人的观念,以及它们被其他理性/非理性、文明/原始、工具/表达等诸如此类的对立表述出来。比如,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 1978)认为,虽然存在形形色色的思考东方(the Orient)的方式(在历史、文学、漫画书和电视节目中),“西方人”始终处于一个优越的位置。这是欧洲文化中长期、复杂的象征表述和联想的产物,但它被用作为知识建构中分类实践

的组织机制。

科学家、学者、传教士、商人或士兵之所以去了东方或思考了东方，是因为他们想去就可以去，想思考就可以思考，几乎不会遇到来自东方的任何阻力。在东方的知识这一总标题下，在 18 世纪晚期开始形成的欧洲对东方的霸权这把大伞的荫庇下，一个复杂的东方被呈现出来：它在学院中被研究，在博物馆中供展览，被殖民当局重建，在有关人类和宇宙的人类学、生物学、语言学、种族、历史的论题中得到理论表述，被用作与发展、革命、文化个性、民族或宗教特征等有关的经济、社会理论的例证。此外，对东方事物富于想象的审察或多或少建立在高高在上的西方意识——这一意识的核心从未遭到过挑战，从这一核心中浮现出一个东方的世界——的基础上，首先依赖的是谁是东方或什么是东方的一般性观念，然后依赖的是具体的逻辑，这一逻辑不仅受制于经验的现实，而且受制于一系列抽象的欲望、压抑、内置和外化。

(Said 1978: 6)

还有大量能够说明萨义德的立场比德里达的关注更能够揭示同/异对立的例子，不过这段简要的引文已经雄辩地说明，对立关系在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中是怎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此外，统一的欧洲认同要素仅仅是通过对一系列想象的东方进行表述

文 化

才形成的，其中许多是通过男性对有关女性化表述的幻想而获得性特征。这些观点随着新大陆的发现以更加复杂的方式被重新表述（Hall 1992）。总之，认同是通过对同/异关系的操作而成为整体并达到目标的；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所是，是因为我们能够创造和再创造我们与他人的差异。有关文化差异的当代论述的出现是索绪尔通过差异关系提出的意义生产观念的产物。对索绪尔的语言取向的重新解释使我们以新的方式思考能指和所指的关系。

如索绪尔那样，德里达不仅认为意义是关系性的，而且他还假定任何固置符号意义的努力注定要失败，因为始终存在一个剩余意义，一个使符号的意义面临解组和重组的“补充”。按照德里达的说法，索绪尔使言语（直接、没有中介的交流形式）优越于写作（作为间接的再表述的描绘）。这种把写作描述为对语言的不完美的掩饰的做法可以更多地被看作是一个设计，它把索绪尔不希望在它的取向中容纳的语言的所有特点都交付给了写作。因此，其成果是双重的、矛盾的：索绪尔延续了“形而上学在场”在其中主导的传统；然而他还把语言作为去除所有词汇的优越性、并以此为基础（因为不存在肯定的术语，只有差异）的关系进行了概念化。

在解释德里达的观点时，部分困惑来自翻译的困难。差异有双重涵义；存在一些差异关系，通过它们，意义得以产生（*différence*，差异），同时差异感被延迟，因而没有任何意义是“已经完成的”，这些意义始终处于过程中（*différance*，延异）。意义始终是不稳定、临时的（Derrida 1978, 1981）。正如文化

认同的意义不再有可能被永久地固置一样，根据一个完整统一的文本来思考也不再有可能。每个文本都依赖它与其他文本的关系，依赖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的状况而存在。被创造的意义不断变化，而且不存在什么意义的源泉，只有一条能指之流，它能脱离既存的文本，并在对新文本的建构中被不同的联合（combination）再连接。

作为一种探讨社会生活的构造中的认同角色和表述的技术，话语分析尤其有用；不过，除此以外，它还突出了这些认同和表述不断变化的方式，强调它们始终是未完成的事物。提供了稳定性的是分类实践，通过这些实践，文本被编目、赋予价值。在学术界或其他权威性评论的场合中，著作传统的保管人精心使用和再生产的某些文本或类似著作类型可以取得正统经典的地位。这些构成了理解和评价新文本的参照点。文本间性还承认读者进行的意义生产，虽然我们也应该记住，所有作者首先都是读者。

实际上，巴特和德里达的著作促进了论辩基础的转变，我们不再讨论主导性的对受制于文本的意义的关注。这促成了这点认识的实现：观众的接受和编码信息一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但观众并不是存在于真空中；他们会把各种知识内化，在广泛的制度性实践中制造意义。为了理解意义生产是如何被组织和调控的，我们需要转向福柯的谱系学取向。然后我们探讨这种文化取向导向关注身体的文化意义的方式。作为一个“被争夺的空间”的身体探讨很大程度来自上述取向。然而，对于如下内容我们将给予特别的关注：“身体”作为文化

文 化

冲突和社会对抗的隐喻的观念；这个观念如何影响了社会研究建构和理解社会问题的方式。

身体与权力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著作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科学的概念领域。和前述的各种取向很像，福柯关注表述上的复杂性以及如下问题：知识如何在一个共享的文化情境中、在明确的历史环境中被生产出来。在他早期的结构主义著作中，他探讨了这个问题，即当概念有其自身历史、带有多种意义时，“真理”的建立是如何可能的？为了理解对真理范畴的各种用法，他主张我们应当考察话语——真理是它的一部分，考察控制了意义能否生产的表征系统。他论述道，话语包括行为规则的构型（configurations）、既定的文本以及制度化实践，每一种都被历史和社会确定的一套文化关系所定位。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他主要关注的是知识和权力关系之间的关联（Foucault 1970, 1972, 1980, 1982）。对权力/知识关联的阐述贯穿了他的著作。在有关癫狂、惩戒和性意识的著作中，他探讨了我们的思考正常与病态的方式，还考察了借以把人们划分归档的分类模式。此外，他揭示了真理的角色——这个真理声称它赋予了专家们所作的特定的文化判断以可靠性，还揭示了它们是如何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具体影响的。

人文与社会科学经常以一种不偏不倚和超然的方式，把人类置于科学的分类系统中，将其作为客体来研究。按照这种方

式，经过如此分类的人类被研究者以人类进步的名义客观化、去人性化（dehumanized）了。例如，在精神病理学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对特定“状况”的认同是如何经常利用普遍持有的有关正常和反常行为的文化假设的。给自闭症儿童贴上“怪僻的局外人”学术标签，或者把精神分裂症患者称为“诡异”，这些被更加标准的、带有贬义内涵的术语所综合，比如“智力迟钝”、“错乱”、“缺陷”、“反常”和“紊乱”等等。每个词语都带有病理化的期望。整个精神病理学领域和心理学的主体部分都致力于把人们归入各种类型的分类。人们没有认识到这些类型都是建构，因此，存在一种持续性的危险，即分类实践被看作是一面反映世界的构造方式的镜子。迄今为止，我们已经着重分析了对人们的标签或“呼唤”（hailing），而没有说明我们为何如此重视主体位置的原因。精神病理学的主体位置的获得本身能够提供一种庇护形式，因为它为那些进行分类的人或之前提到的儿童的父母们提供了令人放心的支持（有人十分仔细地对我分类）。许多残障人员（disabled people）被强加了各种标签，不管他们是不是喜欢。这是医学从业者应用标签——它们可以使一些人与其他人分隔开来——的部分后果。这些标签有两个作用：

- **能动作用。**通过资源的释放（如额外的家庭看护支持，或提供特殊的教育必需品），或产生需求必须被满足的认知。

- **限制作用。**通过限定残障人员的潜能，阻止他们充分发展个体的潜能；或许这是因为老板不相信一个残障人员能够应

文 化

付额外的责任。

大多数困难来自医学模型的角色，这个模型把残障界定为一个医学问题。这个取向假定“残障人员”可以通过传统的医学分类系统得到界定，而且可以据此在“正确的状态”中得到治疗。它还假定，一个特定的“状况”可以以同样的方式被“治疗”，而不用考虑所涉对象的特定需求。可见的残障对于“病人”的进步来说是个障碍，他们被期望通过诸如假肢（*prosthetic limbs*）的使用去“适合”“正常生活”，以隐藏他们的残障特性。这是有关适当的健康护理（比如特鲁比·金〔*Truby King*〕的育儿法，它包括“按钟点喂食”，日常的儿童照料受制于严格的管理）的一套更加广泛的实践和观念的一部分。在这类事情上，医生经常被看作权威知识的来源，他们的指令经常被毫无疑问地遵行。那些具有严重残障的人士得到最少的护理和照料，这点并不罕见，因为他们不能被转为正常。对残障人员而言，这点经常意味着特定的个体需要得不到解决，他们常常几乎没有、或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活选择。1960年代出现的这个社会模型的支持者认为，残障人员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因他们的损伤带来的，而是由“非残障人员”的观念、态度和实践导致的；是社会而不是残障人员有问题。

病理化与社会隔离倾向于一起运作，或者更糟的是，二者相互强化。对残障特性的医学界定促使残障人员不仅被轻视，而且被排除在许多日常生活实践之外。此外，这个医学模型促成了社会把残障人员建构为反常的、具有威胁的、甚至是危险

的（对他们自己，也对他人）。这个话语使偏见、歧视和忽视在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合法化了。残障权益运动有助于挑战医学和精神病学从业者的正常化和病理化的倾向，它成功地解组了蔑视残障人员的假设和概念，并以更加积极的方式对它们进行重组。晚近以来，有关残障性质的话语受到基因或外科调节——以防止或补救某些残障形式——的倡导者们颇为引人注目的介入，这些介入潜在地分化了残障权益运动。例如，耳蜗移植提供了“治愈”某些后天性耳聋（causes of deafness）的可能，但是这也对手语群体的未来造成巨大冲击。新的透视孕妇的医学技术也很有可能意味着父母们在生出一个残障婴儿的潜在风险方面将得到更多信息。其后果是，关于什么是可接受的、什么是不可接受的残障的问题被提出来了。

既然医学观念不再被认为是权威知识的惟一来源，针对新兴的生物伦理学话语也出现大量的抵制。这与福利话语中的转变相一致，在该话语中，公民身份（citizenship）越来越多地被认为在社会中扮演一个有效的角色。在英国，这导致一系列试图限定残障性质的界定的手段，以改造救济支持体系（表面上是“针对大多数穷苦人”）。我们界定残障性质的方式现在已经被有关残障人员参与劳动的身体能力的假设所重组。社会模型坚决主张残障人员对日常生活的参与，但这一主张被倡导社会效率的《新劳动法案》横加拦截。从所有这些话语的转变中，我是否可以提出一个令人困扰的未来场景：自从残障人员拒绝医学干预以来，他们失去经济援助有多久了？或者，当父母们决定收留而不是让婴儿流产时，他们面临照顾残障儿童的全部

代价有多久了？福柯的洞察——我们越是干涉（在人道主义的名义下），造成的危害就越多——在这里尤其有重大作用（参见 Foucault 1967, 1973）。残障性质的话语是作为表征系统运作的，它由不断演化的行为规则构成（通过对体现在既定文本中的既定知识集合的参照）——这些规则控制了哪些意义能够和不能够在制度化的实践中被生产出来。它们影响了人们的生活。重要的当然是它们制造的差异类型。

在选择残障性质作为例子时，我想绕开福柯从犯罪学引出的取向的常见论述。权力的运作与反抗持续不断地在各种制度化情境中上演，并不总是如监狱和精神病院（社会学者们讨论福柯时最喜欢谈的）那样黯淡凄凉。谱系学取向辨识了把人们调节、控制和保持在监禁之下的复杂的技术。它还分析了学术在提供参考术语和这类过程的合法化时——借此社会科学家把他们自己特定的文化假设和偏见强加于相关的分析客体——扮演的角色。在客体化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社会科学知识是怎样卷入建构研究对象的认同这一复杂的过程中的。知识创造了新的“主体”，而且在与他们的关系中辨识了何为正常、反常。知识的社会行动者（科学家、医生、教师、社会工作者、警察官员、社会保障官员——总之，任何以制度性的权力界定任何他人的人）卷入各种活动中，这些活动强化了弱者在社会秩序中被边缘化、被排斥的状态。

利用语言学的取向其弱点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了历史和各种机制，通过这些机制，作为表征系统的话语面临变化和革新。福柯认为，这些变化是通过制度性实践——其中话语调节

了意义生产——发生的。因此，在福柯的论述中，通过追踪诸如正常/病态的区分的运作，我们可以看到话语是如何被改变和再组织的。通过依据类似理性/非理性、正常/反常等区分对人作出评定，社会科学家还充当了道德行动者。他们依照文化价值对行为进行判断，反过来，这些价值只有在相关的话语中才有意义。“主体位置”是以两种不同的方式散漫地构成的。话语生产了主体，这些主体是在特定的社会和历史场合将知识形式人格化的富于想像的形象。这些形象具有人们在刻板类型中期望的属性，比如，“危险的同性恋者”或“理智健全的罪犯”。主体经常通过一系列紧密联系的形象——比如，“失足青年”、“问题家庭”、“情绪不安的儿童”，或者更早以前有一个例子，“抢劫犯”（black mugger），等等——被重新创造（Hall et al. 1978）。话语还通过对这些形象类型的参照调节意义生产，对读者/观者加以定位。这样，话语作为一个参照框架运作，通过该框架，特殊的既定知识类型才有意义，我们也成为其权力/知识的承载者（Hall 1997: 56）。

社会科学家以一种许可研究者鉴定人类行为的正常和反常以及理性和非理性的形式，创造并再创造了“新的主体位置”。这不仅仅是有关越轨的一个修订版的标签理论。话语为所有参与者提供了动机，去投入在他们之中得到表达的主体位置。我们经常相当情愿地使自己的身体从主动状态被转为驯顺状态。这一切是怎么实现的？同样的监禁实践（结合了对惩罚的谨慎适当的使用），甚至是空间的组织——福柯在犯罪司法体系中所识别的、可以在被社会科学家关注的制度性实践中看到东西

文 化

(在学校、财产委员会、急诊处、购物商场或足球场看台)。这些“规训技术”或“全景敞视”实践是一切当代社会制度性的生活中的一部分。

社会的监狱结构确保对身体的实际捕获与持续监视；由于本身性质的缘故，惩罚机构完全能够适应新的权力经济，适应形成满足这种经济所需要的知识形态的手段。它的全景敞视运作使它能够起到这双重作用。由于它具备固定、划分与记录的方法，它一直是使人的行为客体化的无穷尽的检查活动得以发展的最简单、最必要的条件之一……我的意思不是人文科学源自于监狱……那是因为它们是通过一种特殊而新颖的权力形式而传送的……一种使人的群体变得驯顺而有用的方法。这种政策要求把确定的知识关系包容进权力关系，要求有一种使征服与客体化重合的技术；它本身就带有新的造成个人化的技术。这种权力—知识造成了人文科学的历史可能性，而监狱网络则是这种权力—知识的盔甲之一。可认识的人（灵魂、个性、意识、行为，无论怎么称呼它）是这种分析介入、这种支配—观察的对象—效果。

(Foucault 1977: 304 - 5)

如果我们考虑福利制度，我们看到这种取向是怎样被应用的。在《治理家庭》(*The Policing of Families* 1979)中，雅克·丹泽

洛 (Jacques Donzelot) 认为社会服务和福利部门提出有必要不断地监督家庭中的个人关系的主张是在为他们自己的存在辩护。从这个视角来看，战后大多数有关福利国家、贫穷与社会工作、以及关于“家庭匮乏”的特定知识的社会科学都牵连到对个人生活的治理中。然而，历史叙述倾向于把福利国家颂扬为文明进程的终极产物，它把对日常生活的侵入和干涉转变为一种积极的美德。虽然这些结论令人困扰，但它们仍然被认为是对“社会科学的阴暗面的最佳论述” (Rorty 1994: 58)，因为它们阐明了科学知识是怎样确保被排斥者同时也是相对的弱者。然而，话语仅仅是作为一个支配系统、通过行为规则、文本和制度性实践——在那里意义被生产出来，权力的运作产生了它自身的抵抗和颠覆形式——才起作用的。

话语形塑了社会政策和组织，通过这些政策和组织，它们本身也被制度化并得到实现。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注意帮助了制度性实践的适应的、非正式的安排和隐含的假设。它们还针对那些被标记为越轨或反常的内容制造了“规范”。如果我们考察乔恩·克拉克 (Jon Clarke) 和 阿 兰·科 克 伦 (Allan Cochrane) 关于贫困问题中话语的制度化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国家制度和结构是怎样进行监控和干涉，以促使个人投入特殊类型的主体位置 (例如“该受穷的”)。

• 穷人不得不证明他们的贫困。对贫困有所作为的系统……一直含有各种类型的测试，穷人必须通过测试来证实他们的需求……还存在一些道德测试——主要针对女人——检查

文 化

她们是否跟人同居……

- **穷人必须以贫困的样子出现。**他们是求告者——一个低人一等的、求援于人的社会身份，向社会要某些东西……〔贫困〕话语的主体

- **穷人要接受对他们所做**的事。身处贫穷就是身处于一个别人有权处置你的位置。社会的制度安排有时已经强调隔离穷人——例如，把他们投入济贫院——以使他们远离其余的“我们”。有时他们关注对穷人的规范化（normalize）——教他们预算管理，优秀的家务管理，或子女养育——其目标是使“他们”更像“我们”。其他时候重点放在保持对穷人的监禁方面——监控他们的行为，以确保他们行为“适当”。

（Clarke and Cochrane 1998: 35 – 6）

这是“为正常苦恼”的一部分，它使社会科学研究在这些方面感到困扰：贫困、犯罪、失业、精神病以及其他“社会问题”——一旦我们着手讨论“社会问题”，我们已经走在由正常与病态对立构成的路上了（Clarke 1998）。这个在特定的社会和历史领域内、位于明确的制度场所中的话语分析在为具体研究提供基础方面，比巴特和德里达走得更远。福柯有关身体的著作也对医学社会学（参见 Turner 1995）以及性意识和自我造成了冲击（Weeks 1985, 1989; McNay 1992, 1994）。特纳（1995）认为，身体受制于理性化和标准化的过程最初是通过临床医学开始的，而且经历了很长的时间；过去的大约一百年里，它被一套管理人口、在精神、身体和道德健康（或败坏）

之间建立联系的制度扩大了。优生学和“纯净政治”在新兴的家庭计划中的作用表明女性的身体一直是一个战场。更重要的是，已经出现的医学—政治话语是建基于某些有关正常的假设之上。为正常所苦恼的麻烦在于，它只有通过把病态辨识为特定的行为或特征这种惟一的方式才能被界定。对管理结果的关注尤其是有关性认同的话语出现转变的证据，对此，杰弗里·威克斯（Jeffrey Weeks）在他有关（再）创造的“同性恋”形象的历史叙述中进行了识别。

整个西方的历史中，对通奸的控制是道德秩序力量的一个主要关注点，不管是中世纪时期教会对通奸和鸡奸的正统控制，还是当代国家对卖淫和同性恋的整顿。所有性行为的“变异”当中，同性恋受到最强烈的社会压迫，也导致了最活跃（如果用“普遍”很具有误导性的话）的历史论述……它还激起了不可避免的敌视结果，产生了对恶意的类别化最坚固的抵抗形式，从而具备了一个漫长的文化和亚文化的历史……也就是说，对同性恋行为的态度具有文化上的特殊性，而且因文化和历史时期的不同而呈现巨大的变化……身体动作可能是相似的，但它们的社會含义经常具有深刻的不同……然而，19世纪的后半期，一种新的同性恋的概念化过程清晰浮现了，尽管这些新的定义和实践的要素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反常的性交——如福柯所指称的——是短暂的失常。另一

文 化

方面，“同性恋”属于一个种类，正是这种新的对同性恋者的关注——不仅在法律实践中，也在心理学和医学的类别化中——标出了至关重要的变化，这既是因为它提供了社会观察和思考的新主体，也是因为它开启了新的自我表述模式的可能性。

(Weeks 1989: 96 – 102)

(同性恋) 性意识的历史因而是一个想象的形象的历史，它能够以积极的信息被重新利用和重新表述。在大众文化中，男同性恋认同——它在更高或更低程度上被规范化——的出现指向的是过多研究病理化的不足。福柯的大部分著作中存在一个倾向，即假定身体是被动的或是管理实践的结果，但这个倾向忽视了抵抗的作用。特纳（1995）认为，现象学通过把我们的注意力导向病人以及想当然的日常生活知识的视角，提供了弥补这个缺陷的方法。

当我们考察福柯的取向是怎样被应用时，可以看到一些最有效的应用研究综合了来自德里达、吉尔罗伊（Gilroy）和霍尔这些学者的观点。在安娜·玛丽·史密斯（Anna Marie Smith 1994）的研究中，认同的建构包含了一个边界的创建，这个边界只有当我们考虑该认同所涉及的局内人与局外人之间的关系时才有意义。吉尔罗伊研究了保守派政治中把“优秀黑人企业家”看作“隔壁的公民”这一想象形象的发明，这个研究被史密斯重新调配，她探究了围绕艾滋病和第 28 条法令（一项立法手段，是地方政府为回应 1980 年代的道德恐慌而禁止“有

意宣扬同性恋意识”)产生的道德恐慌中,对“好同性恋者/危险的同性恋者”的区分的出现。她重建了男同性恋认同通过对“入侵者”、“引诱者”等隐喻的使用而被重新表述的复杂的方式。这样,史密斯(1994)突显了一些方式,通过这些方式,种族主义和异性恋话语的意义密切关联到英国社会的文化假设和权力关系上。种族主义和同性恋恐惧症在英国文化政治学中的表述是更加广泛的政治动员形式——这些形式卷入了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撒切尔主义中——的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这个特定形式中,在这个特定节点上,围绕同性恋的焦虑表达为何如此令人信服?为何同性恋的宣扬造成对社会秩序的腐蚀这样一个认识似乎“概括”了其他根本不同的关注,即对疾病、道德、儿童和家庭的关注……在1980年代后期,有关同性恋的话语完全与有关艾滋病的话语纠缠在一起……反过来,对艾滋病起源的搜寻不过是试图为异性恋对风险的拒绝奠定基础;声称非洲人和同性恋是艾滋病的起源,这更多的是受种族主义和反同性恋狂热的影响,而不是受规范的医学研究的影响。对同性恋被宣扬这一神话的构建具有强烈影响,这部分是因为之前已存在一个观点,即同性恋=对社会的其他组成部分的威胁……艾滋病“歇斯底里症”造成大量针对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的敌意,从日常歧视到“对同性恋者的无故殴打”。对这种充满敌意的表达,第28条法令赋予其一

文 化

种官方批准的、并且明显漠然置之的形式……视疾病来源于外国人的表述也调用了有关移民的话语……[它]是一种在患病的男同性恋入侵者的形象当中有关颠覆威胁的表述，而且，它通过创造舆论的一致来对颠覆焦虑提供补偿。人们认为这点是理所当然的，即性的常态空间是作为最初的、自然的空間而存在的，而且，尽管这个空间被同性恋入侵者所威胁，目前它仍然没有受污染。与此同时，[第 28 条的]支持者的话语则是矛盾的，因为它包含一个已经受到同性恋他者的彻底污染的性“规范”空间。

(A. M. Smith 1994: 196 – 200)

史密斯（1994）汲取了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其《艾滋病及其隐喻》（*AIDS and its Metaphors* 1989）一书中进行的有关疾病意义的分析。桑塔格探讨了对“他者”（特别是其他的、非欧洲的文化）的恐惧与不时和疾病相关的恐惧之间的联系。这个研究追溯了有关同/异、健康/疾病、异性恋/同性恋、理性/非理性、安全/危险这些对立的表述。史密斯把对社会对抗（在这个例子中是与伦理和性的差异相关）的关注与一个明确处境中对意义的表达和解组的认知结合了起来。话语包含了争取支配的持续斗争以及抵抗的产生。因此，认同是通过斗争实现的，但它们从未完成过，因为不存在意义的终结（closure）。认同的建构包含了一个边界的创立，而这个边界只有在我们考虑该认同涉及的局内人与局外人之间的关系时才有意义。后结

构主义取向重建了话语的对立，以理解文化和认同变化的方式。我们可以理解认同，但不是通过列出它们的特征，而是通过表述中的各种话语对立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加以界定的。

作为一个被争夺的空间，身体又是怎样的？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探讨了它是如何被施加作用的，抵抗又是如何产生的。身体与自我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有待澄清的棘手问题。这里我重点分析一个例子，以说明身体是怎样可以成为一个受争夺的文化空间、权力关系以及包容在再生产技术中的表述。戴恩·法夸尔（Dion Farquhar 1996）探讨了女权主义话语的运作，这些话语是位于与“母性”和女性身体相关的辅助再生产技术中的实践。她把女权主义话语区分为两种类型：自由主义的和基础主义的（fundamentalist），并对这两种假设都提出了挑战。自由主义话语假设科学干预具有解放作用，但该假设被批评为对男性中心的医学恢复女性身体中自然运作的过程的能力过于乐观。在基础主义话语中，技术干预却被贬低，生育治疗被形容为把女性身体简化至指向婴儿工厂系统的装配线的地步。按照法夸尔（1996）的说法，这两种话语都假定了自然性质、女性气质和母性之间的联系是无可争议的。通过借鉴堂娜·哈娜维（Donna Haraway 1991）的“半机械人”（the cyborg）概念，——一个机器和有机体的散漫的混合物，也是一个更具启发性、承认人的经验和欲望的复杂性的隐喻——法夸尔（1996）试图探究多种新的亲本的（parental）可能性。身体被作为一个话语空间被暴露，以控制有机物和技术之间的相互联系所具有的意义。此外，它还把有机/技术视为一个有漏洞的区分，这个区

文 化

分更多的告诉我们在伦理、社会—法律和医学话语的要素解组和重组中这个机制的作用，而不是告诉我们有关身体自身的东西。这样，半机械人的隐喻瓦解了这些带有漏洞的区分的运作。

从这些后结构主义取向中，我们可以获得什么教益？考虑社会研究者是怎样进入与他们的读者的对话（既在学术内，也在学术外），这是很重要的一步。这意味着，他们应该把读者看作洞悉和批判的回应者，而不是看作吸收权威专家散布的叙述的海绵。我们还被引导质疑原创性和原创作者的观念，并且思考类似真理、进步和理性这些作为话语建构的重要的科学概念。后结构主义话语分析削弱了这个观念，即语言是负载了作者意图的传播机制，同时读者相信权威的意见。实际上，如果作者不再是有关真理和真实性的权威叙述者，这些读者可以被认为通过建构他们自己的叙述而参与到了意义生产中。

诸如对文化关系和过程进行解释的理论其问题在于，分析焦点被如此勉强地引向广泛包罗的表述体系以及有关认同管理的一般结论，以至于这个意义生产所具有的自发的、创新的特征给丧失了。福柯的著作中存在太多对控制的固化，后结构主义的理论阐述中也对高等文化领域关注得太多，以至于它们都不能提供一个恰当的、理解大众文化的发展的框架。然而，对于重新思考意义生产、话语的作用以及认同的建构来说，这些观念贡献了有效的方式。此外，把身体视为受争夺的空间这一看法扩展了大众文化研究的疆域，其结果是，大众文化研究将把日渐增加的对时尚、身体艺术以及身体改造（modification）

的兴趣包容进来。

论事物的重要性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全力分析过文化文本，将其作为文化研究的例证，以便得出在文化研究提出的问题与一般的社会科学实践之间的比较。在这里，我们通过考察文化制品被理解的方式进而扩大范围，但是这主要是作为一种提出新问题的方式，这个问题即社会研究可能是什么。在设计和装饰艺术中，对物质材料的研究有很长的历史。仅在1970年代之后才出现了对“物质文化”的研究，尽管它仍然是来自社会学系、文化研究、人类学、时尚和设计研究的最强调跨学科性的研究领域之一。可以进入各种考察范围的事物的多样性使得它成为难以界定的领域。它包括对如下内容的研究：购物、家具、首饰和珠宝、花园、建筑设计、特百惠^①家用塑料制品、电台音响范围、电子产品（如索尼随身听）、定做的厨房、专辑封套、园艺、玩具和衣服。

物质文化研究的提倡者们在确保这些研究客体被严肃对待时无疑经历了一些艰难，这些艰难是由既定学科中的社会研究者们带来的，他们忽视这项工作，或甚至更糟，把它贬低为微不足道的、不科学的工作。不过，对许多具有文化重要性的平凡事物的辨识，以及对日常生活中使用文化制品的强调，这些

^① Tupperware，一种商标名称。——译者注

文 化

都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一定环境中的意义生产的框架。早期对物质客体进行理论化的尝试往往落入陷阱，想去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一般理论，依照它，在一个考察领域中识别出的独特性被认为与其他领域中的相一致。这样，阶级定位（或者性别）可以被识别为在品味的独特性中运作，而品味是经多种文化制品交叉形成的，如食物和衣服。因此，在这个取向中，惯习（habitus）中的性情倾向（disposition）被认为建立在阶级或性别关系的基础上。既然惯习充当了感知、欣赏和行动的母体（matrix），质性研究方法似乎更加合适。对物质文化的民族志研究已经阐明，获得、占有和评价文化制品的动机是极为多样的。如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 1998）所说，在人类学中，哪些事物较为重要的问题对研究者而言比被研究的人更加优先。米勒不想落入新实证主义的窠臼——他们依赖被研究的人去识别什么是应该重视的；他认为，社会科学家的任务应该是建立被生产的知识与那些被研究者的现实经验之间的联系。这个试图在超然和介入之间寻找平衡点的努力保证了一点，即日常生活的复杂性有机会进入文化研究和社会科学公开的记录中（Miller 1998）。

如果我们考虑一个物质文化的例证，比如艾莉森·J. 克拉克（Alison J. Clarke 1997）对郊区偶像特百惠制品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取向能够怎样提供有效的知识。作为一个战后文化制品，特百惠制品成为私人消费的一个象征。流线型、理性设计的制品能够进入既定的“礼节仪式和社会化过程，伴随食物和家庭娱乐”（Clarke 1997: 135）。克拉克吸收了米勒的观

第五章 被争夺的文化空间：认同，话语和身体

点，辨识了这样一点：作为一个针对社会集会、结合了聚会游戏销售的机制，制品与文化关系之间的联系怎样在确保它出现在许多郊区家庭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此外，特百惠制品可以确立其在场，占据一个所谓“正常”家庭的生活中的角色而不会打乱女人的默许。按照克拉克的说法：

特百惠的创立不是作为一个偶然的家用器具，而是作为稳固和扩大日常礼仪的价值的一个“方法”。这个物质性与精神性的结合正是历史学家们称之为“清教美学”的关键（*crux*）；这是某些人主张的、对美国历史和大众消费来说至关重要的概念。

（Clarke 1997: 137）

特百惠的市场战略不能用理性的经济术语解释，因为它造就了一个把照顾、教养和归属（保护自尊并阻遏对郊区女人的隔离）与牢靠的事业感相混合的复杂网络。为了理解这些生产形式和消费之间的相互联系，我们需要通过这些文化制品在日常生活中的用处、而不是它们审美上的现代主义设计来考虑它们的意义。把商品征用为欲望的目标，这个探讨方法很像米歇尔·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提出的取向。布迪厄分析的是铭刻在文本中的意义，而对德塞尔托来说，意义是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德塞尔托——被认为既是文化历史学者，也是文化地理学者——认为商业实践已经进入了日常生活实践，我们不应该总是着眼于最醒目的地方（广告和富丽的产品包装）。

文 化

布迪厄沉迷于描绘大众美学（带着它对粗俗行为和身体欲望的野蛮冲动的要求）和纯粹美学（激发无偏见的超然立场，以此对美进行评判欣赏）的前景，而德塞尔托提出的是更加灵活的框架。他认为，如果意义是在使用中产生的，那么次级（sub-altern）群体可以通过对这些目标的征用来形成他们自己的环境。特百惠最初是配套餐具的搭配物，现在，通过非正式经济对它的征用，它的意义已经改变了。他把这形容为积极解读的过程，凭借该过程读者只取走那些令人愉快的事物。此外，文化等级中的文本和文化制品的配置可以通过文本的偷运（textual poaching）被改变和展示。

从戏剧到精致艺术^①，支配性的文化形式受制于读者和作者之间持续不断的斗争过程。德塞尔托（1984）突出了书写体制（有时也称为写作体制），通过该体制，类似评论家这些解释的代理人试图对诸多意见施加限制，对意义进行控制。由于我们的社会化过程，这个运作颇有成效，我们被训练成不深入文本就去寻找作者的意见。正是在那些受到良好训练的观众那里，我们可以看出问题究竟是怎样的。对这个取向加以应用的一个例子是詹金斯（Jenkins 1992）对科幻类型中的科幻杂志、以及由此扩散的漫画、电影和电视节目的研究，他识别了大众文化文本的制作者们是怎样试图禁止消费者的征用——它会危害品牌的形象（比如《星球大战》的成人级版本，它会把产品降格为低俗的色情文化类别）。无疑，这个取向把我们的注意

^① “fine art”，特指音乐、绘画、雕塑。——译者注

力引向了一些复杂方式，以这些方式，观众获得、使用和抛弃文本和文化制品，以及同样复杂的收藏性质的非正式经济，这些收藏是围绕有关电影和电视节目的玩具和宣传材料而生发的。把读者塑造为“偷越原野的游牧部落，他们掠夺了埃及的财富并自得其乐”（de Certeau 1984：174）；这个观点低估了观众的创造力。

这样一个对文化运用的叙述忽视了两件事情。其一，作为固定库存的文化等级其存在尚未受到挑战，因为读者的偷运（proaching）只是对文化的重新洗牌，改变的是文化文本的等级次序。其次，制作者和作者被置于特权位置，而观众对文本和文化制品的多种使用则被认为是不协调的，在一些情况中是短暂易逝的。读者是在重写文本这个观点似乎在德塞尔托的论述中付之阙如。对媒体迷恋者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针对大众文化消费的更为全面的取向。

媒体迷恋者给出了各种信号，表明他们将成为一种永久性的文化；这个文化已经存在并演化了25年以上，已经使那个群体对物质制品产生了持久的兴趣。不像德塞尔托所描述的读者那样，迷恋者们开始保存他们从大众文化中偷运材料、进而生产出来的东西，这些材料有时也会成为有限的经济收入的来源……很多人赚够了他们在迷恋活动上的花费。这种物质性使迷恋者文化（fan culture）成为一个研究大众征用和文本偷运的策略的富有成效的场所。然而，

文 化

必须承认迷恋者生产的物质产品不仅仅是由其他阅读实践所产生的短暂意义的切实痕迹。以这种解读它们，提供的是对迷恋者文化生产的一个山穷水尽的论述。迷恋者文本——不管它们是迷恋者著作、艺术、歌曲或录像——通过社会规范、审美传统、解释规则、技术资源以及更大的迷恋者社群的技术能力所形塑。

(Jenkins 1992: 49)

德塞尔托的重点清楚地放在集中的媒体制度中强势文化生产者的策略上，而消费者所容纳的是在微弱的抵抗活动中所具有的特别的越界手法 (de Certeau 1984: 36 - 7; Morley and Silverstone 1990; Morley 1995)。因此，即便这个取向强调文化文本和制品的使用作为意义来源的重要性，那里仍然存在一种视文化生产比消费更优越的倾向。

再造作为文化制品的客体：社会科学的新任务

后结构主义对文本间性环境中意义生产的关注与霍尔 (1973) 对意义的编码和解码问题的探讨有类似之处 (尽管它们出现的理由相当不同，理论的问题域也截然相异)。新马克思主义与文化分析的这些类似之处，与结构主义中的共同遗产一道，把它们带入同一个轨道。如果马克思主义还有一样东西遗留的话，那就是主要在斗争和竞争方面、有关意义生产的术

语。连接的观点打破了干预逻辑，该逻辑假定文化是某些潜在经济或阶级基础的宣言。后马克思主义的兴起需要一个新的基础，以理解知识建构、权力关系和主体位置建构之间的联系。福柯的取向提供了这样一个基础，并有助于强调权力关系在文化中的作用。对霍尔来说，这个取向带有自身的危险，因为它有可能吸收太多的东西进入“话语”；如果话语领域的界定过于理想化（idealistic），它会忽视社会关系的物质性（Hall 1997）。因此，关键是怎样理解话语。不过，我们提出这些事情的方式对我们思考它们的方式有重要的影响。类比和隐喻在权力知识的运作以及抵抗的产生中有明确无疑的重要性。

这样，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思考方式，这种思考方式把社会科学当作易于沟通的实践，如果你喜欢，也可以认为社会科学通过学科方案的制度性实践从而具备了物质性。我把我们是否应当被引向学科的问题放到第六章讨论。不过，如果我们要成为反思性的实践者，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遵从和修改的行为规则，我们使用的语言，我们身处的文化关系，我们隔离和容纳他者的方式，所有这些都是社会研究的话语环境的一部分。此外，提到针对各种观众的易于交流的发现以及不断发展的观点时，我们可以从以上文化理论中受益良多。文化传播或书写体制取向涉及为消极的、充分社会化和顺从的观众生产引人入胜的著作这样一个观念。德塞尔托（1984）提供了对如下问题的思考，即写作体制如何能够影响到一个特定文化场合中物质和精神的资源。如果我们要避免落入对关键力量的权宜性回应，我们就需要认识到，一切试图终结选择性阅读的努力只能取得

部分成效。这开辟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即我们可以用新的方式去（当然是不那么恭敬的方式）阅读经典知识作品、进而改写它。它还提供了一个前景，即我们可以思考一种更具包容性、可通过阅读行为进行改写的写作方式；如巴特所主张的，朝向一个引入写作的取向。

这个方案具有两方面考虑。首先，重读社会科学的权威著作，以辨识在引入阅读的文本中运作的五种代码：引入、界定和解决叙述中的社会科学问题的解释代码；有关叙述发展的意素代码；由类似真/假、客观性/主观性的对立以及来自伦理学和美学的相关代码——它们潜入社会科学，躲在那些研究事实证据的人背后——组成的象征代码；其意义附在词语或以特定术语作出的陈述和道德假设上的布局代码；建构了文本之外的特定表述现实的参照代码。这些使得我们能够认识到文本的复杂性。其次，我们还应该承认人们运用社会科学知识的复杂环境和多种方式。像文化研究那样，讨论社会研究的变化多样的读者的著作才刚刚开始。我们能够以不同的方式来界定交流的环境，但我们不能避开话语在建构社会科学论述中的作用。问题是社会科学家如何才能够承认这点是他们的研究实践的一部分，而且培养出一种针对叙述性解释和故事讲述、以及观众接受的重要性的更敏锐的感受性。此外，通过以隐喻的方式将社会科学知识视为文化制品，我们被迫强调更为广泛的读者——而不是学术和政策交流——接受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方式。

第六章 文化与后 学科的社会科学的前景

把文化意义限制在一个单一视点或等级次序的外化上，这种做法忽视了社会科学家所关心的大量东西。比如，有时大众文化在社会关系中的作用似乎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此外，认为文化不过是以从发送者到接受者的单线形式（如一支射向靶子的箭）而传播，这个观点忽视了包括参与者之间对话的交流方式，也忽视了对文化产品的各式各样的使用。然而，人类社会的文化维度是当代社会研究最重要的领域。最后这一章将讨论两个贯穿始终的主题：

- 质疑“经典性质”及其在社会科学中的影响
- 澄清社会科学实践是怎样在文化的重要性得到承认的情况下变化的。

批评家和讽刺家已经宣称，文化分析的重要性不如对国家、经济 and 类似教育或犯罪司法体系这些制度的研究；正如之前的章

文 化

节阐明过的，这种说法所忽略的正是社会研究中，所有这些传统的分析目标里都很重要的文化维度。

近来的社会探究中，对文化的关注与其说是新现象，不如说是强调重点的转变；它还意味着社会科学家不得不重新评价他们自己的位置。例如，对统治的运作以及民主国家的处境（place）的理解有赖于对这一点的认识：“市民文化”所起的部分作用，以及文化政治所采取的复杂形式。在福利研究以及教育社会学中，我们可以看到对贫困文化和文化剥夺问题的始终如一的关注。然而，文化的界定方式却发生了变化。这些取向倾向于认为文化关系不仅与其他领域分离，而且屈从于这些领域。在福利和教育研究中，被发现的各种问题据称是文化传播或者它的失败的结果。认为人们会运用他们对社会世界的理解去创造他们自己的文化，这个观点经常认为是一个威胁。这些文化反抗被归类为离经叛道的亚文化。甚至如今对经济的社会研究也充斥了对“企业文化”、“社团文化”以及“生产文化”的参照。正如克拉克（1997）对特百惠现象的研究所表明的，问题不仅仅是通过文化符号和信息的运用、商品被售出。如今社会科学家认识到，文化维度的研究对理解现实的经济和国家来说至关重要。而在政治经济的参照框架居于统治地位时，文化研究经常从属于经济和政治解释，甚至在文化研究内部也是如此。然而，我们必须承认这种滞后反应（double take），并且意识到，当社会科学家声称自己在研究国家、精神或经济的时候，他们经常是在研究文化。在很多情况下，文化研究是以其他名义进行的。社会科学家在理解他们选定的研究领域、界定

概念、形成观点等过程中，利用了现存的“表述的保留曲目”（在学术群体以及他们身处的更广泛的文化中）。同样，当他们致力于研究实践、为各自的读者提出发现时，情况也是如此。总之，社会科学家是而且始终是文化行动者。社会科学家运用他们身处的文化提供的技巧，他们所选择的分析目标也是通过文化解释而得到理解的。

我们已经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学科性，在那里，社会研究已经假定，“分析客体”是具有明确结构的具体事物，或者说，它们是由可以通过认识过程理解的一套构成因素组成的。学科叙述的似真性（plausibility）是通过对正常与病态之间区分的操作化取得的。其结果，通过把文化价值转为权威知识，社会科学实践与权力关系联系到一起。尽管有关社会研究的特征不无争议，各个时间段、各个知识领域的学术实践中的连续性仍然不断被强调。而这个连续性在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遭到动摇。在当代社会科学中，分析客体越来越被认为是复杂、不确定的和备受争议的空间。其中，对差异和他者的讨论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为理解这个过程，本章将探讨包容在当代社会科学实践中的分类实践和判断的变化。

学科性质与复杂性

分析客体不再如同它们过去那样。社会科学史这样告诉我们，它们一度是可靠的、固定的、一个界定问题而且不受质疑。现在，它们靠不住了、成为问题、将被抹去而且没有基

础。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结构中发生了根本变化。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的构成一直是复杂、散漫的。我们只是很成功地让自己确信，世界是简单的、原子式的，是经验规律的集合，而且受制于现象学者和唯名论者（他们认为我们所见即所得，我们对事物的命名准确反映了它们之所是）的突发奇想（whims）。正如我以下所主张的，这是对社会（见表 2）进行的封闭系统的分析，它被用作对社会科学学科的支持。

表 2:社会科学中的封闭和开放系统

	封闭系统	开放系统
1. 简单性与复杂性	在增加识别的可能性、预测清楚的关系时,有限数量的可测变量	复杂性状态被认为是某个目标分析、以及二者关系的环境
2. 外部边界	排斥语句确保了令人迷惑的可能影响的集合被屏蔽(比如“别无其他情形”[ceteris paribus]的语句,使所有其他事物成为能导致 y 的不变的 x)	没有假定外部边界的存在,因此每个目标可以是多重因果关系的一部分,一个人不能以任何程度的确定性去预测一个结果

-
3. 内在属 所有目标分析在表面价值 承认一切目标均有内在
性 上进行,因此一个目标的内 属性和结构,这些属性和
在属性不予考虑复杂性状 结构影响了它们在不同
态被认为是某个目标分析、 环境中的表现
以及二者关系的环境
-

来源:Smith 2000: 45

通过考察对处于社会关系和制度里的人的研究中封闭系统分析的含义,我们有可能对这一点建立认识,即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等学科是如何能够巩固它们的职业学术地位的。通过一系列类比和隐喻对成功的自然科学进行效仿,这为自己所生产的知识树立信任提供了一条快速途径。科学在西方文化里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引发共鸣 (evocative) 的词语或观念。它向人、观念以及相关的制度传达了合法性和权威性。声称具有权威性就意味着,一个陈述是“真实的”,是一样真实事物而非赝品。要成为有效的和学科式的,研究方案过去(或现在)不得不应对多方面的读者(在学术界,在政策团体以及公共领域中)。学科性质的方案必须对这些读者确立某种程度的似真性,以便使自己被看作对社会世界的权威论述,或至少是其中离散的一部分。在涂尔干的架构中,每个学科都试图建构自己独特的目标分析,同时分别确立各自的要求,即在自己的目标分析中能拥有权威。

在所有试图建立客观知识的学科中，封闭（closure）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认为可以实现封闭——通过该过程，无关的变量被排除在外，以便为识别明确的关系（经验变量之间的关联）而争取一个“不受干涉”的地带——的假设仍然作为一个技术广泛流行。它怎样被应用到不同的社会科学学科中，这取决于目标分析在每个学科中是怎样被建构的。如果我们考虑政治科学的例子，对“国家”和政治制度的详细说明也关系到对行为主义假设的采纳——该假设是有关可观察的具体决定和权力运作的。达尔（Dahl）把这个方法界定为“对人们〔men，原文如此〕的政治关系进行的检视……目标是阐明和检验有关行为统一性的假设”（Dahl 1961：764）。把权力概念处理为一个经验规律，就一个行动者的行为促成另一个的行为、以使后者做相反情况下不会去做的事情而言，这是可观察、可测度和可解释的（Dahl 1957）。这个取向被限制在对一群个体的实际决策行为的研究上——这些个体所处的场合中存在可见的利益冲突。这些利益被界定为通过政治参与而直接展示出的公开的政策偏好。这就意味着，我们应该把政治行动者的所言、所行看作是他们的利益的直接表达。通过重点分析可观察行为的特定结果，多元主义取向得以收集“可靠的证据”（它接受进一步的检验，并得出了相同或相似的结果）。这通常采取定量数据的形式，以便于为变量之间的关联提供方便（统计学的比较）。多元主义者运用统计控制来模拟一个包括有限数目的简单变量的封闭系统（参见 Blalock 1964）。实际上，为了确立一个似真的科学取向，学科式方案不得不建构一个适合宣传的

“政治主体”，但忽视了现实政治决策的复杂性，而且正如达尔（1961）在他后期著作中开始承认的，同时无视理解政治关系和进程的更广泛的文化环境的需要（Smith 2000: ch. 3）。

这个例子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这些关系：我们知道什么与我们怎样知道的关系；我们有关社会世界的多种本体论假设和预想与认识社会的认识论过程之间的关系。在寻找似真性时，社会科学家已经假定他们对社会过程的简化是有关世界运作方式的模拟的（反映论的）论述。重要的是确立复杂性的含义。在有关社会科学实践的研究工作中（Smith 1998b: 321），一些复杂性类型得到识别。

- **实践的复杂性。**其中包括这个认识：简单关系是肤浅的人为创造，因为当我们建构社会存在时，其他因素总会起部分作用（即经验世界始终比我们预料的要复杂得多）。

- **想象的复杂性。**不是把思想看作对我们所研究的事物的反映，重要的是认识到想象性思考组织我们的知觉、感觉和印象的方式（即我们通过想象性思考简化经验的复杂性）。

- **情境的（situated）复杂性。**一切知识形式，包括科学知识在内，都是建立在历史和社会场合中——知识在其中生产出来——的各种实践的复杂产物。同样，它们负载了文化价值并以这些价值为基础，尽管它们在其他场合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被接受。

- **表述的复杂性。**意义生产本身是一个复杂过程，它由语言的、象征的和文化的要素构成，所有这些要素都可以对社会

文 化

科学家建构证据、向他人传达主张的方式产生显著的影响。

• **结构的或深度的复杂性。**为了把科学视为可理解的活动，我们所研究的事物必须具有真实的内在属性（真实的力量和缺陷）；但我们表达这些事物的惟一途径是通过表述。

每一种复杂化过程都包含进一步远离传统科学观的步骤。如果我们承认对人的研究包括了对这些方面的社会复杂性的认可，那么我们还必须承认，对封闭系统取向的采纳并不合适。学科性质以及对封闭的偏好与对权威知识的渴望密切相关。为了继续深入，我们必须对作为一个概念工具的学科性质的含义有一个清晰的把握。为此需要突出两个密切相连的维度，它们把前面几章涉及的论点连接了起来。

话语维度（*discursive dimension*）突显了一个学科的统一特征——它的自我指涉和自我调控（*autopoiesis*，自我复制）的能力。学科性的话语在这个意义上是有效的，即它们提供了一个框架，其中意义能够被控制。它们试图利用已经被接受的常识性库存知识去终结其他解释的可能。话语调控了意义的生产——这个意义是与一套既定文本资源（经常是经典化的）有关的，而且是在我们借以把人分类的制度性实践以内。实现这点的一个方式是通过直接的接入有关文化差异的心照不宣的偏见、价值和想当然的假设。为了让学科性的话语运作，语言的使用也必须通过妥善的故事讲述（McCloskey 1983）——这使它在日常生活的包容性和排斥性的关系之中得以展开——来组织。这点经由主体位置的建构得以实现。然而，这样一类用来

固定意义的策略从未完全成功过，因为读者能够以意料之外的方式生产意义，而且，人们甚至可以抵制有关的分类系统，以及他们被分类的方式。

知识维度 (*knowledge dimension*) 指出了社会科学家作为文化行动者所起的重要作用。既然我们永远不能与我们所研究之物（语言系统和特定文化价值，明示了社会实践的行为规则，知识生产的制度的和文本的环境）相互脱离，那么我们所能采取的最好姿态是承认这个状况，并努力明确我们利用和表达分类系统、以投入分类实践（事物在类别中的定位）的方式。之前，吸收布迪厄（1984）有关“品味对分类者进行分类”的分析，我讨论过在社会科学中，加诸于真实性的标记者身上的那些品质——例如有效性、可靠性、合理性、真理和进步——都同等重要。社会科学还有其精心维系的稳定的参照点，通过这些参照点，运用修辞色彩的公认准则，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权威的”解释。在知识建构中运作的区分被用作为一个评价手段。结果，社会科学的文本和实践经常试图模仿“权威声音”，为某个特定读者表达特定的实践和地方的文化遗产。

权力关系是社会科学实践的操作方式中内在固有的一部分。社会科学生产的各种知识是通过对不同行为和认同的类型加以正常化和病理化得到运作的。通过对正常和病态之区分的操作化，通过表达、动员和重新创造偏见，学科式叙述的似真性得以实现。结果，社会科学实践经过把文化价值转为权威知识、进而关联到权力关系。如今，在社会科学实践的正常化和病理化倾向受到质疑时，横跨社会科学的经验却变化了。为进

文 化

一步探讨这点，我们将简要考虑社会研究的三个领域：文化地理学，社会心理学和犯罪与越轨研究。

将被抹去的学科性质：认同，空间和地方^①

在社会研究中如今被界定为文化地理学的领域，我们可以发现有关文化理论对社会科学实践发生影响的有效论证。文化地理学探讨与空间和地方相关的认同的形态。我们联系自己生活、工作和娱乐的地方来看待自己的方式本身是我们建构自己与他人之间边界的复杂产物。通过对他人包容和排斥，我们划出的各种边界造成了影响。试考虑北爱尔兰自治区^②中天主教与新教两派之间的领土边界，这些边界标有一些象征表述以及类似壁画或“和平墙”的文化制品。在英国的北方城镇，社会阶级散布在不同的居住区中，这些居住区表示了相对的地位和富裕水平。在更加熟悉的层面，我们可以在以围墙和篱笆（或甚至是策略性放置的盆栽植物）为花园制品、从而维持想象中

① “地方”（place）一词国内有人译为“地儿”，以突显人们对于自己所熟悉的地方的各种心理情感，如家园、家乡所唤起的内心感受。在人文地理学中，地方、空间指涉不同的心理情感。段义孚认为，在人的心灵中，地方是安慰，空间是自由；地方让人留恋，空间让人憧憬。参见 Yi - Fu Tuan, 1977,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中译见《经验透视中的空间和地方》，潘桂成译，台北：国立编译馆，1998。——译者注

② Northern Ireland, 在爱尔兰东北部，自从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以来，北爱尔兰的新教多数派和爱尔兰共和国天主教的大部分人口之间的冲突频繁爆发。——译者注

的私人空间之间的边界中看到这一点。这些边界以及制品的明确特征与“近邻”(neighbourliness)这个不同的概念连接到一起。为赋予一个“地方”以意义,我们还要利用之前讨论过的几类对立,比如同/异、朋友/生人、安全/危险、男性/女性,如此等等。依照这个方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制造出地方以及它们之间的边界的意义。文化地理学还假定,“文化”包括持续不断地争取支配的斗争,也包括认同借以实现的抵抗的产生。

有关话语和认同的后结构主义取向对于人文地理学的学科领域中“地方”的观念提出了新的洞见(参见 Massey 1994, 1995)。晚近以来,这种有关环境的取向的应用开始改变自然地理学的社会研究。这一对文化的关注并不像人们经常认为的那样是全新的,而是借鉴了段义孚(Yi - Fu Tuan 1974, 1978, 1984)的著作——他探索了地景(landscape)的意义以及1960年代以来现象学术语中“社会的”与“自然的”之间的关系。随着测量地理学在1970年代逐渐失去统治地位,随后在1980年代政治经济学取向填补裂缝的努力遭到失败,对文化解释的关注终于有了兴盛活跃的空间。起初,该取向专注于原初的神话,这些神话描绘和展示了我们以种族中心主义的方式对空间和地方的反映。而段义孚采纳的是更为经验性的取向,他的论述也探讨了对立关系的作用。这些对立关系包括生/死、男人/女人、我们/他们,以及他们怎样关联到土地/水、中心/边缘、北方/南方、高/低、天/地等等。他还探讨了有关地景的复杂的文化表征以及地景中的人类关系(Tuan 1994)。

文 化

近来的研究强调并批评提供了城市地景的“起源神话”的原初故事。当城市被更为恰当地理解为空间现象时，——其中各种故事、节奏、运动和网络共存，而且，它具有不同的互动层次以及相当独特的空间—时间——城市就有了某种潜在的设计和意图。这个地理学分析的转变在多琳·梅西（Doreen Massey）的著作里表达了出来。

城市是空间现象，这既是就个体而言，也是就个体之间的关系而言。乍一看，这点明显得似乎让人糊涂。城市当然是有关空间的：它们是空间，它们位于空间里面。这些是真实无疑的，不过我们的意思比这个更多。因为在社会科学中有一件事情发生过巨大变化（a sea-change），即空间本身是怎样被概念化的。空间——我们在里面生活，世界（城市）在里面被组织起来——越来越被理解为社会产物，这些产物是由存在于人、机构、制度等等之间的关系所构成的。

（Massey 1999: 159）

城市是一些异质性地带，其中含有各种层次的互动强度，各种模式的流动性，社会性/匿名性，一致/差异，秩序/失序。尽管城市规划有很长的历史，城市发展的结果经常比预料的要远为复杂和异质。追溯对立在空间表述中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到同/异、男性/女性的对立是怎样共同运作，建构在空间中界定认同的复杂方式。只有当我们通过局内人与局外人的关系界定

认同、而不是列出它们的属性时，我们才能够理解认同。依照这种方式，还可以认为空间、边界以及认同是经由复杂的话语对立的相互关系而备受争议的。通过发现话语对立、了解它们是如何凭借权力关系运作的，我们得以理解文化和认同变化的方式。

文化、认同和被用来标明差异的边界通过人类的动态实践而不断转变，这些实践组织和重新组织了既定的环境，以及人们与环境的关系。Pile 和 Thrift (1995) 运用了德塞尔托 (1984) 的观点，主张一切故事实际上都是旅行故事 (travel stories)，凭借这些故事，身体的物理移动和语言的运用产生了各种空间—符号隐喻 (比如行走和旅行，甚至是一个流浪者或游客)。围绕城市的空间和身体隐喻的使用。^①像“跨越轨道” (across the tracks) 这样的习惯用语相当于安全与危险地方之间的现实边界。难以驾驭的城市还被描述为有病的、容易受传染、秩序混乱和不自然。经过对特定的问题群体的指认来讲述城市的故事，这是司空见惯的事——“都是贫民区的错”。以南非的约翰内斯堡为例：那里，变动不居的城市环境被认为凌乱不堪、堕落腐化；城市生活经常被描绘成“不堪重负”。1990 年代该市经济资本的外逃通常被归因于种族隔离制度废

① 原文如此。——译者注

文 化

除之后，从其他非洲国家涌入的移民所造成的冲击。^①约翰内斯堡的问题成为重建南非民族认同的现场。为了统一诸多人群和语言，每一个电视节目联系人至少要派出两个南非人代表。每一个广告牌都标有新的国家信号（甚至文具商也“向国家发表演说”）。构造一个平等、统一的非种族主义的南非，这点已经实现，然而代价却是将其他非洲黑人污蔑为引发国家病乱的原因；种族主义被仇视外国人的病症（xenophobia）所取代。约翰内斯堡被认为是这个问题的典型代表。

城市的原初故事也简化了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些故事认为，城市是对自然的替代，它们之间有清晰的分界线。Steve Hinchcliffe（1999）认为，一个更充分的取向应该容纳城市的野生生物与绿色空间——它们能够在城市空间中滋长——的复杂关系。实际上，我们应该以一套独特的伦理实践为基础——这套实践管理了对土地的使用，或者是关于人与动物之间关系的配置，来重点分析城市—自然的形成。为了容纳各种文化实践——它们包括城市中心里的农业使用和商品蔬菜种植模式的转变，城市野生生物群落的保护，被遗弃的地方的转化，等等——我们需要一个比起单靠城市/乡村划分（其内涵

① 1990年2月，就任南非总统不久的德克勒克宣布解除对一些南非黑人解放组织的禁令，接着又释放了曼德拉和其他一些黑人领导人，开始了试图以谈判取代对抗的进程。1993年12月，南非议会通过新宪法，白人垄断南非立法机构的历史从此结束，种族隔离制度解体。在1994年5月第一次不分种族的全民大选中，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获胜，曼德拉当选新南非第一任总统。——译者注

是分别对社群和共同体的区分)所提供的考察更加灵活的概念框架。

我们还需要避免落入分支学科的陷阱去重点分析这个或那个,因为所谓的乡村经验和城市的经验一样复杂、难解(shot through)。梅西认为,“地方”仅仅在边界之内才有意义,也只有当我们认识到边界两边的社会存在的复杂、变动和不确定的模式时,这些边界才有意义。人文地理学中对文化的认知还牵涉到学科问题。1940年代,阿尔弗雷德·舒茨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作为一个社会学家被介绍给一个人,此人回答道,“你是哪一类社会学家,城市还是乡村?”这样的区分颇受欢迎。我们应该对此保持敏感,即社会科学家在他们选定的研究领域中,如何利用现存表述的常备要素(在学术圈以及他们身处的更广泛的文化中)。社会科学家运用他们所处的文化提供的技巧来研究事物。他们所选择的分析目标也是通过内置的文化假设而被界定和理解的。

被质疑的学科性质:精神作为一个竞争的空间

近来,社会心理学中的研究试图用社会学的文化取向来搭建桥梁。话语心理学(discursive psychology)提出一个研究程序,该程序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机会,使社会学的互动论、现象学和常人方法学分支能够以合理的、不导致问题的方式加以吸收。这个话语取向比之前讨论过的后结构主义取向更具经验性,因为它提供了理解意义建构中的日常社会互动的方式。但

在把交流作为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进行的研究中，它对表述、类别和隐喻的使用也很敏感。一个特别的例子是，Rom Harré阐述了作为一个场所的身体，认为它“以我们的个人认同为基础……作为与物质事物关联的参照点……以便分配各种各样的角色、任务、义务和策略”（Harré 1991: 257）。这个论述为突显学科之间的对话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基准。话语心理学致力于确定这点，即意义是如何通过实践导向的互动而生产出来的。这里所用的“实践”含义似乎是宽泛地借自吉登斯（1982a, 1982b）的论述，他把实践知识形容为容纳能力（*containing capability*）（即有关行动者有动机和资源去投入和维持互动）和知识吸收能力（*knowledgeability*）（即他们能够在自己所处的知识系统中调控自己的活动）。

在积极的实践研究方面，话语心理学专注于探索通过来自日常生活的对话和文献所产生的意义。这种界定话语的方式类似于因袭主义（*conventionalist*）取向考虑科学知识的方式——它考察有组织的学术团体中科学语言的作用（Keat and Urry 1978; Smith 1998b: ch. 5）。然而，话语心理学家已经极为强调积极的交流在意义生产中的作用。谈话分析探讨了说话者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环境，他们的共享经验和意图，谈话作为其一部分的事件，乃至停顿、沉默和“嗯”、“呃”这些经常被忽略、但的确构成交流经验的一部分的内容。态度不是被看作认知结构的产物，而是被重新解释为可评估的看法，这些看法包括一整套含蓄的线索和暗示。结果，这个取向发展成知识领域中一个广阔的质性研究方案，它经常被界定为批判心理学

第六章 文化与后学科的社会科学的前景

(Potter and Wetherell 1987; Edwards and Potter 1993)。像以前讨论过的取向一样，“话语”是人们以各种方式利用语言规则及其实施来产生意义的产物。在更广泛的心理学领域，被视为过去给定的那些事物——如原因和事实——受到认真的细察。这些事物原来是资源，现在被转变为研究的主题。因此，话语心理学并非提出一套不同的目标分析以让学科严肃看待，它是在主张现存的目标分析能够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理解 (Harré and Gillett 1994)。

在这个领域内，一个文本似乎用作为各种取向的共同参照点。乔纳森·波特和玛格丽特·韦瑟雷尔 (Jonathan Potter and Margaret Wetherell 1987) 对作为谈话和写作活动的话语的分析以一种跨学科的方式利用了各种各样的资源，这在很大程度上和之前讨论的诸多取向是一样的。他们挑选各种方法和有益的观点，去克服他们在积极的研究中遭遇到的分析问题。结果，他们吸收了巴特的符号学，吸收了常人方法学的质性方法论 (还有对构成交流环境的、想当然的常识假设的重点分析)。此外，他们利用了约翰·奥斯汀 (John Austin 1962) 有关把言辞当作行为来使用的“言语行为”理论。波特和韦瑟雷尔 (1987) 认为，语言使用的主要特征之一就在于它是怎样包括做事的，而且它有目的和意图。研究的结果使他们开始意识到，某些类型的言语行为能够依次相随，以创造松散的、由规则主导的情境 (例如对话)。这里的“规则主导的”意思是指那些主要在暗中运作灵活规则，它们必须不断地被重新修订，以回应人类活动中的不确定性。为了解释一般的结构层次如何

文 化

涉及日常言语，他们利用了 Rom Harré 的“行为发生学”（ethogenic）取向——它区分了能力（competence）与表现（performance）。能力包括掌握一个特定语言系统，了解它的实施规则、在规则中使用它，以便与他人交流。因此，它包括了对一套技巧、理解和价值——它们可以通过在明确情境中的说话或写作活动而得到——的拥有。表现激活交流技巧，以投入社会互动（Harré and Secord 1973; Harré 1979; Harré and Gillett 1994）。我们应该记住，这个取向不是为想象中的社会学家，而是为那些精通行为主义和认知心理学假设的读者、为他们的回应而发展的，为了说服这些读者，他们必须触及广泛承认的心理学假设，在这个过程中重新解释它们。

这一取向把表述视为在世界的构成中扮演积极建构的角色。然而，这个取向并不把表述固定到预先确定的群体。这就意味着，群体可以被用来界定我们所关注的习俗和表述的范围，但它们并不与这样一种简洁的方式相称（Potter and Wetherell 1987: ch. 7）。为了提供一个更加不受限制的、灵活的话语和表述分析取向，他们提出了“解释的常备项”概念（借自 Mulkay 1991）。它指的是观点、概念和术语集合，这个集合被用来界定和评估经验与事件。话语心理学也试图跨越有关交流的理论陈述与经验陈述之间的鸿沟，探索有意图、有目的的人之间交流的现实经验，这样一个特点在后结构主义分析的许多例子中付之阙如，因为它假定了一个认识主体的存在（后结构主义认为这个类别值得怀疑）。

这并非惟一出现的话语心理学类型。Bolton 话语网络

第六章 文化与后学科的社会科学的前景

(Bolton Discourse Network, 缩写作 BDN) 已经辨识了这种取向能够怎样以更加多样的方式应用, 这类似于物质文化分支在文化研究中的出现一样。BDN 试图超越文本和谈话的分析, 拓宽话语分析的专注领域, 与那些探索视觉表述——比如广告、漫画、身体、组织、城市和园林(被界定为物理文本)——的文化研究领域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更早以前, BDN 的创建者之一伊恩·帕克(Ian Parker 1992) 试图利用易于误导的“理性 vs. 相对主义”的概念游戏来提出对话语心理学的批判式回应。这之所以易于误导, 是因为它进行了一个站不住脚的对比; 即便是相对主义者也要求普遍性(Harré and Krausz 1996)。或许最有效的挑战是对话语心理学的方法论的批评, 即认为它过于狭窄地强调经验意义上的谈话和文本证据; 忽视支撑交流和表述的假设和价值、隐含的共享知识——它充当了可能性的环境, 使交流得以进行。最近, 帕克(1999) 似乎采纳了一种更为调和的话语心理学取向。

在这个领域中, 逐渐浮现的批判现实主义话语分析提供了一个远离学科性质的模型。帕克等人(1995) 专注于把精神病理学当作情境化实践加以解构, 直接挑战了精神健康实践中专家的作用, 不管他们是临床医学家、精神病医师还是心理学家。这一成就是通过仔细分析在特定情境的诊断中运行的对立区分(理性/非理性、外行/专业、个体/社会、形式/内容、类别/凌乱的现实生活,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 正常/病态) 而取得的。沿着类似的路线, 埃里卡·布尔曼等人(Erica Burman et al. 1996) 详细考察了治疗实践在建构主体位置中的作用。

文 化

然而，和批判心理学家一样，他们想作出区分。他们因而还指出了治疗实践（从教育心理学到性别认同治疗专家）为抵抗——即病人反抗职业专家的病理化倾向——开创机会的方式。精神病学和心理学话语试图控制意义生产，然而它们总是遭到动摇、颠覆，它们甚至能授权给反对者。

在心理学对文化的研究中，最重要的关注领域之一是解释种族主义刻板类型的使用。按“种族”对群体的分类是通过日常生活中所建构的叙述和故事的不断重复和再公式化（*reformulation*）制造出来的。精神病理学和精神病学研究中的种族中心主义偏见，以及它们在把文化上的特定行为界定为反常、进而有必要治疗和（或）挽留方面所起的作用，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在若干研究中被加以识别（有关例子参见 Fernando *et al.* 1997; Littlewood and Lipsedge 1997）。话语心理学试图理解在情境化的谈话和文本中（也在心理学知识中）种族主义价值的未被认识的环境。

对文化差异和相关价值的判断包括复杂的分类程序的操作化过程，这些分类程序在某种程度上是共享的，而且充当了意义生产的隐含基础。这些取向依循各自不同的方式，在探寻许可特定类型的冒犯谈话和轻率举动的行为规则方面，它们都非常有效。话语心理学所缺少的是它对分类模式——这些模式组织和控制着哪些意义能够或不能制造出来——的理论阐述所需要的恰当基础。这里的困难在于，话语心理学满足于对主流心理学——它严重依赖于对“科学技术”的采纳和封闭的系统分析——强烈的学科认同；学科性的方案假定，要加入这门职

业，就要在这些首选的方法中经历尽责的社会化过程。在下一个研究案例中，我们将考察精神病理学和精神病学在其中担任执行功能的学科领域，即犯罪学。在这个例子中，我想强调学科性质在社会研究中的适应能力。

学科性质基本完好：犯罪主体的（重新）建构

被社会学、文化研究、地理学以及心理学（程度更小一些）质疑和挑战的话语控制机制，在犯罪研究中却仍然有效。整本书中我一直主张，一个学科方案的有效性在于它对读者而言的似真性，这很像犯罪学有能力确保研究者为了他们的知识领域而遵行正确路线（party line）。事实上，犯罪学不仅成功地制造出有关犯罪行为及其缘由的庞大、多样的因果解释，而且顽强挡住了自 1960 年代以来由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进行的各种相互配合、暴风骤雨式的批判。使一个因果解释让位于另一个，这个在学科运作中持续进行的过程似乎没有引起怀疑和批判性反思。这一社会研究领域的特征在于，它有能力把复杂的个人历史和相关社会经验转化为心理状况、综合病症、身心失调、功能失常。一旦我概述了一系列犯罪主体的例子，我就会基于之前的论点提出这种事态的两个可能原因。

犯罪研究为我们探讨学科话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有用的领域，尤其当这些学科话语成功地控制了意义生产的时候。首先，和某些研究领域不一样，它提供了一个所有社会科学在其中都有贡献的领域。实际上，对犯罪研究贡献最大的是由社会

理论家和来自其他领域的研究者所作的一次性干预。其次，在犯罪学这个社会研究中有一个本质，即试图围绕辨识犯罪行为的原因这项任务来形成一个学科方案。这个学科方案的坚硬内核很大程度上来自心理学，但也部分与社会学、政治学 and 经济学有关，每一个学科都留有自身的遗产。一个学科方案试图为一个特定的主体位置建立牢固的基础，即“犯罪主体”。然而，一经探讨关于犯罪的特定话语，我们就能看到特定时间和场所的文化规范是如何被连接到独特的伦理规则的。正是在这个伦理—文化的混合中，我们才能够理解在有关一个特定场合中什么是越轨或适当行为的方面不断变动的期望。

在犯罪学历史上各种取向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犯罪学话语中连续表述的犯罪主体。正是通过这些主体，有关违反社会规范的知识才能在犯罪司法体系的内外被人理解。在每一种情况下，“犯罪主体”的构建是以配合有关犯罪学话语中现行的表征系统的方式进行的。因此，被判定违法的人在行为规则、既定文本和制度——借助这些话语，它们使世界有意义——以内受到惩罚。例如，在对犯罪的功利主义论述中，“犯罪主体”是一个理性的决策者，因此该主体要根据法律对每一个犯罪行动的规定而受到适当的惩罚。然而，实证主义的“犯罪主体”则被想象为既有犯罪的性情倾向，也有明确的改过自新的倾向。在实证主义的犯罪学话语中，对不同的惩罚罪犯有不同的回应方式，因此，惩罚应该与罪犯、而不是与罪过一致。在每一个社会科学学科里，我们能够发现一系列由每个知识领域中相互竞争的视角所构建的“主体”。这些主体，这

些虚构的混乱、违法的形象——借助它们，话语对那些构造形象的人而言被赋予了一致性和实用性——既是在越轨社会学（或一般的社会学）中，也是在犯罪司法体系中被构建的。

就我们在此处的目标而言，对连续的犯罪主体作一个简短、节略的概述是有用的。所谓犯罪学的古典学派形成于切萨雷·德·贝卡里亚（Cesare de Beccaria 1764/1963）的著作中，其中吸收了启蒙运动的自由社会契约理论。贝卡里亚主张严格地量罪而罚，而不是根据罪犯的人品和立场进行惩罚。这个观点是受以下因素的激发的：18世纪，遍及欧洲的导致警察暴力出现的权力滥用以及刑事制度的增长。贝卡里亚尤其严厉批评了巴黎警方为响应道德、政治观念以及有关犯罪的观念而采取的干预措施。他的著作（起初是匿名的）挑战了权力的武断使用，力主法律规范要连贯一致。不过，在标准的刑罚学历史中，他的著作里的人道主义内容被夸大了，因为他承认肉体惩罚和刑讯逼供的必要（Newman and Marongui 1990）。在英国，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也概述了对幸福的算计怎样可以被用来阻止个体的享乐主义倾向。两种取向都意在阻止，然而，贝卡里亚的犯罪主体的特征在于，其动机是自发的、完全受制于一个决定之网的：“必须被追捕、操纵和强迫进入法律的反抗者持守品行”（Beirne 1991: 812）。这个取向为整个西欧出现的城市人口的犯罪化过程（criminalization）提供了合法性。

实证主义犯罪学在1870年代的发展改变了犯罪主体的特征。它还给上述的犯罪学贴上了古典学派的标签。对切萨雷·隆布罗索（Cesare Lombroso 1876/1911）而言，犯罪行为的因果

文 化

基础可以通过对罪犯的生理学特征的确定从而建立起来。这个论述结合了骨相学^①（对颅骨形状的研究）和其他解剖学特征（据信与规范不同的生理学特征），比如蹠足、下巴宽大、大耳朵、有色皮肤、头发浓密、不会脸红、多余的乳头以及痛感减少。把犯罪行为 and 道德堕落归因于癫痫症，这确保了这一特殊残疾成为优生学家强烈干预的对象。隆布罗索利用来自 383 个死者和 3 839 个活着的罪犯的头盖骨实据建构了一个模型，以预测总体上人们的犯罪倾向（Lombroso 1876/1911）。隐藏在犯罪主体的建构之下的是这个假设，即罪犯是对进化早期的返祖现象——对这些人的去人性化和病理化。与此类似，他把女人的卖淫归因于女人具有一个和其他脚趾有些分开的大脚趾（Lombroso and Ferrero 1895/1915）。他认为，对于构成根本失调状态的外部“迹象”的重点分析，能够使我们区别长期惯犯与那些服从改造的罪犯。从 20 世纪开始，犯罪学话语的道德化要素渐渐地被“科学”的病理化解释所包含。随着 20 世纪早期对生物学决定因素的搜寻开始被质疑，犯罪学理论加入了社会决定因素的行列。西里尔·伯特（Cyril Burt）——后来因其

^① phrenology，由解剖学家伽尔（F. J. Gall, 1758—1828）发明，主张大脑皮质分化成许多功能不同的区域，常识中的诸多心理功能，例如雄辩、狡诈、智能、嫉妒等等，在大脑皮质上都有固定的区域负责；从而相信脑壳可以反映大脑皮质各功能区的发达程度。——译者注

对教育政策的影响以及公众对他有关智力的欺骗性研究的指控^①而出名——在英国犯罪学中，尤其在有关青少年犯罪的研究领域享有盛名。实际上，在犯罪讨论领域中，他可能是第一个把因果基础归因于媒体影响的人。他的友善描述和讲故事的模式征服了英国刑罚系统中的大量工作者。《少年犯》（*The Young Delinquent*, Burt 1925/1961）的出版对于几乎整个 20 世纪英国处理青少年罪犯的方式产生巨大的影响。伯特的犯罪遗传说值得进一步推敲。他运用基因型（genotype）分析，指明了存在于他所研究的家庭案例中的病理学模式，并且认为罪犯固有的犯罪倾向如果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发现的话，是有可能得到控制的。在由谢尔登（W. H. Sheldon 1949）领导的小组所进行的系统化研究工作中，这一解释达到了新的复杂性（sophistication）水平。谢尔登（1949）利用那些选择了服兵役而非进牢房的年青人的有关社会 and 身体特征的数据，探索了体格与犯罪倾向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案例中，他采用了因军事鉴定程序需要而拍摄的照片，以便把身体作为体格类型加以分类，进而将其与社会服务、医学、精神病学的记录相匹配，以辨识行为的模式。他发现各种机构已经开展过调查，以监控那些被研究

^① 美国衣阿华大学的杜夫曼（D. Dorfman）在 1978 年 9 月 29 日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西里尔·伯特问题，新发现》（1177—1186 页），其中精心研究了伯特撰写的主要著作（《从社会职业等级看智力分布》）并由此得出结论，伯特的数据是捏造出来的。伯特声称他的研究涉及 4 万对子女—父母，其研究结果曾作为无可辩驳的科学数据被用于无数的研究实验中，也被许多论文引用过。而杜夫曼认为它是一个骗局。——译者注

文 化

者的社会背景。如果更加仔细地察看，你会发现很多主观的判断伪装成病理学的事实性指标。个案研究被编了号，进一步把相关的个体客观化为一个类型的代表。例如，“29号”具有“精力充沛的、外向的、引人注目的合群性”，一个“狡诈、成功的小偷”，或许注定成为一个“像酒鬼那样亵渎弗洛伊德和基督教学说的人”从而“犯下大罪”。“34号”因为体格粗糙（gnarled）而引人注目，大嗓门，脾气暴躁，喜欢裸体。每一个案例中，家庭背景均因为与规范不同而被探讨。通过一套复杂的、在正常和病态对立的参照术语中组织的因素，年青人被加以分类。无论犯罪的原因是被视为起源于生物的，还是失范（anomie）的产物、身份剥夺的结果、亚文化规范或者生态学位置，每一个“犯罪主体”都被病理化了。所有这些解释在20世纪晚期的这一点或那一点上均留下了痕迹，尽管近来的研究专注于腺体（glandular）问题、注意力缺失紊乱、遗传性素质和不协调的父母养育。

在每一个前述案例中，“犯罪主体”是以一种适合现行表征系统——该系统处于有关的犯罪学话语以及更广泛的文化情境中——的方式被建构的。触犯法律的人在行为规则情境、借助这些话语使世界有意义的既定文本和制度中受到惩罚。近来的犯罪学与这些尝试在建立病理学行为的模式方面有广泛的一致性，但以一种重要的方式与其不同。而在当代的病理学论述中，对个体临床诊断的重点分析让位于“或然论算计的语言”以及对人口群体朝向犯罪的统计学倾向的探查。这些新的犯罪学说更加关注对分组人口（subpopulation）的管理，以及对公

共安全的维持。这些新话语的语言来自系统分析和社会功用。在英国，有关拘留“严重失常的个人”（实际上没有犯任何罪行）这一建议获得了布莱尔政府的批准，依据的是可能性平衡、风险和公共安全。这实际上强化了临床判断在鉴别潜在的危险行为方式和人格特征方面的作用。联系到刑罚政策，构成迄今为止犯罪主体建构的特征的一个形象——个体化的“长期惯犯”——已经开始从刑罚话语中消失。按照马尔科姆·菲利（Malcolm Feeley）和乔纳森·西蒙（Jonathan Simon）的说法：

制度不考虑那些社会规范——诸如消除犯罪、将罪犯重新整合进社群、或者公共安全，而是开始把它们自己的产出作为功能指示器。这样法庭就会查看诉讼记录（docket flow）。与此类似，假释机构会改变评价方式，转而关注比方说逮捕和正当的起诉听证之间的时间差。

（Feeley and Simon 1992: 456）

因此，以一种有效率的方式（这是可以控制的）对人进行起诉就成为对功能的测度，正如教育的功能越来越借助标准化测试、而不是某种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水平上的结果来加以衡量的。如果再犯（reoffending）成为一种功能测量的话，他们不可能实现任何目标。菲利和西蒙认为，这导致了对新形式的保管人式控制（例如对顽固不化的罪犯的电子化标记和作息管理[*curfews*]）的倡导，而不是修复策略（Feeley and Simon 1992:

文 化

457)。结果，有关犯罪学和刑罚学的话语如今处于转变之中。它们能否合并为一个统一的新学科方案，或是成为涉及公共政策的更广泛的管理主义（managerialist）话语的一部分，这是不可预测的。

我们的结论是，我们不应该忽视话语和制度性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在之前的第五章，我们关注了福柯（1980）怎样就权力/知识的关联作出了非常有效的论证。如果积极的和一般化的（或许主要是隐含的）赞同存在，话语就能够作为一个支配系统以及表征系统，借助行为规则、文本和产生意义的制度实践顺利运作。我们应该记住，权力总是孕育出它自己的抵抗形式，如果意义是以这种方式生产的话，它们也能被颠覆和改变。任何试图动摇新兴的犯罪话语的努力都不得不说明他们组织知识的方式，以及他们怎样被联系到更加广泛的、建构了社会问题的话语上。

现在回到本节开始时提出的目标上来。当学科格外强调将一个人自己的文化价值作为建立权威知识的基础时，学科性质遭到大量的批评以及对它的广泛颠覆，但它经受住了这些批评和颠覆继续存在。当犯罪学话语空口许诺说科学论据把事实问题和规范问题区分了开来时，这个领域中充满价值的研究论据却指向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接二连三远离事实的清单。少数几个在这里被辨识的研究是用来突显犯罪学中的各种取向。对科学方案的忠诚和（或）犯罪学话语的道德化使命能够导致健忘。此外，每一个取向均展示了现行的性别化和种族中心主义的价值，接受了研究共同体中的隐含知识——它在每一次变迁

中被重新表述。

犯罪学还作为一项制度出现在犯罪司法体系中，这可能意味着它受到保护，免于学术争论中广泛变化的影响。这个学科的既定文本充当了贯穿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制度性诊断、治疗和管理参照点。它始终如一地受到研究委员会（research councils）的大量资助，而对其他研究领域的资助则经常受限制。甚至在 1980 年代，有关犯罪原因与预防的犯罪学研究也没有像其他社会科学领域那样被削减了研究经费（cuts）。此外，内政部（英国的）及其辖制下的机构直接的经费资助也维持了该学科方案。甚至已经把社会问题重新界定为个人困难（如整个西方世界的新自由主义者和一些基督教民主党人所论证的那样）的政府也认为维持对犯罪学研究的投入有价值。此外，犯罪学知识不仅造就了“有报导价值的新闻题材”，而且在公共领域以一种强调它作为引入阅读的文本的来源的方式而被提出。这个学科以各种方式享有特权，它还保持了自己在发现确定性方面的自信，尽管整个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都表达了自我怀疑。

学科性质，学科间性与后学科性：

文化分析作为一种催化剂

为研究社会世界而采纳封闭的系统分析，由此获得了学术实践中强烈的连贯性（尽管这是以略微不同的方式实现的；参

见 Smith 1998b: chs 1 – 3), 但这一连贯性带有一个价格标签^①。这包含目标分析中对复杂性和多样性的意识的丧失。学科性的知识领域与学术制度中特定统治形式的出现相联系。探讨学科性质与它的替代选择（加粗的术语）之间的区分是有用的

• **学科知识** (*disciplinary knowledge*) 的制度化过程是社会科学中的关键问题，因为它专注于对一个封闭 (ring – fenced) 领域进行分析，经常导致对社会的片面论述。它尤其忽视一些重要的、来自其他知识领域的经验。各个学科存在假定了一些服从封闭系统分析的、清晰界定的分析目标。此外，一个学科成员的批判能力被束缚在他们能进行理论阐述的部分、能够运用的方法等局限内。

• **学科间性知识** (*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 被认为能够带来有趣的新问题，能够以新的方式提出问题并且打击自鸣得意。然而，一旦问题被提出，为了回应新的问题，这一方案倾向于倒退至学科式研究中。多学科研究经常试图集合不同知识领域的工作，但倾向于用一种生硬的 (unintegrated) 方式把这些工作拴在一起。积极的一面是，目标分析被认为是复杂的和多维的，但其中仍然存在一种倾向，即把目标界定为客观的实体 (entities)，而忽视知识生产的表述性和象征性的方面。

• **后学科性知识** (*postdisciplinary knowledge*) 假定建立以下两方面之间的联系是可能的：横贯社会科学来对这些问题加以

① 意即付出了代价。——译者注

处理；开展一种社会研究——它认为由学科性的和学科间性的社会科学所建立的边界是可以渗透的。后学科性的取向承认目标分析是复杂的带争议的空间。而且，对方法论的多元主义的接受创造了一个情境，其中存在更多的创新和批判性反思的机会，而且考虑到了社会研究中读者与作者的关系。

借助学科话语和组织化的学术共同体的出现（比如职业性社团，以及划分好的部门制度结构的发展），学术工作中的意义生产被高度控制了。然而，学科话语的动摇意味着目标分析不再被认为是简单、确定和充分界定的（如前面讨论的，现在被理解为复杂、不确定和带争议的空间）。我们可能正在目睹最初的后学科性学术话语的逐渐兴起。至于学科话语，我们应该区分两个相互联系的维度。

- 后学科取向的话语维度不仅突显了自我指涉和自我调控（autopoiesis，自我复制）的能力，而且承认了种种方式，其中意义被读者以及社会科学家生产出来。他们试图开启另类解释的可能性，而且承认，他们的工作在不同读者的库存常识知识的范围内只是似真的。文本资源不会被视为不容置疑的参照点，我们借以对人进行分类的制度性实践将以更加敏感的方式开展；因此，它不会支持导致不公正的日常生活的包容性和排斥性关系。这点也将借助主体位置——其中，对认同的探询不会导致权力被剥夺（disempowerment）——的建构而得以实现。

- 后学科取向的知识维度将承认语言系统和特定文化价

文 化

值、行为规则和既定社会实践，还有知识生产的制度性和文本的情境。总之，它必须重新界定继承自学科研究的目标分析，以一种避免偏袒、片面论述的方式去吸收概念、观点和实据。尤其重要的是意识到我们运用和表达分类系统、以投入社会研究实践的方式。不仅是我们把人置于类别中的方式应该受到挑战。我们应该动摇那些为病理学负责的分类系统；分类系统是协商性的，而不是固定的详细目录。

本书探讨了来自文化分析的多种取向，其中许多通常与后结构主义和现象学有关。还存在其他对知识建构加以探讨的取向。比如，批判现实主义也承认在对自然和社会目标进行研究时存在封闭系统的问题。我在其他地方详细讨论过这点（Smith 1998b: ch. 7; 还可参见 Smith 2000）。批判现实主义的一些代表者开始展开一种对社会的后学科式论述，而且明确批评学科性方案的偏狭（parochialism）和霸道（Sayer 1999）。一般说来，批判现实主义在讨论正常/病态区分时站在一个矛盾的立场上。一方面，在转变的社会行动模型中（Bhaskar 1979）它提供了有关知识怎样把病态从不受欢迎的决定因素中解放出来的论述。然而，不情愿提出社会科学中的符号和分类系统，这是该取向的一个主要问题。我希望我能够鼓励诸多批判现实主义者把表述、文化和话语作为一个领域进行更加严肃的研究。对我们此处的关注更为中肯的是，批判现实主义经常关注辨识不可观察的社会关系，使用“混乱”、“崩溃”和“功能失常”这些词语来确定正常。当然，我们需要适应不断增长的病理学研究

工作，对正常化过程进行更好地论述；但是我不相信以这种直接的方式复制混乱和反常的语言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最佳方式。此外，现实主义中的文本取向经常是严格地引人阅读的，而且试图剥夺它的读者、尤其是社会研究者重写文本的机会，而他们本可以利用这些机会充分地探讨他们所选择的研究的。

通过质疑“正统经典”，我们得以开始拆解社会科学的学科性质在其中被建立的机制。围绕文化概念、它的生产、分类、消费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和意义的生产所展开的讨论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它可以使当代社会科学打破学科性质强加的限制。在有关物质文化、社会问题、谈话分析和身体话语——只举少数例子——的研究中，一些跨学科取向的范例提供了一些使我们可以脱离圣典式（scriptural）经济学的方式。当然，正如第一章指明的，“文化”不是答案。在文化优越论和社会科学实践中的学科性质之间尤其存在强烈的类比。因为把文化上的特定价值转化为仍然隐含着的分类实践从而导致的问题将不会消失。我们不应该认定“文化”一词可以当作一根魔杖；我们对它所做的才是真正重要的。

参考书目

Adorno, T. W. (1941) "On popular music",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9: 17 – 48.

Althusser, L. (1965) "Contradiction and overdetermination" in *For Marx*. London: *New Left Books*.

Althusser, L. (1971)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New Left Books.

Althusser, L. and Balibar, E. (1968) *Reading Capital*. London: New Left Books.

Austin, J. (1962)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akhtin, M. (1981)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Austin, TX: Texas University Press.

Bakhtin, M. (1984) *Rabelais and his World*.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arthes, R. (1970) *S/Z*. London: Cape.

Barthes, R. (1973) *Mythologies*. London: Fontana.

- Barthes, R. (1976) *The Pleasure of the Text*. London: Cape.
- Barthes, R. (1977) *Image Music Text*. London: Fontana.
- Beccaria, C. de (1764/1963) *Dei Delitti E Delle Pene* (On Crime and Punishments). New York: Bobbs – Merrill.
- Beirne, P. (1991) “Inventing criminology: the ‘Science of Man’ in Cesare Beccaria’s *Dei Delitti E Delle Pene*”, *Criminology*, 29 (4): 777 – 820.
- Bellah, R. (1976) “New religious consciousness and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in R. Bellah and C. Y. Glock (eds), *The New Religious Consciousnes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erger, A. A. (1998) *Media Analysis Techniques*, 2nd edition. London: Sage.
- Bhaskar, R. (1979) *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 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the Contemporary Human Sciences*. Brighton: Harvester Wheatsheaf.
- Bhaskar, R. (1989) *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 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the Contemporary Human Sciences*, 2nd edition. Hemel Hempstead: Harvester Wheatsheaf.
- Blalock, H. (1964) *Causal Inferences in Non – Experimental Research*.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Bourdieu, P.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London: Routledge.
- Brown, V. (1994) *Adam Smith’s Discourse: Canonicity, Commerce and Conscience*. London: Routledge.

文 化

Burman, E. , Aitken, G. , Alldred, P. et al. (eds) (1996) *Psychology, Discourse and Social Practice: From Regulation to Resistance*. London: Taylor & Francis.

Burt, C. (1925/1961) *The Young Delinquent*, 4th edition.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Certeau, M. de (1984)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icourel, A. (1976) *The Social Organisation of Juvenile Justice*. London: Heinemann.

Clarke, A. J. (1997) "Tupperware: suburbia, sociology and mass consumption" in R. Silverstone (ed.) *Visions of Suburbia*. London: Routledge.

Clarke, J. (1975) "The skinheads and the magical recovery of community" in S. Hall and T. Jefferson (eds)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 London: Harper-Collins.

Clarke, J. (1998) "The trouble with normal", inaugural professorial lecture. Mimeo, The Open University.

Clarke, J. and Cochrane, A. (1998)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ocial problems" in E. Saraga (ed.) *Embodying the Social: Constructions of Difference*. London: Sage.

Cohen, S. (1972/1987) *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 The Creation of Mods and Rockers*. Oxford: Blackwell.

Cooley, C. H. (1902) *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New York: Schribner's.

Dahl, R. (1957) "The concept of power", *Behavioral Science*, 2: 201 – 5.

Dahl, R. (1961) *Who Governs? Democracy and Power in an American Cit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Derrida, J. (1973) *Speech and Phenomena*.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Derrida, J. (1976) *Of Grammatology*.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Derrida, J. (1978) *Writing and Difference*. London: Routledge.

Derrida, J. (1981) *Positions*. London: Athlone Press.

Donzelot, J. (1979) *The Policing of Families*. London: Hutchinson.

Douglas, M. (1966)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London: Routledge.

Durkheim, E. ([1912] 1976)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 London: Allen and Unwin.

Durkheim, E. and Mauss, M. (1963) *Primitive Classification*. London: Cohen and West.

Easthope, A and McGowan, K. (eds) (1992) *A Critical and Cultural Theory Reader*.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Eco, U. (1984) *Semiot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London: Macmillan.

Edwards, D. and Potter, J. (1993) *Discursive Psychology*. Lon-

文 化

don: Sage.

Farquhar, D. (1996) *The Other Machine: Discourses and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London: Routledge.

Feeley, M. M. and Simon, J. (1992) "The new penology: notes on the emerging strategy of corrections and its implications", *Criminology*, 30 (4): 449 – 74.

Fernando, S., Ndegwa, D. and Wilson, M. (1997) *Forensic Psychiatry, Race and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Fiddes, N. (1991) *Meat: A Natural Symbol*. London: Routledge.

Foucault, M. (1967) *Madness and Civilis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 London; Tavistock/ Routledge.

Foucault, M. (1970) *The Order of Things*. London: Tavistock.

Foucault, M. (1972)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Tavistock.

Foucault, M. (1973) *The Birth of the Clinic: An 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 London: Tavistock/Routledge.

Foucault, M.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Harmondsworth: Penguin.

Foucault, M. (1980)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 – 1977*. Brighton: Harvester Press.

Foucault, M. (1982) "The subject and power" in H. L. Dreyfus and P. Rabinow (eds),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ism and Hermeneutics*. Brighton: Harvester Press.

Garfinkel, H. (1967)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 Hall.

Gendron, B. (1986) “Theodor Adorno meets the Cadillacs” in T. Modleski (ed.), *Studies in Entertainment: Critical Approaches to Mass Culture*.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Giddens, A. (1982a) *Profiles and Critiques in Social Theory*. Basingstoke: Macmillan.

Giddens, B. (1982b) “Power, the dialectic of control and class structuration” in A. Giddens and G. Mackenzie (eds) *Social Class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u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ilroy, P. (1993) *The Black Atlantic: Modernity and Double Consciousness*. London: Verso.

Gramsci, A. (1971) *Selections from Prison Notebook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Guillaumin, C. (1995) *Racism, Sexism, Power and Ideology*. London: Routledge.

Hall, S. (1973) “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elevision discourses”,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CCCS) Stencilled Paper 7, Birmingham: CCCS; published in an abridged version as “Encoding/decoding” in S. Hall, D. Hobson, A. Lowe and P. Willis (eds), *Culture, Media, Language*. London: Hutchinson.

Hall, S. (1980) “Popular – democratic vs. Authoritarian Populism: two ways of taking democracy seriously” in A. Hunt (ed.), *Marxism and Democracy*.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文 化

Hall, S. (1981) "Notes on deconstructing the popular" in R. Samuel (ed.), *People's History and Socialist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Hall, S. (1983a) "The great moving right show" in S. Hall and M. Jacques (eds) *The Politics of Thatcherism*.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Hall, S. (1983b) "The little Caesars of social democracy" in S. Hall and M. Jacques (eds) *The Politics of Thatcherism*.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Hall, S. (1992) "The West and the Rest: discourse and power" in S. Hall and B. Gieben (eds) *Formation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Hall, S. (1997) "The work of representation" in S. Hall (ed.),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London: Sage.

Hall, S. and Jefferson, T. (eds) (1975)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 London: Harper-Collins.

Hall, S. and Whannel, P. (1964) *The Popular Arts*. London: Hutchinson.

Hall, S., Critcher, C., Jefferson, T., Clarke, J. and Roberts, B. (1978) *Policing the Crisis: Mugging, the State, and Law and Order*. London: Macmillan.

Haraway, D. (1991)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Reinven*

tion of Nature. London: Routledge.

Harding, S. (1986)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Harré, R. (1979) *Social Being*. Oxford: Blackwell.

Harré, R. (1991) *Physical Being: A Theory of Corporeal Psychology*. Oxford: Blackwell.

Harré, R. and Gillett, G. (1994) *The Discursive Mind*. London: Sage.

Harré, R. Krausz, M. (1996) *Varieties of Relativism*. Oxford: Blackwell.

Harré, R. and Secord, P. F. (1973) *The Explanation of Social Behaviour*. Oxford: Blackwell.

Hawkes, T. (1977) *Structuralism and Semiotics*. London: Methuen.

Hebdige, D. (1975) "The meaning of Mod" in S. Hall and T. Jefferson (eds),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 London: HarperCollins.

Hbdige, D. (1979) *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 London: Methuen.

Hewitt, D. and Owusu - Bempah, J. (1994) *The Racism of Psychology: Time for Chang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 Hall.

Hoggart, R. (1957) *The Uses of Literacy*. Harmondsworth: Penguin.

Hoggart, R. (1995) *The Way We Live Now*. London: Chatto and

文 化

Windus.

Hinchcliffe, S. (1999) "Cities and natures: intimate strangers" in J. Allen, D. Massey and M. Pryke (eds), *Unsettling Cities: Movement/Settlement*. London: Routledge.

Horkheimer, M. and Adorno, T. (1947/1979)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London: Verso.

Humphreys, L. (1970) *Tearoom Trade: Impersonal Sex in Public Places*. Chicago: Aldine.

Humphries, S. and Gordon, P. (1993) *A Labour of Love: The Experience of Parenthood in Britain 1990 – 1950*. London: Sidgwick and Jackson.

Illich, I. (1971) *Deschooling Society*. London: Calder and Boyers.

Jefferson, T. (1975) "Culture response of the Teds: the defence of space and status" in S. Hall and T. Jefferson (eds),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 – war Britain*. London: HarperCollins.

Jeffery, R. (1979) "Normal rubbish: deviant patients in a casualty department" in D. Kelly (ed.) *Deviant Behavior*, 3rd ed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Jenkins, H. (1992) *Textual Poachers*. London: Routledge.

Kant, I. (1790/1987) *Critique of Judgement*. Indianapolis, IN: Hackett.

Keat, R. and Urry, J. (1978) *Social Theory as Science*, 2n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Laclau, E. (1977)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London: Verso.

Laclau, E. (1990)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London: Verso.

Laclau, E. and Mouffe, C. (1985)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 Verso.

Lakatos, I. (1970) "Falsification and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in I. Lakatos and A. Musgrave (eds),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atour, B. and Woolgar, S. (1979) *Laboratory Life: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eavis, F. R. (1930) *Mass Civilisation and Minority Culture*. Cambridge Minority Press.

Leavis, F. R. and Thompson, D. (1933)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The Training of Critical Awareness*.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Leopold, A. (1949) *A Sand County Almanac—and Sketches Here and The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évi – Strauss, C. (1949/1969) *The Elementary Structures of Kinship*. London: Eyre and Spottiswoode.

Lévi – Strauss, C. (1963)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文 化

Lidchi, H. (1997) "The poetics and the politics of exhibiting other cultures" in S. Hall (ed.),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London: Sage.

Littlewood, R. and Lipsedge, M. (1997) *Aliens and Alienists: Ethnic Minorities and Psychiatry*, 3r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Lombroso, C. (1876/1911) *L'Uomo delinquente* (*The Criminal Man*). London: Penguin.

Lombroso, C. and Ferrero, W. (1895/1915) *The Femal Offender*. New York: D. Appleton.

Lukács, G. (1923/1971)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London: Merlin.

Lukács, G. (1957/1963) *The Meaning of Contemporary Realism*. London: Merlin.

Lyon, D. (1994) *Postmodernity*.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McCloskey, D. (1983) "The rhetoric of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1: 481 – 571.

McNay, L. (1992) *Foucault and Feminism: Power, Gender and the Self*. Cambridge: Polity.

McNay, L. (1994) *Foucault: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Cambridge: Polity.

McRobbie, A. and Garber, J. (1975) "Girls and subcultures" in S. Hall and T. Jefferson (eds),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 London: HarperCollins.

- Mauss, M. (1990) *The Gift*. London: Routledge.
- Marcuse, H. (1972) *One Dimensional Man*. London: Abacus.
- Markham, A. (1994) *A Brief History of Pollution*. London: Earthscan.
- Massey, D. (1994) *Space, Place and Gender*. Cambridge: Polity.
- Massey, D. (1995) "The Conceptualisation of space" in D. Massey and P. Jess (eds), *A Place in the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ssey, D. (1999) "On space and the city" in D. Massey, J. Allen and S. Pile (eds), *City Worlds*. London: Routledge.
- Mead, G. H. (1934) *Mind, Self and Society*, ed. C. W. Morr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eens, R. (1995) "Pollution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the case of the food regulations in the penitentials", *Early Medieval Europe*, 4 (1): 3 – 19.
- Midgley, M. (1996) *Utopias, Dolphins and Computers: Problems in Philosophical Plumbing*. London: Routledge.
- Miller, D. (ed.) (1995) *Acknowledging Consumption: A Review of New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 Miller, D. (1997) "Consump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 in H. Maekay (ed.), *Consumption and Everyday Life*. London: Sage.
- Miller, D. (ed.) (1998) *Material Cultures: Why Some Things Matter*. London: UCL Press.

文 化

Morley, D. (1980) *The Nationwide Audience*.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Morley, D. (1995) "Theories of consumption in media studies" in D. Miller (ed.) *Acknowledging Consumption: A Review of New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Morley, D. and Silverstone, R. (1990) "Domestic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and meanings",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2 (1): 31 – 55.

Muir, J. (1901) *Our National Parks*. Boston, MA: Houghton Mifflin.

Mulkay, M. (1991) *Sociology of Science: A Sociological Pilgrimage*.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Newman, G. and Marongiu, P. (1990) "Penological reform and the myth of Beccaria" *Criminology*, 28 (2): 325 – 46.

Parker, H. (1974) *View from the Boys*. Newton Abbot: David and Charles.

Parker, I. (1992) *Discourse Dynamics: Critical Analysis for Social and Individual Psychology*. London: Routledge.

Parker, I. (ed.) (1999) *Critical Textwork*.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Parker, I., Goergaca, E., Harper, D. and McLaughlin, T. (1995) *Deconstructing Psychopathology*. London: Sage.

Patrick, J. (1973) *A Glasgow Gang Observed*. London: Eyre – Methuen.

Pile, S. and Thrift, N. (eds) (1995) *Mapping the Subject: Geographies of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London: Routledge.

Pinchot, G. (1901) *The Fight for Conserva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Popper, K. (1959)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London: Hutchinson.

Popper, K. (1963)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The Growth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Porter, K. (1987) *A Social History of Madness*.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Potter, J. and Wetherell, M. (1987) *Discourse and Social Psychology: Beyond Attitudes and Behaviour*. London: Sage.

Poulantzas, N. (1978) *State, Power, Soci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Propp, V. (1928/1958) *Morphology of the Folktale*.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Propp, V. (1984) *Theory and History of Folklor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Richards, G. (1987) "Race", *Racism and Psychology: Towards a Reflective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Rorty, R. (1994) "Method, social science and social hope" in S. Seidman (ed.), *The Postmodern Turn: New Perspectives in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aid, E. (1978) *Orientalism*. London: Routledge.

文 化

Saussure, F. de (1916/1959)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London: Collins.

Sayer, A. (1999) "Long live postdisciplinary studies!", papers for the British Sociology Association Conference, April, Glasgow, mimeo.

Schütz, A. (1932/1967)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Social World*. Evanston, IL: North 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Schütz, A. (1943), "The problem of rationality in the social world", *Economica*, 10 (may): 130 – 49.

Schütz, A. (1953), "Common – sense and scientific interpretation of human action",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14 (1): 1 – 38.

Shaw, C. R. (1930) *The Jack Roller: A Delinquent Boy's Own 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heldon, W. H. (1949) *Varieties of Delinquent Youth*.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Smith, A. M. (1994) *New Right Discourse on Race and Sexuality: Britain 1968 – 199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mith, M. J. (1998a) *Ecologism: Towards Ecological Citizenship*.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and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Smith, M. J. (1998b) *Social Science in Question: Towards a Postdisciplinary Framework*. London: Sage.

Smith, M. J. (ed.) (1999) *Thinking through the Environment*.

London: Routledge.

Smith, M. J. (2000) *Rethinking State Theory*, Routledge Innovations in Political Theory 3. London: Routledge.

Sontag, S. (1989) *AIDS and its Metaphors*. New York: Farrar, Strauss and Giroux.

Sparks, C. (1996) "Stuart Hall, cultural studies and Marxism" in D. Morley and K. H. Chen (eds),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Sparks, R. (1996) "Prisons, punishment and penalty" in E. McLaughlin and J. Muncie (eds), *Controlling Crime*. London: Sage.

Thompson, E. P. (1961a) "The long revolution", *New Left Review*, 9 (May – June): 24 – 33.

Thompson, E. P. (1961b) "The long revolution II", *New Left Review*, 10 (July – August): 34 – 9.

Thompson, E. P. (1963)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Harmondsworth: Penguin.

Thornton, S. (1995) *Club Cultures: Music, Media and Subcultural Capital*. Cambridge: Polity.

Tuan, Y. F. (1974) *Topophilia*.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 Hall.

Tuan, Y. F. (1978) "The city – its distance from nature", *Geographical Review*, 68 (1): 1 – 12.

Tuan, Y. F. (1984) *Dominance and Affection: The Making of Pet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文 化

Turner, B. (1995) *Medical Power and Social Knowledge*, 2nd edition. London: Sage.

Voloshinov, V. N. (1929/1973)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New York: Seminar Press.

Weeks, J. (1985) *Sexuality and its Discontents*. London: Routledge.

Weeks, J. (1989) *Sex, Politics and Society: The Regulation of Sexuality since 1800*, 2nd edition. London: Longman.

Williams, R. (1958)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 – 1950*. Harmondsworth: Penguin.

Williams, R. (1961) *The Long Revolution*.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Williams, R. (1983)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2nd edition. London: Fontana.

Willis, P. (1977) *Learning to Labou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Farnborough: Saxon House.

Willis, P. (1990) *Common Culture: Symbolic Work at Play in the Everyday Cultures of the Young*.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Wright, W. (1975) *Sixguns and Society: A Structural Study of the Wester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译者后记

这部书的视野相当开阔，涉及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地理学乃至犯罪研究等各个学科领域；这种讨论文化的开阔视野可能本身就暗示了我们，文化对于思考当今的社会科学而言即便不能说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至少也应该是不可或缺的。史密斯正是着眼于“文化”意义的转变对于社会科学研究产生的广泛深远的影响，立意提出一种“后学科”式的社会科学和知识取向，这种取向将打破任何形式的对意义生产的垄断，消解各个学科自设的藩篱以及话语权威，进而构筑一个往来无羁的知识场域。这些努力能否在一本短短一百多页的小书中取得成功，这当然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作者投入到有关文化的浩如烟海的观点和理论中，以平等、从容的态度对它们加以吸收和评判，从而让自己的理论主张有了一个相当坚实的基础而不致流于空泛。或许这种知识态度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

因为各种原因，本书的翻译时间比较吃紧，因此译笔略显仓促，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诸君不吝指出。正如本书

文 化

作者评论到的罗兰·巴特所言，所有的书不仅应该“引人阅读”，而且应该“引人写作”，即需要读者共同参与建构意义。我想，就翻译而言，也应当如此。另外，在本书的诸多引文中，有两段分别来自福柯的《规训与惩罚》和萨义德的《东方学》，翻译时我除了在行文方面适应本书做了轻微改动以外，几乎直接采用了三联书店出版的中译本（两书均为北京三联书店出版，《规训与惩罚》的译者是刘北成先生、杨远婴先生，《东方学》的译者王宇根先生），在此向这些译者致谢。

张美川

2004年12月3日凌晨三时

封面	页
书名	页
版权	页
前言	
目录	
正文	